

炎黄春秋

第 **8** 期
2008年

于光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来历

朱良：铁托与华国锋互访

普世价值：驻外记者的感想

北京二七厂清理阶级队伍

齐奥塞斯库之死

目 录

春秋笔

- 1 从“阶段风波”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于光远
8 铁托与华国锋互访
——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朱 良

往事录

- 11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就厌恶见到江青吗……阎长贵
15 文革样板：北京二七厂清理阶级队伍……夏俊生
20 毛泽东和林一山谈三峡水库……顾迈男

亲历记

- 25 五马公社“帅旗”背后的悲剧……梁志远

一家言

- 29 普世价值：作为驻外记者的感想……彭 迪 钱 行
33 论孔子学说……吴 江

品书斋

- 41 追溯中共初创时期的历史
——《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序……李 锐

治方杯征文

- 45 亲历农村改革的几场风雨……季 音
51 感受1978年历史转折……汪澍白

求实篇

- 57 安排境外机构救援要有预案……阎明复
58 我在海城地震时采访……周保华

怀人篇

- 62 瞿独伊忆父母瞿秋白杨之华……孙维熙
69 陈独秀旧居怅想……操凤琴
72 五个不幸早逝的人……赵友慈

海外事

- 74 齐奥塞斯库之死……张汉文 周荣子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方 实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继绳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杜导正(召集人)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徐 孔(副召集人) 袁 鹰
凌 云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 社 长：徐 孔 杨继绳

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执 行 主 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员：白建钢

秘 书 长：徐 孔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亮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址：www.qikan.com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 刊 网 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5.80元

本期： 终审 徐 孔

执行主编 杨继绳

审校 赵友慈

从「阶段风波」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于光远

在 1979 年 2 月举行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一个分组会上,苏绍智、冯兰瑞作了题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联合发言(以下简称苏、冯文章或《阶段》一文),博得了与会者的好评,整后在《经济研究》1979 年第 5 期上发表,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并由此而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的最终确立。以下讲述的就是我所了解的这段历史情况。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苏、冯文章的基本观点,我在这里对这篇文章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这篇文章分做三个部分:前言和第一部分讨论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著作中写的“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那个“过渡时期”时的“共产主义”究竟是指“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作者认为应是后者而非前者。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提出在这个过渡时期应不应该再分做若干阶段。在这个部分中他们发表了引起风波的那一段有关当前中国属于社会哪个阶段的言论。文章的第三部分是论述按照他们的见解,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承认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必要性。

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作者是怎么论述的呢?

首先他们在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论述后写道:“我们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个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这里又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还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相应地存在着多个阶级,因而是进行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时期。这就是过去我们所讲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那个‘过渡时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进入另一个时期,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然后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以后才进入到共产主义阶段。”

作者认为,马克思列宁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这里说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存在着公有制的两种形式,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基本消灭,但是还有资本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分子,甚至封建主义的残余,还有相当比重的小生产者,工农之间还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着的阶级差别,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心理仍然泛滥,生产力还没有大发展,产品也未能较大丰富。这时,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还没有结束。”

同时认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残余,

小生产还占相当地位,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心理还泛滥着。这说明我们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是发达的或者完全的社会主义。”

我想读者看了上面所引的那些段落,一定会觉得他们所提出的只是我国当时处在社会主义的哪个阶段的问题,并非讨论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不料却招来了激烈的批评。对这场风波的开始,冯兰瑞曾写过一个材料,大致内容是:

1. 胡乔木、邓力群布置对《阶段》一文的批判

他们的文章发表后,6月11日,胡乔木在社会科学院大楼的过道里遇见于光远同志的秘书,对她说了几句话,大意是,苏、冯文章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现阶段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处在过渡时期。这个观点他们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过,但是公开发表,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最近,我和耀邦都收到了一些读者来信,反对这种提法。我本人也坚决不同意这种观点。这是从书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按照苏、冯的说法,有两种公有制并存,有商品生产、有阶级存在,就不能说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那么我国再过一百年后也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不能认为这个阶段里什么都存在,下个阶段什么都没有了。这种一刀切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是乌托邦。关于阶段划分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认真研究。简单地得出结论并公开发表,可能会被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所利用。说得再严重些,会引起公愤,全党会反对,全国人民会反对。

他对于光远同志的秘书说:你跟光远同志讲一下,希望他能运用自己的影响,改变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

大约也是6月份,胡乔木写了一个字条给《经济研究》,指示该刊组织文章,对苏、冯的文章进行批判。

7月5日邓力群在社会科学院召开一个小会,布置批判《经济研究》第5期上关于《阶段》的文章。邓力群说,这篇文章提出中国是否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对这个问题很重视,正副秘书长专门开

了会,中宣部要说话。邓力群指示发表文章商榷,要尽量快一些。反批评的文章不能发表,不能印。公开的报刊不能印,内部的也不能印。科学无禁区,但这个问题要划一个大界线。

2. 中宣部三次会议上讨论《阶段》一文的情况

7月6日,星期五,中宣部开会,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主持。参加者除中宣部五位正副部长外,有首都思想理论宣传战线各部门负责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纪念国庆30周年大会上叶剑英讲话的宣传提纲。提纲最后部分是对当前一些错误观点的批评,包括发表在《经济研究》第5期上的《阶段》一文,引了其中一句话。中央编译局局长王惠德看了宣传提纲后提问:这个提纲是否发出去了?答:还没有发出”。王说,这个提纲还要研究一下;《阶段》一文观点没有什么错。于是,引起与会者纷纷发言。有的说,《阶段》一文实质是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有的说该文提出了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讨论,不可以讨论,不允许讨论。一些同志发言激动,表示要写文章批判。也有个别同志表示同意苏、冯的观点,认为不应组织批判。由于意见不一致,胡耀邦同志决定下次会议再讨论。

7月11日,星期三,中宣部例会,胡耀邦主持。参加者仍是上次会议的那些单位,不过有的单位换了人。会议仍讨论国庆30周年讲话宣传提纲,自然又谈到苏、冯那篇谈阶段问题的文章。会上压倒的多数仍持要批判的意见,理由是说文章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力排众议,提出:冯兰瑞他们的文章并没有讲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可是会上许多同志说文章讲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我想请问几位部长、副部长是否看过这篇文章?胡耀邦答:没来得及看。四位副部长:廖井丹、张平化、朱穆之、张香山都回答:没有看。于是,王若水建议几位部长、副部长先将他们的文章看看,再讨论。胡耀邦接受了这个意见,说看了文章下次再谈。这次会上,王惠德、王揖(他也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也讲了不同意批判的意见。

7月13日,星期五,中宣部继续开会,先谈了关于宣传提纲的一些别的问题。在谈到《阶段》一文问题时,王若水询问:几位领导看了他们的

文章没有？胡耀邦说还没有看，两位张副部长和廖副部长都还没有看。只有朱穆之看了。朱说，文章是没有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话，但是有一句：中国还不是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朱说完，王若水立即拿出一本小册子《坚持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即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这篇文章经胡乔木审阅后，念给邓小平听了两遍，邓小平点头后才发表的），翻开小册子第8页，念道：“诚然，我们现在的社会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王接着说，苏、冯他们的文章是有胡乔木参与审查后的文章为根据的。听了王若水的发言，满堂惊愕。胡耀邦当机立断，亲笔勾掉宣传提纲要批苏、冯文章中的那句话，中宣部对此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

3. 邓力群、胡乔木再次布置批评，不许反批评

7月10日前后，邓力群在科学院召开各经济所负责人会议，散会后让党员和经济研究所的几位负责人留下，再次布置写批判《阶段》的文章，再次说明不许反批评。孙冶方当场提出异议，说这样不是与文化大革命时一样了吗？邓力群说，这是中央决定，党员要守纪律。

胡乔木在国务院研究室组织了几个人整理马恩列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的材料，准备亲自写文章。一天，在举行研究收集材料的会议后。丁树奇（政研室党委书记）在走廊上碰见林子力。丁对林说：要批冯兰瑞了。林说：谁批谁要臭。研究室整材料的事一直保密。

从1979年7月初到7月中旬这十天左右的时间，中宣部、胡乔木、邓力群频繁召集会议，布置批判《阶段》一文。紧锣密鼓，声势吓人。一场大批判眼看就要开始。消息传出，震惊了全国思想、理论界。苏、冯分别接到一些慰问电话。中宣部第一次会议后，有同志建议苏、冯给邓小平写信申诉。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党中央三中全会精神。而且他们的文章并没有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但是否马上写信，他们还拿不定主意。这时，政研室的林润青因病住院，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根据冯说的情况，劝告“不要作出反映”。冯很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他们就保持沉默。

冯兰瑞同志告诉我，在7月下旬之后胡乔木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道歉，并说要“设法补救”。

7月24日，朱佳木（胡乔木的秘书）向冯兰瑞转达胡乔木的话，要她不要误会，他不过是看了你们的文章后很着急。

7月底，冯兰瑞的老伴李昌到北京医院看病，遇见胡乔木。胡对李说，他很忙，没有来得及找冯兰瑞同志谈话，很抱歉。其实他对冯的文章只有两点意见。一是方法问题，不应将马列的话一条一条的来套。马列那个社会主义一千年也实行不了。第二，这样一写，同另一些文章就混在一起了。有十几篇文章，讨论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很凶的。李昌答复他两点：用简单的办法不能解决理论问题；你说马列说的不对，实行不了，怎么说才对，你们要拿出个说法来。以后，胡乔木在北京医院又一次见到李昌，再次表示对冯兰瑞的抱歉。时间大致在当年9月。

8月25日上午，马列研究会学术部举行会议，传达前几天胡乔木在马列所、文学所、哲学所、法学所、历史所五所汇报会上的讲话。在回答文学所提出当代文学史如何编法之后，胡乔木说：我顺便作一些自我批评，对苏冯的文章看得太严重了，认为不适宜讨论。对问题本身我的观点没有变化。我不应采取行政办法，提出意见之前没有先征求苏冯二人的意见，很抱歉。看了《经济研究》第8期载有朱述先写的与苏冯商榷的文章）后，要想办法补救一下。在这种气氛下，很难进行认真的学术讨论。

8月《经济研究》发表了朱述先与苏、冯商榷的文章。之后，《经济研究》接到胡乔木电话，大意是说，你们登了朱述先的文章，是受了我（胡）的影响，要设法补救一下。可再找人写文章与朱商榷。据知，与此同时，胡乔木《经济研究》写了一个意思相同的字条。两年后，冯向《经济研究》当时的负责人提出借阅胡乔木给他们的两个关于《阶段》一文的字条时，答复说，这两个字条都被社科院调走了。

《经济研究》根据胡乔木指示，找了几位同志请他们写文章同朱述先商榷，均被拒绝。于是又打电话请苏、冯写与朱商榷的文章。苏、冯也婉拒了。

后来，不知道胡乔木又看到了什么形势，重



中共“十三大”正式确认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新回过头来要批苏、冯，并捏造了有一个“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讨论”。研究建国以来经济学界讨论的历史的人——我也应该算做一个——写过不少书，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过这么一个讨论，可是他硬说有，并且把苏、冯的文章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列在首位。

接着胡乔木把这个问题提得越来越高。他利用自己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起草者的便利，把苏、冯的观点作为不承认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代表，不点名地写进这个历史决议中去。我也是参加这个决议起草工作的人，在1981年四、五月间看到决议稿中有这样一段话之后，我特别找到胡乔木对他说，你这样做非常不对。这次谈话，我因为很生气，表现得非常激动。我对他说：“你至少要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讲我的意见时嗓门越来越高，激动得都拍了桌子。在我的强烈抗议下，他实在没有理由一字不改，不得不在《决议》中加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

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放在一个陪衬的地位，着重点还是放在批判“任何否认中国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他只承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

过了几个月，到1981年8月，中央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这时候中央有一个思想工作领

导小组，它的成员有胡乔木、周扬，也有我。这个座谈会的宗旨是纠正思想战线领导涣散和软弱，抓的典型事例是白桦的作品《苦恋》拍成电影《太阳与人》上演引起了非议。但是这个会要解决的不仅是文艺界的问题，还有理论界的问题。理论界的问题是什么呢？胡乔木举不出来。会议分文艺界、新闻界、理论界三个

分组，理论界的小组就由我和孙冶方作为召集人（冯兰瑞也是理论界小组成员之一）。我们组不承认理论界有什么领导涣散软弱的问题。而胡乔木说的“许多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话都出自社会科学院”的话，我们这个组的同志都认为是院长造的本院的谣，大家都不承认。而且在会上大家反对不指名道姓批评这种或那种所谓错误观点的做法。关于这些，说来话长了。

在这个会闭幕的那一天，胡乔木作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整理出来之后编入了在胡乔木主持下编成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一些同志在长时间内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不顾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胜利实践，不顾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论述和二十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的的发展，教条式地宣传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并且必须消灭商品生产，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应该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不愿意承认我国在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尽管这些刚建立的制度还需要完善，但毫无疑问，它们已经在我国扎下了根，并且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同志既然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

不愿意看到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愿意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连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公正人士也不能不称道的优越性。极少数人甚至荒谬地宣称中国应该回过头去发展新民主主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极端错误的观点的宣传,不但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种表现,而且还给这种思潮以一种‘理论’的依据。”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胡乔木认为,1957年以后,包括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都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邓小平曾多次指出,这二十年我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胡乔木却不顾事实,又把矛头指向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理论工作者。他这次讲话时我应该在场,冯兰瑞也在场。那时我的耳朵不像现在这样背,他当时如果说了这样一篇话,我会立即作出反应,会去批评他。冯兰瑞当时也没有听见他的这篇话,她的笔记本上也没有这方面的记录,因此很可能是胡乔木以后改上去的。这段话我直到1998年才发现。1981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第一次写进党中央文献之中。

1982年我参加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文件的起草仍由胡乔木主持,在他为胡耀邦报告起草的第三部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特别使用了在我国已经“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那样的句子。我一看就明白他是针对苏、冯的《阶段》一文观点写的。我还是想在胡耀邦的这个报告中写进“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不想跟他在起草组内又冲突起来。我决定在胡耀邦亲自参加定稿时提出。那一天在读到文件的第三部分时,我提出要写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而且我已想好这话写在什么地方,基本上编好了句子。我刚把话讲完,胡耀邦立刻表示应该写,当时就作了决断。胡乔木也就没有再吭声。我建议的报告稿写进的这段话开头一句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下面还有一段是想对这话作一点发挥的,不过胡乔木还是用“但是”这个转折词又转上了他的观点。然而这次在“中国处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前,“尽管”两个字还是加不上去了,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再是一句陪衬的语言了。

从1982年十二大后,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了很大的进步。

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发表了很重要的谈话。谈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同日本的大来是这个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经济组的召集人,邓小平发表那个谈话时有幸在座。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讲:“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清醒的。”就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强调“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四个月后,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中提出“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问题,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要为城乡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条件”。只是还没有敢提私人经济。还说了“决不是退回到建国初期的那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尚未在城乡占绝对优势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那样的话。

历史发展到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题是专门讨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这次中央没有要胡乔木主持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而把我请去担任起草小组的顾问。胡耀邦亲自主持文件的起草,就在这个会议上,把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重要依据。在全会决议中有这样一段重要的文字:

“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全民范围的道德建设,就应当肯定由此而来的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同时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

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而决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同时必须指出，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进的历史运动。我们社会的先进分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尤其要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总之，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是在党中央文献中第一次把“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的依据。决议用这一点，从实质上来批评不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现实，而只强调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左倾空谈。在起草党中央六中全会决议时，胡耀邦说，在这个决议中我们还只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写到树立道德风尚里，但这个提法应该对我们党的工作有重大的意义，仅在道德风尚问题上写是不够的。好在十三大马上就要召开。他说在起草这个决议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把它写进他在十三大要做的政治报告中。在六中全会后，他决定原来的起草小组不解散，继续考虑十三大报告的起草。起草小组的成员还同他一起去上海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我和一些同志先去，胡耀邦后到。我们当时都住在上海虹桥西郊宾馆里。

后来党中央不要胡耀邦做十三大政治报告了，十三大报告交由赵紫阳去做。1987年3月26日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问题赵紫阳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信中写道，他认为“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般地泛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初级阶段，而是指由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的必须经历，而不能逾越的初级阶段”。他说：“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立论，有可能把必须避免的‘左’、‘右’两种倾向这个大问题

说清楚，也有可能把我们改革的性质和根据说清楚。如能这样，对统一党内外认识很有好处，对国外理解我们的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也很有好处。”

赵紫阳对于上面我写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写进中央文件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因而在他给邓小平的信中写了上面三段之后，写道：“‘初级阶段’的提法，在党的文件中已三次出现（历史问题决议、十二大报告、精神文明决议），但都没有发挥。如您（邓小平）同意，报告的起草工作就准备循着这个思想加以展开。”

从后来赵紫阳做的十三大报告来看，邓小平同意了这封请示信。

在十三大报告中的第一部分“历史性成就和这次大会的任务”之后，第二部分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在这一部分中开宗明义：“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接着就写了这样几段：

“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我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多年间，经过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多次失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唯一的出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也正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

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 经过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我国当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人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突出的景象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那末,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

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

“ 总起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接着又写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们应当确立的具有长远意义的六条指导方针。

然后又写了一条概括性的语言,表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的党的基本路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到现在应该说已完全确立。

而胡乔木、邓力群对《阶段》的批评也就再也提不出来了。

最后我想还讲讲我本人对苏、冯《阶段》一文看法:我对苏、冯的文章给以充分肯定的评价,这篇文章一开头我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篇文章中说那时中国还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说法。

我认为马克思、列宁对“过渡时期”已有明确的论述,不宜扩大到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社会。《阶段》的作者之所以把这样的社会看做过渡时期,估计是受到毛泽东关于1956年后还存在阶级斗争的看法的影响。其实这种看法在当时理论界中大都也接受。我是同意他们的“不发达的社会”或者后来我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看法的,不主张用“过渡时期”的说法挂钩。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铁托与华国锋互访

——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

朱 良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后，我国的外交往仍很少，重要的代表团的来往更少，对外部世界的情况很闭塞。1977年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华和1978年华国锋主席回访南，是当时最重要的外事活动之一。

经过50年代到60年代的10年国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中国同苏联决裂了（在1991年以后，有70多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为15个独立的国家），中共同全世界近80个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断绝了关系，只同朝鲜、罗马尼亚和东南亚几个共产党有较好的关系。同为数不多的在反修斗争中产生的“马列主义左派党”也保持联系。

1977年做出 邀请铁托访华的重要决策

1977年5月24日，华国锋（没署头衔）致电铁托祝贺他85岁寿辰。中央随后决定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产主义联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1990年底开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开始解体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独立国家。）铁托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的英雄，他坚持独立自主，不愿按照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南共联盟因而被苏联共产党开除出1947年成立的欧洲“九国情报局”（类似小型的1943年解散的“共产国际”）。1958年，南共联盟又是第一个被我党戴上“现代修正主义”帽子和第一个中断了两党关系的共产党。在1963年9月，我党在国际反对修正主义大论战中发表的《九评》中的第三评，即《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中，严厉地指责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是帝国主义的附庸，

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南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已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具体罪名有：南宪法肯定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资本主义在农村泛滥；取消国家统一的计划经济，实行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54.6亿美元的援助，使南斯拉夫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市场；出口重要矿产品，使南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进口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搞加工，使南斯拉夫的工业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装配车间。“三评”除谴责“铁托集团”充当反华的急先锋，还谴责“铁托集团”打着“不结盟”和“积极共处”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指责“工人自治”制度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发展“不结盟运动”和“工人自治”是南斯拉夫两项基本政策。铁托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推动者。1961年9月，在南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了首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后来它的成员发展到超过100个国家，因此铁托在国际上特别在发展中国有很高的威望。

我们在1958年中断了同南共联盟的党的关系后，在外交、国际事务中长期采取孤立南斯拉夫，排斥南斯拉夫参加国际活动的政策。但是南斯拉夫在联合国仍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68年，南斯拉夫反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则谴责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两国共同点增加了。

粉碎“四人帮”不久，中央就对南斯拉夫政策180度的调整，邀请铁托访华。所以能做出这样大的决策是因为：毛泽东主席1975年会见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时，赞扬“铁托是铁，不怕苏联

压迫”，并问候铁托总统；改善中南关系符合毛主席联合一切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力量的“一条线”战略。但是铁托访华，这就涉及要不要恢复中共同南共联盟的党的关系的问题。当时我们内部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过去反对南共联盟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不能否定。耿飚、李一氓等同志的思想比较解放，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更加解放。

铁托访华，两党恢复关系

铁托率代表团于1977年8月30日至9月8日访华。中方给了铁托一行破格的、热烈的欢迎。华国锋，7月刚恢复职务的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去机场迎接。天安门广场欢迎人数由原定四千人增加到十万人。华国锋在正式会谈一开始，就称呼铁托同志说：“过去我们吵过架，党的关系中断了，现在要公开称同志，恢复党的关系，有一个转弯子的问题。对国内、国外都需要做些工作。两党可以先恢复内部联系，经过双方努力，再正式恢复关系。”会谈中双方各自介绍了本国情况，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发展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中方赞扬并支持南斯拉夫坚持不结盟政策，反帝反霸，支持发展中国家反对侵略、掠夺和争取独立的斗争。铁托虽然已85岁，头脑非常清晰，介绍了许多中方不了解的国际情况，特别是不结盟国家的情况。李先念副主席同南共联盟中央书记多兰茨，就国际问题和两党关系进行了会谈，并陪同铁托一行去外地访问。铁托在访华期间，情绪非常高涨，在杭州同随行人员一起在宾馆客厅放声高唱游击队歌曲，直到深夜。铁托的访问获得圆满成功。铁托访华后，我们出现了一个去南斯拉夫访问的高潮。从中央到地方有30多个代表团、考察组访南。

1978年3月，中央批准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和中联部副部长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三星期，全面考察了南的政治经济制度。代表团给中央的访问报告，基本上否定了大论战中“三评”指责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罪状，肯定了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南

共联盟是马列主义政党。报告还就正式恢复两党关系的方式和华国锋回访南斯拉夫的时间提出了建议。中央向省、军级转发了这个报告。1978年6月，南共联盟成了第一个同中共恢复了关系的“修正主义党”。应该说：“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能提出这样的考察结果报告，思想是很解放的。

1978年8月华国锋回访南

1978年8月14日起，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正式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伊朗当时的国王政权正摇摇欲坠。毛主席的“一条线”战略就包括伊朗，伊朗的战略地位重要，因此华国锋还是去了）。主要陪同人员有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纪登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和黄华、张耀祠、乔石、余湛、陈洁、张友渔等。

华国锋这次出访，是毛主席1957年访问莫斯科之后，我党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在南斯拉夫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首都三四十万人夹道欢迎。86岁高龄、身体不好的铁托同华国锋一行进行了四次会谈、两次单独会见。双方就各



1977年8月华国锋欢迎铁托访问中国



1978年8月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

自国内的情况、国际形势、两国两党合作，包括经济合作坦诚地交换了意见。铁托详细介绍了欧洲和不结盟国家的情况，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华国锋强调中国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也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要向南斯拉夫学习，努力发展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

国际上对华国锋这次访问南斯拉夫反应很强烈，说中国领导人跑到苏联的“软肚皮处去了”。除了苏联很紧张不安，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国反应都很积极。访问达到了预定的扩大反霸统一战线目的。

中南互访对后来改革开放的积极作用

中南友好关系的发展，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互访和大批代表团、考察团的互访，对我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应该说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华国锋同陪同人员在内部议论了这次访问的收获。根据一位主要陪同人员回国后的传达：“印象很深”的有以下几点：

(1) 华国锋说，南斯拉夫的基本制度“工人自治”有好的一面，发扬民主，调动地方、基层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各共和国权力过大，联邦中央的权力分散。在铁托威望很高的时候不会出问题，如果一旦没有这么高的权威，可能会出事。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如果权力太分散，搞诸侯割据，就不得了。

(2) 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对外经济合作完全开放，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看来也没有损害国家主权。

(3) 南斯拉夫认为，吸收外国贷款有利，因为利率低，归还期限长，而且美元贬值很厉害。我们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南斯拉夫同志很羡慕，说“中国信用那么好，我们想借外国贷款都借不到，而你们不想借”。华国锋说：“看来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

(4) 南、罗同中国同类的工厂、企业，它们的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我们中国企业的权力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

(5) 南、罗方面几次谈到，除了在战争状态或其他特殊情况，对外国搞无偿援助的做法不好。我们一直强调不做“军火商”（当时是指责苏联），白送人家军火，连成本也不要。

(6) 在访问期间参观的许多单位中，大家印象特别深的是南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农工联合企业（后来在中国也很出名，企业的中文译名为“背靠背”）。它不仅搞农、牧、畜（奶牛、家禽等）业，还搞加工，从粗加工到最后成品，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国锋要赵紫阳到四川搞一个“背靠背”，北京搞它几个。

华国锋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扩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他说：我赞成省委书记们出去多看看。他还要纪登奎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把访问中看到的、听到的和议论的，什么都谈。

在这次访问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又出现了一次访问南斯拉夫的高潮。

1980年5月4日，约瑟普·布鲁兹·铁托逝世，享年88岁。华国锋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南斯拉夫参加5月8日的葬礼。这是唯一的一次中国最高领导人参加外国最高领导人的葬礼。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就厌恶见到江青吗

阎长贵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主席就厌恶见到江青。”这话白纸黑字明白无误地出现在一本很有影响的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口述历史》的书中。他这样说，人们能够相信吗？如果这样，谁叫江青当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即便别人提名，毛泽东能批准吗？在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一次聚会时，我说：我们作为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当时（指文革初期）江青主要住钓鱼台，下午只要不开会，她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毛主席，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我还说，江青去看毛主席，或到毛主席那里去，和别人（包括周总理）不同，因为她是回家啊。至于毛泽东不让江青到他那里去，有些厌恶见她，那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据汪东兴告诉我们，到1970年代，即文革进行好几年后，毛主席觉得江青经常来看他，对他的休息和工作是一种打扰，不愿意让她来。有一天毛主席问汪东兴，谁能挡住江青不让她到我这里来？汪回答：“只要你下命令，我就敢。”此后，江青去看毛主席确实受到警卫战士的阻拦。江青的司机李子元说，有一次，江青要到毛主席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去，当车行至游泳池附近的一个路口时，被值勤的警卫战士挡住，江青说：“你看我是谁？我回家你怎么挡？”警卫战士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上面的命令！”气得江青要打警卫战士，警卫战士仍然坚持不让车过，江青无奈，不得不让汽车改道，取消了这次“回家”之行。当然对这件事（即毛泽东限制江青到他那里来）究

竟怎么看？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们认为说毛泽东文革初期就厌恶见到江青不是事实，是瞎编，这是因为它不符合文革发动的实际进程，不符合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谁都知道，江青是协助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干将和先锋——急先锋。文化大革命的引火索和导火线即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毛泽东“允许”和“建议”江青去组织的。我们看看毛泽东和江青自己的说法。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她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她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汇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他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屈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七八个月，改了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

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一次北京，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毛泽东在1967年2月和5月两次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都谈到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情况。

2月3日接见时，毛泽东说（大意）：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我们就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1961年到1965年期间，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呢？说的不是客气话，说的是真话。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1953年冬

到1954年斗了（高岗）、（饶漱石），1959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一些准备。1965年11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指批判《海瑞罢官》），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他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江青）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康生看，不然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也要看。刘、邓、彭（真）、陆（定一）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了，北京不转载。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翻印发行，就是北京不翻印发行。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水泼不进，

针也插不进。

9月接见时，毛泽东又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从毛泽东这两段相当坦率的叙述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他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他怎样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只有他和江青两个人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以及总书记邓小平都蒙在鼓里。按照毛泽东、江青自己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确实——如有人所说——是他们夫妻二人鼓动和搞起来的。我们这样断言并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没有深刻和深远的原因。同样我们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发动文化大革命都“蒙在鼓里”，是指毛泽东说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对这一点他们谁都不知道；还指他们没有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念头，而当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不管想通还是没想通，都是积极表示赞成和支持的。其证明，就是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时，他们举了手（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当时他们，特别是刘少奇、邓小平大概没有想到会搞到自己头上，因此他们不仅没有沉默、反对，而且以他们自己的理解和方式（实际上，也是“左”的）积极参与和领导了初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也是他们在文革中被更“左”的毛泽东视为犯错误和被毛泽东反对、批判与打倒的原因（当然是“近因”，现实的原因）。

原来毛泽东发动批判《海瑞罢官》，本想旗开得胜，一呼百应，结果遇到顽强抵制，这种“出师不利”，对一向强调“慎重初战”的毛泽东，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个时候，说“刺激”也许更好些）。于是他又出新招，指示江青请“尊神”，去找林彪。江青解释说，这就是要借助和依靠军队的力量，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见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结果在1966年2月搞出了一个《林彪同志委

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注意：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是毛泽东修改《座谈会纪要》时加的），第一次明确发出了进行文化战线上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号召，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即“黑线专政”的概念。这个文件（1966年4月10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是江青走上政治舞台的宣言书。

1966年4月，江青积极参加了（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主持“或部分主持”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如上所说，此通知5月16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被称作《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除了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观点

外，还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宣布：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等。在这个通知上，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排在候补中央委员王任重之前，即做第一副组长，这其中的深意即谁的旨意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给江青写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还讲了几句几乎跟任何人都不能说的许多“黑话”（毛泽东语）。

1966年7月20日，江青从外地回到北京，住进中央文



革小组的大本营钓鱼台，公开地以毛泽东代表的身份，同陈伯达、康生等人，风风火火、马不停蹄地到学校、到机关……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风，点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之火。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即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陈伯达主持大会。关于这次活动，新华社的通讯说“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不仅正文这样说，还上了提要，在这里居然把江青和毛、林、周并列起来，这说明什么和意味着什么。

1966年8月，由于陈伯达生病住院，中共中央于8月30日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次日，即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就是江青主持的。

1966年11月28日，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江青在大会上的讲话是主报告，而江青的讲话毛泽东做了认真和仔细的修改。谢镗忠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通知：中央军委决定并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改组

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在这里江青和徐向前元帅并列。

下面讲一件我亲历的1967年“五一劳动节”那天的事情。到1967年5月1日，按照毛泽东说的“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始”，文化大革命进行已经一年半了，就是从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开始，文化大革命也进行快一年了。姑且不论这算不算“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们只看看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这一年纪念“五一”是在中山公园举行游园会，中央领导人（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5月1日上午（可能是9点钟），当中央领导人的车队要进入中山公园时，受到参加游园会的群众队伍的阻拦，通不过。没有办法，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休息。这时江青的护士许春华觉得这是工作人员和毛主席照相的好机会。于是她就跟江青说：“江青同志，我们想和主席照张相。”江青说：“那我去问问主席。”当江青向毛主席提出这件事情时，毛主席爽快地回答：“好，照吧。”在这一次，不仅毛主席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那个写《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李志绥）和毛主席照了相，据记忆陈伯达的两个秘书好像也参加了。就我自己说，真是太高兴了，和毛主席照相，这是我平生第

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遗憾的是，我后来被江青打成“坐探”、“反革命”，这照片也被勒令销毁了。不去说这些，而我们从这件事情看，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如果不是这样，即不是很亲密，江青会向毛泽东提出工作人员要和他照相的事情嘛，同时，毛泽东怎么会爽快地答应呢？！

再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讲，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头号敌人是刘少奇即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江青是刘少奇专案组最主要的负责人，在制造刘少奇这个全国最大的冤案上，江青态度最坚决，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多，调门也最高——不消说，这些都是符合毛泽东的心愿和要求的。

面对着这样大量的尽人皆知的事实，说什么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厌恶见到江青”，明显地站不住脚。连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1949—1976）》也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在那几年能够到处兴风作浪，没有毛泽东重用是不可能做到的。（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3—1684页）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文革样板： 北京二七厂清理阶级队伍

夏俊生

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六厂二校”之一。所谓“六厂二校”，是指北京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化工三厂等六个工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个学校，由于“六厂二校”的军宣队是由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派出的，这些单位被称为毛主席的试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一些老师、副总理和省部级的老干部都在这六个工厂里参加过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毛泽东主席当年曾批转了“六厂二校”的许多“经验”，指导全国文化大革命。像清华大学落实可教育好子女（指被打成“走资派”的领导干部的子女）的政策、二七机车车辆厂整党的经验等等。这些经验在当时看起来好像是纠左的，但现在看来，只是左了100步往回纠正几步而已。比如，有的人本不是反革命，却被打成反革命，来一个不戴反革命的帽子，竟也算执行了政策。

二七机车车辆厂的前身是长辛店机车厂，是1897年在建设京汉铁路时建立的。早在1920年12月，李大钊和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地方组织就派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等共产党人到二七厂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冬在工厂建立了共产党的党小组。1923年二七厂的许多工人参加了“二七”大罢工。当然，共产党把二七厂当作开展工人运动的据点，国民党也必然在这里与共产党争夺工人。工厂里解放前也有国民党、三青团以及其他政治组织。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在军宣队的领导下，“深挖阶级敌人”，不少老工人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

1969年5月27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全市转发了由二七厂革委会、8341部队驻厂毛泽东

思想宣传队、新华社总社记者联合署名的《北京二七厂关于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对敌斗争政策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之前曾在新华社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二七厂革委会和军宣队曾向当时来厂参观的“九大”代表和全国各地来学习取经的人们做过多次介绍，也在当时的不少会议上介绍过“经验”，成为全国“清理阶级队伍”（以下简称“清队”）的样板。在1969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为了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大量引用了《报告》中有关二七厂在文化大革命挖出了不少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的材料。毛主席在讲了“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一段话之后说：“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刘少奇那种路线走……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8000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9个区分部，三青团有3个机构，另有8个什么特务机构。”

“粉碎‘四人帮’以后，二七厂在“清队”中被整错的许多老工人要求落实政策，但由于这里是毛主席抓的点”，政策迟迟得不到落实，引起工人的不满。1978年7月，铁道部派出工作组，与北京市工交办的领导一起，帮助二七厂落实政策。经调查核实，1969年影响全国并被毛主席引用的这个《报告》里的许多材料，竟然是假的。

打倒一切 怀疑一切

《报告》说：解放前，这个厂残留下来的反动势



8341 部队在文革中是支左红旗

力相当庞杂，线多、面广、根子深。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有国民党区分部 9 个；三青团分队 4 个；有“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 8 个，包括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计划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此外，还有叛变了的地下党员，有日本特务、几十种会道门的大小道首，以及一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这些反动组织交织在一起，遍布全厂各个车间、科室。

事实是：解放前，二七厂内确有 9 个国民党区分部。但 4 个三青团分队是长辛店地区的，并不都在厂内。所谓的 8 个特务组织，有的根本不是特务组织，有的完全是无中生有搞出来的大冤案。涉及全厂 278 人（连同厂外计 500 多人）的所谓军统特务组织“戡乱救国潜伏小组”根本不存在，更不是什么“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计划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二七厂解放前的地下党支部不能定为“叛变了的地下党支部”，地下党员没有一个能定为叛徒。至于所谓的里通外国分子和进行间谍活动的天主教骨干分子，都是没有的。

在解放后进行的镇反和肃反中，二七厂的反革命组织都早已基本查清，一些骨干分子也都已逮捕法办。“清队”的结果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在“清队”中新挖出来的历史反革命，只有 8 个国民党区分部候补委员、1 个伪保长和 2 个特务分子。绝大多数为了保饭碗而参加国民党等反动组织的老工人，在解放后都主动作了交代，许多人还参加了共产党，被提拔为领导干部《报告》却说：“解放

后，在大叛徒刘少奇及其二七厂代理人的庇护下，这些阶级敌人不但没有被揭发出来，有些竟窃据了厂和车间的领导岗位。”

《报告》说：在全厂 155 名中层以上干部中，已查出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 49 人，占 31.6%，其中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 24 人，占 15.5%，他们窃取了党委书记、副厂长、监委书记和副总工程师等重要领导职务，把持了全厂党、政领导大权。叛徒当上了干部部长，一贯道坛主当上了组织部长，保卫科 3 个科长有 2 个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全厂 27 个车间中 20 个车间的领导权和 17 个科室的领导权也

大部或全部落入这些人手中。

事实是：二七厂在“清队”中因历史问题被审查的中层以上干部有 97 人，其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有 42 人。经过 1975 年落实政策的复查，只有 1 名副厂长能不能定为叛徒还有待进一步复查（他的问题过去已经交代并按一般历史问题作了结论）。其余 41 人的问题，全是假的或搞错的，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问题《报告》中所点的党委书记、副厂长、监委书记、副总工程师、干部部长、组织部长、2 个保卫科长，除了上面说的那位副厂长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复查外，没有一个人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所谓全厂 27 个车间中 20 个车间的领导权和 17 个科室的领导权也大部或全部落入反革命分子手中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报告》说：全厂已清查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 215 人，清查出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和其他反动组织的一般成员 373 人，基本上弄清全厂敌特组织的系统和关系，清出了一些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破获了解放以来发生的几起重大纵火、放毒、破坏生产等无头案件并掌握了潜伏特务组织等若干重大线索。

事实是：“清队”中定的 215 名反革命分子，1975 年复查时，只有 12 人仍定为敌我矛盾，其余 203 人的问题全是假的或搞错的。至于 373 名国民党员等反动组织的一般成员，多数也是假的，即

使是真的,也只是一般历史问题,大多数早已主动作过交代。所谓掌握了“潜伏特务组织”的重大线索,纯属靠逼供信搞出来的假案;所谓“清出了一些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当时没有一个能落实;所谓“破获了解放以来发生的几起重大纵火、放毒、破坏生产等无头案件”,也多是冤案或错案。如,工人许彬被揭发为一起火灾的纵火犯,可是他当时参加抗美援朝根本不在厂内。《报告》说的制材车间两起大纵火案,其实当时只烧了点刨花就被扑灭了。在“清队”中,工人党员王玉被逼供认是这两次火灾的纵火犯后上吊自杀,现在也无法证明是他放的火。所说煤水车间的投毒案,是工人杜某怀疑他的老婆与人有不正当关系,杜某在这个人喝的酸梅汤中放了巴豆霜。所说的破坏生产案,多是生产事故,不是故意破坏。

二七厂“清队”扩大化,完全是“打到一切、怀疑一切”的产物。为了“挖得深,战果大”,肆意扩大敌情,制造冤案,把二七厂说得似乎到处都是阶级敌人,领导权根本不在共产党手里,老工人和绝大多数从老工人中提拔的干部受到严重摧残。在“清队”中被错定为“历史反革命”的,几乎都是解放前入厂的老工人和从这些老工人中提拔的干部,其中一半是共产党员,中层以上干部有60%受到审查。这些人被定为“反革命”后,党员都被开除出党,干部全部监督劳动,其亲属和子女也受到株连。

从几例冤案看二七厂“清队”的真相

《报告》说:二七厂在“清队”中“强调突出一个‘准’字,防止扩大化,对他们(指审查对象)交代的问题认真调查,反复核实,对他们检举的问题不轻易相信,没有确凿的证据不定案。”事实却完全相反。请看下面几例冤案:

铸工车间1944年入厂的老工人康长,出身贫农,解放后一直表现很好,1960年加入共产党。解放前,康长曾替国民党党员、情报组长刘某通知人开会,但本人并未参加过刘召集的会议。这个问题入党时已向组织作过交代,此外历史上再没有任何问题。“清队”中,据此怀疑康长也参加了反动组织,给他办学习班进行审查。在压力下,康长被迫承认参加过国民党、情报组,但又否认,先后反反

复了多次。同时,在逼供和指供下,刘某等12人证明康长参加了国民党、情报组。1969年10月,康长因“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指清队中“态度恶劣”,先后“翻案”100多次;“不交代问题”等),被开除党籍、厂籍,全家遣送原籍。1970年5月,康长在几次来找军宣队负责人申述都被拒之不见的情况下很生气,打破了门上的玻璃。军代表找人把康长扭送到保卫科,康进行反抗,双方动起拳脚。康长被殴打一顿后被捆在暖气管上,趁看管人员吃饭时挣脱绳索,拿起屋内一枝气枪准备自卫。军代表和保卫人员发现后,夺过气枪,将康长五花大绑送到公安分局。当年6月,康长以“打骂军代表、革命群众,行凶闹事,进行阶级报复”等罪名,被判处15年徒刑。直到1978年7月,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作了批示,康长才被无罪释放,恢复厂籍、党籍,全家返回北京。

原动力车间工人王敬贤,河北完县人。在“清队”中,军代表从一个人的档案中发现易县岭西村一个姓孔的日本特务的口供说:“我们村的王敬贤是日本特务。”本来,只要稍微细心一点,就可判明这是同名不同村也不同县的两个人。但当时却张冠李戴,认为厂内的王敬贤就是易县岭西村的日本特务王敬贤,马上给王敬贤办了隔离学习班,并派人到家里交底,让家属帮助“政策攻心”。结果,王敬贤被逼自杀。人死后,车间还开批判大会,说他“畏罪自杀”。王敬贤被逼死后,其夫人脑溢血加重,1975年去世,剩下的3个孩子都因受到刺激精神不正常。历史清白的王敬贤,就这样被搞得家破人亡。这样明显的冤案,二七厂1973年复查时却对王敬贤作了个“因对清队不理解自杀,按非因工死亡处理”的结论,不给彻底平反。

工人党员马永是个转业军人。一次在学习班上同军代表争论问题,说除了毛主席,没有一贯正确的。军代表说,那江青呢?对江青“文攻武卫”那一套早有不满的马永说,江青也不见得一贯正确,也值得怀疑。就这一句话,马永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实现群众专政一年多,整党中被开除党籍,并不准重新入党。

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军统特务组织”“戡乱救国潜伏小组”,完全是靠逼供信搞出来的大冤案。1948年5月,蒋介石政权于覆灭前夕曾在全国逐级成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北平的委员会只存



长影著名演员张巨光在“清队”中卧轨自杀

以“政策攻心”为名大搞逼供信

二七厂“清队”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调查组办案与群众办案相结合，以群众办案为主；查档案、搞外调与发动群众、政策攻心相结合，以发动群众、政策攻心为主。”这两个为主，实际上就是不要证据和调查研究，靠捕风捉影和逼供信搞假口供。工人们说，二七厂的“清队”不是突出一个“准”字，而是突出一个“狠”字，不是政策攻心发挥了威力，而是逼供信发挥了威力。

所谓“以群众办案为主”，就是把群众中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说、怀疑、猜测，作为“活档案”提供的线索，又不认真分析核实，就作为办案定罪的依据。《报告》说，有一个解放前参加四个反革命组织的反革命分子，调查组调查了20多次，问题也没有弄清，后来群众中有人认为他四个孩子的名字连起来是反动口号“建立中华民国”，就抓住这个问题对他展开“政策攻心战”，终于使他“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反革命身份和罪行”。这个人指的是劳资科的张洪儒。其实，他的四个孩子的名字按顺序是建华、建国、建中、建民，根本不是什么反动口号。他本人也没有加入过四个反动组织。所谓“坦白交代”完全是逼供下的“顺杆爬”。

所谓“以政策攻心为主”，就是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先定性，后逼供。“政策攻心”时，常常是三班轮流“熬鹰”，不交代问题就不让睡觉，不让回家，或者白天劳动，夜里被“攻心”，甚至搞变相体罚。这样搞上几个月，身体再好也顶不住，只好“坦白交代”。还有被隔离审查的老工人，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家务事无人管，为了能够回家料理家务，只好“缴械投降”，争取“从宽处理”。

二七厂的“政策攻心”还有树立“宽严样板”和“发动家属参战”两种做法。

所谓“宽严大会”实际上是引供、诱供大会。被从宽处理的人在大会上发言说：“参加特务组织的还有同我在一起的张某某、王某某，你们赶快交代吧！”会后，被点名的人只好赶快去“坦白”。

所谓“发动家属参战”，就是把要审查对象交代的问题告诉其家属，要家属做审查对象的工作。家属怕审查对象被从严处理后停发工资只给生活费，造成生活困难，又影响子女分配工作，只好苦

在一个多月就因无经费停止了活动。当时，二七厂有的工人参加了铁路的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进行反动宣传的训练班。从公安机关掌握的材料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并不是特务组织，在二七厂也没有其下属组织。但在清队中，二七厂却捕风捉影地搞出了个“戡乱救国潜伏小组”，说这是个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潜伏特务组织”，而且内部纪律森严，订有“攻守同盟”，其成员还有不少兼有中统、军统等多种特务身份。为了攻破这个“顽固堡垒”，选择了老工人和林作为突破口。其实，厂里并没有掌握和林有历史问题的任何材料，只是认为他形迹可疑：一是每逢政治运动他就歇病假；二是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当时工会负责人的女婿。据此，就怀疑他是特务，给他办了隔离学习班。和林不承认，就采取车轮战“政策攻心”，每天只让他睡三四个小时的觉。日子一长，和林受不了，只好交代。交代特务身份以后，又追问同案人、组织活动和潜伏活动。在办案人员的指供、诱供、逼供之下，和林只好胡编了一通“内幕和罪行”，并检举了103个“特务分子”。《报告》中所讲的铸工车间副主任康治，也是在这种逼供、诱供之下，被迫承认是“戡乱救国潜伏小组”的特务分子，1962年开过会“准备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还往香港送过情报，并检举了不少同案人。就这样你揭发我，我揭发他，“特务”越来越多，“特务组织”的活动越来越玄。

二七厂在“清队”时规定，不管本人承认不承认，只要有三个人揭发就可以强行定案。所谓“人证物证旁证三证俱全”，其实都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假口供。

苦劝说审查对象去“坦白”，有的甚至下跪哀求，搞得全家不得安宁。有的车间让家属办家庭学习班，帮促审查对象交代问题，什么时候“帮出来”什么时候结束，家属不能上班就减少了工资收入。还发生过审查对象“交代问题”后车间敲锣打鼓向家属“报喜”的笑话。审查对象受到家庭和工厂内外夹攻，精神压力很大。二七厂在“清队”中有20人自杀，大多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有些人死前无任何证据证明本人有问题，完全是在死后才想法“取证”的。

8341部队进厂前，二七厂曾搞过一段“清队”工作。那时，对审查对象严刑拷打，有的被活活打死。8341部队进厂后，武斗逼供的现象确实大大减少了，但这种“政策攻心”对审查对象的精神折磨和政治压力更大了，乱供乱咬的情况十分严重。有的一人就“交代”了几百人的中统和军统特务名单。不少人被揭发参加了中统、军统等七八种反动组织，当时只有14岁的小徒工也被揭发为“中统特务”。有的人被迫咬了别人之后，就找到这个人打招呼：“对不起，我投了你一票。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没有办法。如果找到你，你就说吧。”全厂职工中1949年前入厂的老工人占58%。当时，二七厂各个车间把1949年以前入厂的老工人集中在一起办大学习班，让每个人都交代历史，搞得老工人人人自危，胆战心惊。底架车间1949年以前入厂的老工人54人，53人被整了材料，36人受到审查。

据调查，这个厂当时的一些外调人员采取武斗逼供、诱供、指供的做法，从反革命分子那里搞来许多假证明材料。外调人员对刑满就业人员、原二七厂锻工车间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张某拍桌子，搞体罚，让张在解放前二七厂锻工车间的人员名单上标出哪个人参加了哪些反动组织（比如，参加中统的打叉，参加国民党的划勾），张某一下子就证明解放前锻工车间的100人中，有80人参加了反动组织，其中32人参加了5种以上的反动组织。找原二七厂机械车间历史反革命分子、在押犯齐某的外调人员，拿着解放前二七厂机械车间的一张图（每台机床设备的位置及操作人员名单），强迫齐交代特务组织情况，齐就照着名单乱咬，出证164人参加了中统等反动组织，全部是假的。

1975年，二七厂对“清队”中处理的人员进行

了一次复查，“清队”中定为敌我性质的246人（历史反革命215人，现行反革命31人）中，仍定为敌我性质的有24人（历史反革命12人，现行反革命12人）。被搞错的222人中，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有40多人根本没有任何问题，被强行戴上特务帽子。二是反对林彪、四人帮被打成反革命。三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军宣队有意见，或存在一般的思想政治错误，被无限上纲，打成现行反革命。如《报告》中说的徐振海，是在大家猜谜语“东门外失火，内里烧死二人，一男一女，酉时三更”时，随手把谜底繁体字的“烂肉好酒”四个字记在一本刊有周恩来总理和江青讲话的小册子封面上，便被以“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四是把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当成故意破坏。五是本人早已交代并做过结论的一般历史问题，翻出来炒回锅肉，或无限上纲，或妄加莫须有的新罪名，打成反革命。这一类人有100多人，占绝大多数。

另外，毛泽东主席批示“照办”，1970年5月29日中央下发全国的《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里面引用的材料也都是按照“清队”搞出的问题做依据，也有许多地方不符合事实。比如《报告》中说：“二七厂党员85%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有严重错误的有5%左右；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和其他坏人有10%左右。”这个事实和分析显然不符合实际。《报告》后面所附的对19个党员组织处理的案例，由于他们的问题都是按“清队”中确定的性质处理的，大多数人的处理都是错误的。从1970年到1972年，二七厂因“清队”搞出的问题，全厂有99名党员被开除党籍（“清队”定为敌我矛盾的一律被开除党籍），9名党员受到党内处分，大多数都搞错了。

我在1978年8月到二七厂采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在分社领导的支持下，写了题为《二七厂清队的经验是假的》的内部情况反映，1978年9月1日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发表。有的人当时曾对我说：“你的胆子真不小，把毛主席批转的经验都否定了”。正因为如此，这篇供各地领导干部参阅的情况反映对于全国解放思想、促进平反冤假错案起了积极的作用。

（本文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毛泽东和林一山谈三峡水库

顾迈男

1956年6月，毛主席发表了《水调歌头·游泳》。词中吟道：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在这首词发表的三年前，1953年2月19日，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突然接到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通知，要他随毛主席外出并汇报工作。

这天，林一山备齐了一切必要的资料，从下榻的杨森花园与毛主席一行来到长江边，在武汉关附近临时搭起的一个专用码头上，登上了“长江”号军舰。

从这时起，林一山在毛主席身边开始了三天三夜的航程。

军舰刚一起航，毛主席就派人把林一山找去汇报。林一山带上随身带来的一本《申报》地图，来到二楼毛主席的卧舱里。这时，毛主席已在等候他了。这天，毛主席穿一件绿色的军大衣，头戴军帽，脖子上随意系着一条方格围巾，满面红光，看上去不像已年逾六旬的人。他见林一山来了，立即快步迎上来，笑容满面地紧紧与林一山握手，并请他靠近自己坐下。毛主席很随便地问他：“你过去见过我吗？”

“见过几次，那是西安事变放走蒋介石以后，1937年春天中央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我是白区代表，到了延安，主席曾参加我们的小组会……”林一山说。

“真对不起，你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毛主席说。

毛主席谈话很温和，平易近人。使林一山紧张的心情，渐渐放松下来。

“你这本地图是从哪儿弄来的？”毛主席指着林一山手里拿的为纪念《申报》创刊60周年出版的《中国地图》说。

“是在东北打仗时，从汉奸那里弄到的。”

“这本地图还是不错的，长征开始时我路过湖

南、广东边界时，也弄到过一本，以后打仗行军经常用它，长征时，它给我帮了不少忙。”

随后，毛主席又注意到林一山的右手，关切地问道：“你的手是打仗时受伤的吧？”

“是的，是七七事变后我在胶东第一次跟日本人作战时受的伤。”

“你打了多少次仗？”

“较大的战斗有十次，小规模游击战就数不清了。”

“好，打一打仗有好处，可以减少主观主义。”

随后，谈话进入正题，毛主席开始详细地了解有关长江建设的问题。

首先，毛主席向林一山了解长江洪水的成因，他问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是什么？暴雨区怎样分布？林一山打开随身带来的长江流域图，着重介绍了长江流域的两个暴雨区。一个是从南岭向北流水的地区，如赣江、湘江、资水、沅水，时间大概是4、5、6三个月。暴雨的发展，是从江西到湖南，由南到北，由东到西逐步发展；另一个暴雨区是四川盆地西部、北部、东部和三峡区间，也包括秦岭以南的汉水流域，时间是在7、8、9三个月。这两个暴雨区一般情况下，在降雨时间是相互错开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长江不会发生大的洪水灾害。

毛主席听了，频频点头。

林一山又讲了引起长江洪水灾害的降雨情况。他说，如果这两个大暴雨区同时降雨，这些暴雨区的洪水汇合在一起，长江的河道不能安全下泄，就会发生水灾。这种全流域性降雨的天气，一般5—10年可能发生一次。另一种暴雨在较大的地区发生，即区域性暴雨，因暴雨强度太大，也会形成罕见的特大洪水。这种情况在长江有历史记载的1000多年间，就有3次（分别是1860年、1870年、1935年）。

“长江流域暴雨最大的强度是多少？”毛主席

又问。

“根据历史记录，1935年7月间的一次暴雨的降雨中心在湖北五峰县，这次降雨总量达到1500毫米，比两湖地区通常年份一年的雨量还多。这次暴雨造成的灾害使汉江中下游一夜之间就淹死了8万余人，澧水下游死亡4万余人。川西的峨眉山青衣江流域，因地形的关系，每年的降雨总量都可达到2000毫米以上，所以叫做‘川西天漏’。”

毛主席听了，笑着说：“真了不得！”说完，转身问公安部长说：“罗瑞卿同志，你这个高个子有多高啊？”

“大约有一米八几。”

“呵，长江真能下雨，有的地方降雨深度比你罗瑞卿这个子还要高啊！”

随后，毛主席又以极大的兴趣多次询问了有关气象、水文和洪水成因的问题。

林一山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一一作了回答。

“长江‘舰’日夜破浪前进。”

毛主席站在窗前，望着奔腾不息的长江说：“要驯服这条大江，一定要认真研究，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林一山又回答了毛主席提问的长江的水文资料情况。

“你不要走，我请你吃饭！”一个把小时汇报之后，毛主席说。

当云雾缭绕的庐山在天边消失的时候，毛主席又继续与林一山交谈起来。这次，毛主席把话题转入了长江流域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个更大的题目上来。

林一山向毛主席简要地汇报了他们已经做的关于长江平原防洪工程的规划工作。

当汇报到治理长江的第三阶段是修建山谷水库时，林一山展开了一张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图上的干支流上标着许

多兴建中和规划中的大大小小的水库群。林一山说，我们计划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来拦蓄洪水，从根本上解除洪水的威胁，同时开发水电，改善航道，发展灌溉，最大限度地进行综合利用。

毛主席边听边凝视着中国的万里江山图，从青藏高原的长江源头，莽莽昆仑、金沙江、大渡河、岷江、嘉陵江、乌江、湘江、汉江、赣江……直到上海长江口。然后在图上比划了一个大圆圈，说：“太好了，太好了！”

接着，他将目光移向群峰竞立的三峡河谷，低头沉思片刻后，突然指着三峡以上地区，对林一山说：“修这样许多支流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这个大水库呢？”

“从长江致灾洪水的来源说，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的防洪效益。”

毛主席听了，指着三峡东口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这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毛主席的话说出了林一山酝酿已久，但未敢贸然提出的想法。他心想：毛主席不愧是大战略家，竟如此准确地掌握了长江的洪水规律与其他水库的相互关系。林一山随即兴奋地回答说：“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是也这样说了嘛！”毛主席笑着说。

林一山见毛主席兴趣正浓，便又谈了美国人萨凡奇在解放前提出的关于开发三峡的 Y. V.



毛泽东和林一山在“长江”号军舰上

A 计划”。

毛主席问林一山当时的造价，林一山说，萨凡奇提出的造价是 13 亿美元。毛主席又派人找罗瑞卿来，了解了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然后，掐指一算，认为造价不算高。此外，又问了工期和地质基础条件等方面的问题。

随后，毛主席又请林一山吃饭，这次与上次一样，仍是两菜一汤，主要是辣味。毛主席边吃，边问林一山：

“ 你有多少工程师？ ”

“ 有 270 位工程师。 ”

“ 你的工程师讲百啊？ ”

“ 那你有多少技术员？ ”

“ 有 1000 名。 ”

“ 啊，技术员讲千啊！ ”

过后，毛主席回到北京，就找水利部长傅作义，讲了他与林一山的这段谈话，要傅作义加强水利方面的技术力量。

天亮以后，军舰驶向南京，在甲板上毛主席要与全体水兵们合影留念，毛主席向林一山等人招手说：“我们也合一个影吧！”不久，这张合影便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

次日，毛主席又和林一山谈了南水北调的问题。

军舰快到南京时，毛主席叮嘱林一山说：“三峡问题暂时还不考虑开工，我只是先摸个底，中央分管这项工作的同志，你也暂时不要跟他们讲，但南水北调工作要抓紧。”

船到南京后，毛主席亲切地握着林一山的手，说：“好，我算是了解了长江，了解了长江的许多知识，学习了水利，谢谢你！”

林一山回忆说，为了实现毛主席的宏伟理想，他们从此以后同时抓三峡和南水北调这两大项工作，由于他们迅速组织力量布置南水北调工作，同时进行三峡工程的各项科研工作，才在 1958 年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通过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决定兴建丹江口工程，从而也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奠定了基础。

1954 年 11 月的一个晚上，林一山又接到通知，要他到汉口车站汇报工作。他上了火车以后，才知道是毛主席的专列。火车上，除了毛主席，还有刘少奇和周总理。简单的问候之后，周总理要林

一山汇报三峡工程问题。

汇报都是问答式的，汇报一开始，毛主席就提出三峡工程在规划设计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在谈到三峡工程的建设时，毛主席问林一山：不靠外国人，我们自己能不能解决？

林一山回答说，这个问题就看中央怎么考虑。如果给我们一段时间，我们完成丹江口工程以后，我们的科研水平已达到世界水平，到那时，我们应当可以建设三峡工程，因为丹江口工程在世界上也属于一流工程。

随后，毛主席又问林一山三峡的地质条件怎样？

天亮以后，毛主席又通知林一山到他的房间里用早餐。进去以后，林一山才发现，他的对面坐着江青。当江青问林一山是山东哪个县的人时，毛主席对江青说：“你们是老乡，你还不知道，他是文登县，在半岛的东面；你是诸城，在半岛的西边，相隔很近嘛！”

党中央决定此时将治江大事提上国家议事日程，是事出必然。林一山心想：1954 年洪水的大破坏，荆江分洪工程在危急时刻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我接连两次向毛主席的汇报和多次汇报信，对中央决心根治长江、开发长江，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6 年夏天，毛主席发表了《水调歌头·游泳》这阕词后，同年夏天，在武汉东湖第三次接见了林一山。

这是一次集体接见，接见的是武汉地区一批有代表性的人士。王任重主持接见。毛主席见到林一山后，说：“你这个‘长江王’来了。”

毛主席与众人合影后，就上楼到他的房里去了。接着，林一山被告之到楼上去见毛主席。

林一山走进毛主席的房间，见李先念同志也在场。这天，毛主席很高兴，见面后开玩笑说：“你看能不能帮我找个人当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你修三峡大坝好不好？”

“这个大坝长我都想当噢！”李先念凑趣说。

这次接见的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毛主席向林一山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央决定修三峡大坝。

林一山回忆说，长江水利委员会从 1955 年起，便开始做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同年末，林一山组织了大型的“长江查勘团”；

请中苏专家就嘉陵江、岷江、乌江的三江下游建坝拦洪与三峡拦洪进行了比较，并得出了三峡建坝不可代替的结论。并在《中国水利》上就此撰文，不料文章一发表，就为李锐同志反对。现在，毛主席和中央都表示支持，林一山当然很高兴。

林一山回忆说《水调歌头·游泳》，对当时争论之中的三峡工程，真可谓推波助澜。第一次掀起全国性的三峡热。但对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认为这只是一首美丽的诗篇，是毛主席的浪漫主义作品，于工程之可否并无实际意义。林一山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说：“只要看看此诗发表的前后几年，毛主席一再向我了解三峡问题，恐怕也大多不会同意这种看法。”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主席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后来所说的“南宁会议”，这次会议除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预算、批判“反冒进”外，再就是听取有关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问题的汇报。

会议开始前，毛主席派飞机把林一山接到了南宁。

据说，当时有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还有人反对三峡工程。”

“那好，把反对三峡工程的人也接来。”毛主席说。

因为林一山在1956年的《中国水利》上，发表了一篇有关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的文章后，李锐同志便在同年的《水利发电》上对三峡工程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因此，林一山听说毛主席点名要听与他相反的意见，便知道必定是李锐同志。

在南宁会议上，林一山和李锐分别向会议作了汇报，私下并未交换意见。

会上，首先讨论了三峡工程的造价问题。南宁会议前夕，林一山要长江委的施工造价人员经过仔细推算，从苏联专家估算的200亿人民币，降到72亿人民币。这个数字与林一山在“长江”舰上向毛主席汇报的美国专家萨凡奇报的造价不谋而合。

“如果少装机，装机500万千瓦，50个亿够不够？”周总理问林一山。

“够了。”林一山回答说。

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见林一山回答得很干

脆，人们估计他还留有很大余地，就问25亿行不行？林一山说：那不行。有人说，答应了算了，林一山坚持说不行。

毛主席见林一山坚持50亿的造价，就说：“那好吧，就算你说的这个造价，少装机，先把大坝修起来防洪。”

三峡工程问题讨论过后，毛主席问林一山说：“你能不能写篇像样的文章？”接着又说：“让王任重给你当政治委员帮助你好不好？”

“好，省委第一书记当政治委员当然好。”林一山说。

毛主席又对林一山和李锐说：“你们俩竞赛，看谁把文章写得好。”

“我不行，我不会写文章。”林一山说。

“为什么？”毛主席问。

“我只能用我的国语水平，勉强地表达我的工作经验。”林一山说。

过后，林一山写了一篇题为《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的文章，交给了王任重。王任重阅后，交给他的秘书梅白帮他修改。梅白修改后对林一山说：“你的文章内容很有鼓舞力量。”

过了一两天，毛主席在会上拿出了林一山和李锐两人写的文章，称赞李锐文章上的一张地图说：“这个办法很好，一目了然。”

林一山写的文章，后来经过周总理的仔细修改，作为《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的总论部分而传了下来。

1958年夏天，毛主席在武昌东湖主持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天拂晓，林一山接到电话，要他向毛主席汇报。

从与会人的谈话中，林一山得知，毛主席通宵未眠。因为太困了，就在会场上睡着了。直到中午，毛主席才听了林一山的汇报。他问的主要内容是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

林一山对此并未作准备。只是一般地回答说：“至少可以运行200年到300年。”

他这是根据三峡以上干流在300年内不修任何水库的情况而作出的估计。

毛主席听后，思忖片刻，说：“这样大的工程，千年大计的工程，二百年就淤死了，那太可惜了！”

过后，林一山就此和技术人员对水库泥沙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就水库寿命问题，于1964年到东北、内蒙古、西北十几条河流调查水库淤积问题。由于有了感性认识，又有了实际资料，使这个问题不到半年时间，就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半年过后，他向周总理作了口头汇报。后又写成书面报告《水库长期使用问题》，周总理阅后，对报告的印刷和制图都作了具体规定。这份报告，直到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交给周总理转送毛主席。

“三门峡改建工程完工之后，经过几年的调度试验，库区泥沙达到了进出平衡……三门峡水库的改建成功等于给以后兴建的葛洲坝工程，作了一次近似1:1的模型试验。为后来解决葛洲坝库区泥沙淤积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葛洲坝工程建成后的运行结果，再次证明：水库可以长期使用。”林一山说。

1958年9月11日拂晓，湖北省委办公厅通知林一山去武昌东湖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单独接见了，这次毛主席主要向林一山了解三峡水库的泥沙问题。

接见后，毛主席约林一山陪他游长江。他随毛主席乘车从东湖来到长江大桥的桥头下，稍停片

刻，换乘一艘早已候在江面上的专船。上船后，林一山发现张治中先生早在船上。毛主席邀他和张治中下水，均婉辞。但见毛主席如鱼得水般地在长江里健臂划行，甚是壮观。

当天晚上，毛主席又请林一山和王任重到汉口惠济路的“老通城”吃晚饭。在场的有十几个人；毛主席、王任重和林一山一桌；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七八人一桌，再一桌是三个孩子。

“是你的孩子吧？”毛主席指着孩子们问林一山。

“是的。”其实，有个孩子是司机的。

毛主席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只顾自己吃，也不管管孩子。”

于是，有两个工作人员便到了孩子们的那一桌上。这是一家以湖北著名小吃闻名的老字号餐馆。毛主席在“老通城”吃饭的消息很快传开。顿时，餐馆外面的马路上围满了人。

过后《人民日报》刊登了毛主席在武汉接见林一山的消息。林一山看后仔细一想，这次毛主席接见他是他对过去有关长江的事要告一段落，从这以后，便把长江的事交给了周总理。

(本文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广 告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2008040039号 京医械广备字第2008050153号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6号

电话：010-64071474 64074641 64002810

传真：010-64055026

邮编：10000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B

电话：010-84608848 传真：010-84608847

邮编：100027

SW 声望听力 网址：<http://www.sw-tl.com>

解决听得见
听不清
耳聋
耳鸣的烦恼

五马公社“帅旗”背后的悲剧

梁志远

安徽省亳县(今亳州市)焦城区五马公社(今五马镇、阎集镇、张店乡),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以后干出了一系列残害农民的勾当,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中共安徽省委根据群众反映,1960年秋派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吴文瑞带工作队进驻,列为省委整风整社的重点。作者当时先后是县人委(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和县生活办公室负责人。现以亲见、亲闻、查阅历史资料和本人的工作记录,将这个公社大跃进刮“五风”的经历,作一记述。

放“卫星”得“帅旗”国务院颁奖

1958年,县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县委书记处书记坐镇指挥,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具体负责,成立“卫星田”专业班子,创“卫星田”的各项工作日夜进行。他们在泥店大队选了一亩多水源充足,土壤肥沃的田块,进行打埂、施肥、深耕、灌水、活田,打上横竖成行,距离相等、高矮一致的硬杂木桩。在木桩上紧紧牢固地缠系上涂醋(速生锈——以免被人认出是新并棵的)的铁丝。把一百零几亩黄熟前期的水稻,移栽到木桩铁丝网成的“卫星田”里,并在田埂上移栽青草,以表真实。

在“特大卫星”造好以后,县委请地委负责人视察并通知各社队和县委机关组织参观,我带领县直单位负责人按时前往,亲眼看到有不少人站在稻穗上合影留念。为使“特大卫星”放在其他各县前面,抓紧收获脱粒,县长到场,县委书记处书记肖国玺亲自过磅。这块1.389亩水稻,总产56683斤,亩产40808斤,及时向省地委报喜。县委在稻谷场上召开了庆祝大会,再次大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县委第一书记亲自为《亳

县报》写了社论,县报号外发表了《稀罕稀罕五马水稻亩产超过四万大关》的长篇通讯,《阜阳报》和《安徽日报》都及时发布了消息。

之后,五马公社又放出了各种作物的“特大卫星”,全公社粮食总产又大吹上报,又居全县第一。在县委四级干部大会上,被命为“帅旗公社”,“大帅旗”在城中心广场飘扬。

粮食高产的“帅旗公社”,在高征购粮食入库高潮时,又放出一个又一个“卫星”,以致把不少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购空。两三个月后出现饥荒,大部分食堂停伙,集体生产停顿,人口外流。至此,粮食征购仍未完成,从而出现“打假象”,斗干部私分瞒产,对农民实行搜家挖粮交征购。继之,农民因饿浮肿,饿死人的情况同时发生。直至1959年3月地委派人检查,弄清事实真相,给予粮食回销,情况才稍有缓解。

全面饥荒出现,“帅旗”已经暗淡,无人再提。然而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以后,“帅旗”的“光辉”又重新出现。1959年冬亳县以五八年粮食高产,泥店大队以水稻“特大卫星”出席了全国群英大会,国务院给亳县和泥店大队颁发了奖状。

“共产”风登峰造极

该公社从1958年9月至1960年10月,经公社党委统一部署,全公社统一行动而损失严重的共有24阵“共产”风,其中:

一、1958年10阵:1. 大并庄、大搬家,农民财产合大堆,不分你我他,天下农民是一家,吃饭不要钱,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2. 卖统购不给钱;3. 全民投资(包括金、银、铜、铁、锡及一切易售物资),大炼钢铁;4. 青年、妇女捐款,大办“三机”“三站”(拖拉机站、抽水机站、电

灌站);5. 大兴土木,建公社大戏院;6. 社员投资集款,大办社队工业;7. 集中社员的猪羊家禽,大办饲养场;8. 大办集体福利事业,占用社员房家具;9. 大搞河网化调社员工棚材料、工具;10. 生产大兵团作战、大轰隆、田间搭棚吃住。

二、1959年8阵:1. 1959年春生活紧张,搜粮食,扒社员房子;2. 收作物代金,群众卖猪羊、卖树、卖柴草一律折款归公;3. 乱调红芋秧子大支援;4. 没收社员自留地和收入一律归公;5. 粮食不给钱;6. 修建涡河大闸乱要材料,不计资不给钱;7. 发展社有经济,变私有为公有;8. 调整土地耕畜,大搞土劳畜平衡”。

三、1960年6阵:1. 大并庄、大搬家、实行“四大(“大搬家并庄,大办幸福院、办大食堂、劳力大集中)一消灭(“消灭家庭);2. 大兵团作战,大协作搞夏种;3. 生活紧张,乱拆房子,安排生活;4. 调生产队红芋秧子,支援缺秧队;5. 再次没收社员自留地,一切作物全归公;6. 收购生产队棉花不给钱。

这24阵风,一阵接一阵,有时几阵一齐刮。1960年春人死多了,劳力少了,生产难以为继,就大搬家、大并庄,消灭家庭。这种雪上加霜的办法,使人死得更多。经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公社党委第二书记宋××批准,把10个生产队变为10个农场,办6个敬老院,10个幼儿园,3个学校并为1个。实行劳力集中到农场,老年人集中敬老院,幼儿集中到幼儿园,学生集中一个学校,搞一个所谓“全民组织化”。实行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体劳动,形成一家分居几处,父不见子,夫不见妻,搬家出来的空房随便乱扒,东西到处乱丢,从而造成农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公社党委在这个大队召开大队书记现场会,宋××在会上总结几大好处,要求各大队学习推广泥店大队的“经验”。现场会后掀起了共产风高潮。据20个大队(缺2个)的调查统计,搬家的共20个大队,130个村庄,占村庄总数的32%,4120户13441人,占总人口24.8%。其中搬一至两次的129个庄3666户10880人;搬三至四次的5个庄553户732人;搬五至六次的2个庄77户332人。并掉庄子29个,因搬家拆扒和倒塌的房子44167间。调查时三代同堂的194户677人,无房居住的227户511人。

除24阵风以外,到处是“一平二调三收款”,根本不存在三级所有制。群众说:“东西是谁的?都是人民公社的!”还有的说:“那时刮的飞沙走石,晕头转向,真像个无政府的社会。”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劳力、农具、粮食、现金等一切东西都可以随便调走,社员的财物生产队更可以随便没收。总之,哪个单位没有资金,都可以向生产队和社员收款。1958年,公社成立火箭营,向各大队调劳力420人,牲畜30头,主要农具60件;1959年公社建立园林场、饲养场等向生产队调劳力200人,调五马大队土地1300亩,调集各生产队社员的猪、羊1000余头只,因管理不善很快死掉650头;公社成立搬运站,调架车79辆,马车3辆,牲畜6头,劳力80多个;公社建大戏院,调劳力60余人,工料全由各大队负担,其中仅树木就有1000多棵。戏院建成后,又向群众要板凳400多条,桌子200余张。1960年春,孙庄大队赵曹生产队社员的房子被学校扒7间,敬老院扒3间,幼儿园扒4间。社直九个单位,没有一个不刮生产队和社员的。

不仅社队平调,而且县直机关单位,也向社员伸手。1960年6月亳县中学师生到孙庄大队李集生产队扒社员房子11间。亳县化肥厂,在工作队进村前几天,拿一张白条调走草寺大队红芋3000多斤。

据对全公社调查统计:自1958年公社化以来,县、社、大队、生产队共乱调劳力3958人,土地6619亩,耕畜292头,房子3926间,主要农具2948件,运输工具389件,粮食434032斤,家具10893件,木材67383棵,猪羊13995头,家禽26930只,社员自留地作物(主要是白芍、棉花、菜类)折款18069元,现金470381元,加上其他物资共折款631.9万元,人均100多元。

“共产”风,给很多生产队和社员经济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不少农民倾家荡产或家破人亡。“共产”风已刮得农民极端贫困,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变成了“一大二空”,全社一片凄凉。

高举“帅旗”大反右倾

五马公社,由于“五风”严重摧残,1958年底即发生全面饥荒。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以后,反右

倾运动全面开展,对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抵制“五风”的干群,又高举“帅旗”大反右倾进行无情的打击。1959年11月,在县委四级干部千人以上大会上,批斗公社社长王效思,王效思的“罪行”是:

一、反对人民公社。1958年王在张店大队检查工作时,看到大队占用群众房子建立的“党员之家”、“团员之家”、“民兵之家”、“妇女之家”等,他批评大队说:“这个之家,那个之家,社员之家哪里去了?”

二、下令解散食堂。1959年,王到泥店大队检查农民生活时,实际是集体无粮,没有人敢叫停伙。王说:“没有粮就停伙”,他一个命令,一上午40个食堂解散38个。

三、反对大跃进,否定1958年成绩。王说:“做一点工作就报喜,不要报。”有一个大队去公社报喜,王不叫去。

四、破坏人民公社。王主张“借地给社员种麦”,妄图破坏人民公社。

县委四级干部会议以后,王效思被撤销了职务,并以王为活靶在全公社批斗。反右倾运动全面展开,先后召开全体党员会、干部会、贫下中农会,以批王为中心掀起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反右倾高潮。一大批说真话的农民受到摧残。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和反右高潮中,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群英大会。县委和泥店大队负责人,“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群英大会,国务院向亳县和泥店大队颁发了奖状。当他们北京归来广泛传达会议精神时,全县上下更是一片凄凉。在五马公社上下已是没有一个人敢说实话,农民因生活浮肿,外流大量发生。全社22个大队共建立50个劝阻站,调专职人员150余人,日夜查缉农民外流,使饥饿无门,在家等待的却是一场惊人的死亡。而浮夸反右和“更大跃进”有功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于1960年2月选上了县委候补委员。

干部违法乱纪严重

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干部都贪污浪费。

全公社贪污行为的干部479人,占干部总数的37.9%。贪污总计25700元。其中500元以上

的9人,1000元以上的4人。而浪费方面仅大小队两级统计共14474元。其中:搞遍地红旗化买彩旗2723元,吃喝招待费1974元。窃取享受布票118尺、粮食22700斤、酒527斤、糖352斤、油873斤等总计折款8000余元。

从1959年秋至1960年秋,全公社统计有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433人,占干部总数的34.2%。他们对“吃青”的农民(因饥饿无奈到地里吃没有成熟的庄稼)施行吊、打、捆、冻、晒、罚、关、饿、封门、活埋等十余种刑罚。因打致伤而死的54人,打伤打断肢体的75人。被捆67人,被吊361人,被打的2442人。其他被训骂、扣饭、砸锅等则无法计算。

在违法乱纪严重的罗庄大队,生产组长以上的干部103人中,违法乱纪有74人,被打441人。大队书记董××一人,就吊打农民16人,其中打后死亡3人。治安大队长张维先共打83人,其中死伤3人。孙庄大队洪庙支部书记李文辉1960年共打48人,并在瓜园里私设公堂,把许多吃青的农民弄到瓜园里审打。群众反映说:“瓜园就是阎王殿,李文辉就是活阎王。”

人亡政息耕地荒芜

基于上述情况,全公社农民死亡惊人。据原公社党委副书记薛俱坤和原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孙振华等同志的反复回忆:全公社两年农民死亡约有二万七八千人。

1960年12月,我派县委生活检查组王心离等同志前往五马公社征得新公社党委选定一个生产队进行人口调查。到李吉楼大队李吉楼生产队后,通过逐户排查,这个生产队1958年原有505人,调查时仅有194人,而1958年秋外出当工人8人,外地上学4人,当时外流未归的105人(不计客死他乡的人数,共死亡194人)。占原有人口38.4%。

另据调查吴小阁大队,吴×庄生产队,原有38户178人,死绝9户,下余实有人口95人,占原有人口的53%。

据市技术监督局退休干部,中共党员杨心宽在其家庭所在的泗合大队杨庄逐户调查,全村原有68人,到1960年底除有4人外流未归外,实

有 18 人，两年死亡 46 人，占原有人口的 67.6%。

据县委 1960 年 7 月 25 日，在三级干部大会上批评的泗合大队副书记兼某分支书记焦 × ×，对所管辖的四个庄中的一个小庄，丢掉不管，到会前这个小庄 30 口人没有了（外流人口不明），房子光了，树砍光了，80 多亩耕地全部荒芜。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情景：

1960 年初春，公社党委在罗庄大队，召开全社大搞代食品扒茅草根现场会。会前把病重者关锁在屋里，把因饥饿浮肿和干瘦的农民病轻者驱赶到远外荒野里，待会议结束，被关和被赶的人已有近十人冻饿而死。

之后，在草寺大队彭小庄归国华侨彭广胜夫妇，于 1960 年 3 月先后饿死。彭在法国侨居 40 年，享受养老金生活，听说祖国农业合作化，农民生活提高了，费尽周折，于 1957 年 5 月回到祖国。回到县时，我在县人委办公室接待了他。1960 年初，他给法国友人去信说生活困难，但接友人回信时，彭夫妇已饿死数月。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蒋祥勇等在泗合大队五庄检查发现，有一年仅 6 岁的孤儿住在食堂，满身污垢，骨瘦如柴，正在驴屎蛋里剥未消化完的红芋片渣子吃，发现一点渣子连驴屎一起吃到肚里。

全公社地土荒芜，到 1960 年夏季荒地约占 50% 以上。其中罗庄大队耕地 16500 亩，荒芜在万亩之多，孙庄大队 10000 亩土地，6000 余亩成为草荒，粮食亩产仅有 65 斤，其中黄豆亩产仅 13 斤，棉花亩产籽棉仅 16 斤，泥店大队后张阁生产队 1800 亩耕地，由于死人多，每个劳力负担耕地 200 亩，加上牲畜和农具损失严重，地没法种了因此抛荒 1566 亩。顺口溜说：“抬头四处看，荒草成大片，骑车来检查，丢掉车子看不见！”

在一个人畜死亡严重，土地大面积荒芜的公社，其主要领导在想什么？他们想的是吹大牛，保帅旗，骗取表扬，特别是公社党委一二把手毫无党性良心。当 1960 年 2 月饿死人已进入高峰期，他们将 2 月份县委拨给公社农民人日均不足四两的口粮，扣留 4500 斤未向下拨。在 3 月上旬

县委召开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他们汇报是如何做好工作的，二月份口粮节余 4500 斤上交。从而当场受到县委的表扬，要学习五马经验”；同时对其他强烈要粮食的公社进行批评。五马的“经验”不仅危害了本社农民，而且殃及了全县。

退赔走过场吃亏是农民

在整风整社中，对“共产风”平调农民的物资财产等进行了全面清理。农民表示热烈欢迎，对退赔抱有很大希望。但至此人民公社已是三级所有三级空，只能是高调低赔走个过场而告终。县委调查组在孙庄大队与“清账兑现委员会”研究，经新的公社党委同意，拿出了极不合理的退赔处理办法，例如：

平调的款物，原则上不予赔偿。有原物者即退还原物，原物损毁者即不予退还。

平调地主、富家的棺材，树木，中、大型家具，家畜家禽，现金及农副产品等一律不予退还。

平调死绝户的财产，一般不予退还。

全县对“共产风”的退赔，全面走了过场，给极端贫困的农民留下了久治难愈的创伤。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2007 年合订本已经出版，数量有限，有订购者请与我刊广告发行部联系。

另：我社 2006 年《炎黄春秋》合订本库存已全部售完，请不要再汇款，仅有 2007 年合订本，价格如下：

2007 年精装 85 元 简装 80 元

2007 年下半年（7-12 期）45 元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普世价值： 作为驻外记者的感想

彭迪 钱行

1956年，我们在伦敦当记者时，全世界以惊奇的眼光看到中国共产党似乎是一夜之间就把一个专制独裁贪污腐化，被美国人贬称为“坏政府”当权的中国变成一个倡导独立民主、廉洁奉公，能团结全国人民振兴中华的新中国。我们结识的著名的英国工党议员迈可·福特（Michael Foot）还特别表示对毛泽东的钦佩。他对我们说：毛泽东的著作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合情合理，常识满篇（full of common sense）。福特先生的话当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重温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读到那些号召全国团结，强调民主自由，娓娓动听的见解，不禁心向往之。抚今思昔，感触良多。

事隔一年，反右派运动，席卷中国大陆。人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就国事提了一些批评或建议，竟遭到无情打压。神州大地又是一夜之间，从大家满怀激情，生动活泼，力图发扬民主的局面变成鸦雀无声。中国在世界的威望，一落千丈。我们在伦敦又遇见福特先生，他坦率地对我说：“我真不理解，对你们自己的人民何必如此敌视。你们威望很高，又有强有力的政权，怕什么呢？”当时我们对国内这场政治运动，也不理解，只能支支吾吾，解释几句。从此以后他再没有来找过我们。

在中国这样封建落后的大国向现代化前进的过程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难免的，改了就好。问题是 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传统，没有独立的民办的媒体，政府不能通过媒体集思广益，全面地反映情况和人民不同的意见；公众不能利用媒体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议论和监督国家领导

人。不仅忠心耿耿、为国为民、敢于直言不讳的中国人受到打击，连一些外国朋友对中国提了一些意见也不例外。例如，在抗战前期和延安时期曾为中国做出贡献的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因此受到冷落，不受欢迎。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才再次来访，对中国还是热情不减。建国前夕英国共产党派来帮助我国对外宣传工作多年的阿兰·魏宁顿（Alan Winington）也被排斥，遗憾地回到英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在观察分析世界如何看中国这个大命题的时候，无法否认或回避文革前中国的历史背景和直至今天还留下的后遗症的阴影。时至今日，像中国这样严格控制新闻报道和言论自由的国家，在文明世界实在是屈指可数。说它是人权问题，不为过分吧。在这方面，中国要同国际接轨，差距还不算小。

我们在西方国家工作多年，上至高官，下至平民，交了不少朋友，包括一些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如美国总统安全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华盛顿邮报》老板格雷厄姆夫人等。我们谈天说地，主要是讨论国际大事，中美关系和美国国情。他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表示尊敬，有的还津津乐道讲他们同中国领导人建立的个人感情。总之，我们的话语范围很广。可是，他们似乎有意回避谈论中国的国内问题。他们有很多途径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很熟悉中国官方的观点和宣传方针，无需向我们“请教”，更不想引起争论。

美国政客，包括许多国会议员对我们不讲客气，看到中国一些他们认为是人权问题就公开批评。其实，这些批评即使提得不对，我们听听也无

妨,可以参考,不必发火。问题是他们好为人师,盛气凌人;以我为主”超过限度,甚至在国会通过决议,企图以他们的价值观和法律,强加于人,干涉中国内政,反映了美国对外的霸权主义。我们在美国常常写评论对这种反华行径进行反击。美国政府将我们的文章散发,供美国政要,国会议员和各大图书馆公众阅读研究。我们同卡特总统的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博士交谈中对美国国会表示不满。他说:“我也不同意国会议员中的某些看法和他们通过的这类决议。不过,我告诉你们,他们的讲话和通过的决议未经参众两院通过和总统签署,根本没有法律效力。”他讽刺说:“这些议员甚至可以通过决议说,月亮是奶酪做的。我们(政府)不管也不理它。”说完哈哈大笑。里根总统的安全助理里查德·艾伦是有名的亲台官员,我们同他也有来往。在他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们当面质问他,美国制定的《对台湾关系法》是干涉中国内政。他说:“不是呀。”我们追问说:在《对台湾关系法》中,美国威胁要在台湾海峡动武,这不是干涉中国内政吗,你难道没有看过?他说:“我当然看过,不是这个意思呀。”我说:“你最好再仔细看一遍吧!”这段对话在记者会上引起哄堂大笑。

美国的媒体更是五花八门,什么观点都有,对中国议论纷纷,当然有许多偏见,包括一些恶意攻击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我们在美国期间,影响很大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支持两个中国的社论。我们针锋相对,他们每发表一篇反华社论,我们也回敬一篇评论反击。他们有一篇社论,骂美国政府对华让步,标题是“软骨头外交”,对中国说了一些坏话。我们当天赶写一篇评论,标题是《华尔街日报的背脊骨有多硬?》一家美国报纸把这两篇评论在头版同时全文发表,外加按语说《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用了许多冷战语言,新华社记者的评论火气也不小,本报将两文同时全文发表,供大家欣赏。这样一来一去,公开论战了好几个回合,历时几个星期,引起美国各方关注。最后《华尔街日报》给我们两次来信,邀请我们从华盛顿到纽约同他们会见和共进午餐。我们两人作了参加“鸿门宴”的准备,应约赴宴,但会谈的气氛比较缓和。虽然意见不同但双方都彬彬有礼。在这以后,我们注意到他

们社论的内容和语调也比以前克制。可见对话比对骂效果更好。

当然,完全不讲道理,蓄意歪曲事实甚至破口谩骂中国的西方媒体也有,例如不久前 CNN 的那位名叫杰克·卡佛蒂的评论员。但这种低品位的言论还是少数。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多数西方记者对中国的报道基本上是根据他们所了解和关心的事实,造谣谩骂的不多。但事实取舍,观察角度,分析观点因人而异,和我们的立场不可能完全一致,何况我们的工作也并非无懈可击。今年3月在西藏发生少数藏民闹事,西方记者的片面报道偏袒闹事者,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些对西藏问题无知的记者。它更多地反映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成见和傲慢,加上各地藏独分子幕后策划,公开煽动,以及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这些记者是不是也可以说是受蒙蔽者?西藏问题十分复杂,我们一般的中国人都不很清楚,何况那些年轻的外国记者。5月四川发生特大地震后,同样是西方媒体根据事实对中国作了大量积极正面报道。

顺便指出,我们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当记者和做研究的20多年中结交的朋友,就有不少出色的记者,评论员,电视和口语新闻的主持人,专栏作家,出版人和总编辑。他们的专业才华,机智敏锐,特别是坚持正义、忠于事实的新闻品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典型的事例如《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在该报的出版人和总编辑的领导支持下,深入调查,坚持揭发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违法活动,最终把他拉下马。《纽约时报》的记者和领导以同样的精神和勇气揭发五角大楼扩大侵越战争的证据,推动了越南战争提前收场。这种敢冒政治风险,通过新闻报道,揭露和纠正高层领导的重大错误而取得胜利的事情,在中国目前大概是做不到的。

从以上亲身经历的片断往事中,我们深感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除了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层面观察外,还有更深层、更基本的,特别是两国人民之间的问题需要双方探索反思,不是单方面的问题,更不是顶牛可以解决的。

从表面看,美国人和中国人似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动物。美国是个多元化和相当开放的

社会,除了极少数原来的印第安人外,美国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中多数是来自欧洲。他们的祖先经历了反对皇权、教会和封建贵族的政治和思想统治的斗争,包括英国大宪章运动、法国大革命、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等。虽然几经波折,受到右的复辟和左的干扰,他们终于建立了一系列民主立宪的共和国家。而且在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基础上,培育了一整套维护人性尊严,以民为本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包括对每个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独立等基本人权的保证。

这些价值观具有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普世性,不因人们主观愿望或人为制定的这种或那种主义或制度而消失。实践证明,重视这些普世价值的国家发展得快,也比较好。在那里,生命、人性和独立人格受到尊重,民主自由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人际关系也比较平等和谐,尤其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不受压抑限制,为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扫除了人为的障碍。

得天独厚的美国人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后,没有什么历史包袱,更不受什么书本上现成的主义的约束。虽然他们多数人信奉新教或天主教,但宪法规定不许在学校传教。我们看了他们中学和大学里一些教科书和供学生阅读的参考书。他们的课程里没有“政治课”,有政治科学,对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把对立的意见都摆出来。例如《圣经》的上帝创世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观点在书本上同一页并列刊载;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各有什么特点,也同时介绍,内容相当客观,供学生讨论,鼓励大家独立思考,不强行灌输。学生们应付考试,远没有我国那么紧张,因为他们的考试不强调死记硬背的标准答案,而是着重学生平日的学习底蕴和独到的创见。我们的外孙女在高中上学,临考试头天晚上,她要出门。我们问她去干什么。她说“看电影去呀”。考试结果,她的成绩很好。这件小事对我们很有启发。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右三)与夫人南希(左四)到彭迪(左二)钱行(左五)家中作客(1981年于华盛顿)

美国人不重视背教条。如果说教条的话,我们看来,在美国只有两条。一条是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宣告,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另一条是美国宪法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剥夺人民言论出版和信仰等自由权利的法律。这两条很厉害,它防止了美国走向专制并为美国人在解放思想,发展自然和人文科学方面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当然,美国也有阴暗面。它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劣迹昭著。对内虽然推崇普世价值,但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实践中,这些普世价值往往在财团政客台前幕后的操纵蒙蔽下被扭曲削弱,远非完善。但美国人的公民意识很强,不迷信权威,对领导暗箱操作、蒙蔽人民、贪污腐化、种族歧视等问题,经常公开批评揭露,法律保护公民不被打击报复。反映各种情况和不同意见而且敢于揭发问题的新闻媒体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解放以来,一贯强调这种给社会带来透明度和公正的普世价值观只适用于西方,不适用于东方,特别不适用于中国。这种观点,违反事实,不是人民的意见,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意愿的歪曲。回头再想想中国专政的历史,看看中国的政治现状,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中国人民的人身安全、家庭幸福、平等自由等人权不断受到摧残剥夺。难道中国人对不断被灌输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其他名义的专制主义情有独钟、真心拥护,

不想享受自由平等、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吗？如果中国遵照国家宪法，实行言论自由，让人民作出选择，可以断言，中国人定将突破禁区，明确表示，他们最迫切需要和渴望的是以普世价值观治国兴邦，取代种种违反人性、压制个性的专政理论和专制政体。

最近发生的特大的四川地震可以见证，中国人不需要什么违反人性、人道的专制主义。他们自动自发地选择了反映普世价值观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精神。无需上级指示，地震就是命令，生命至高无上，救死扶伤第一。全体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党政军民，不分上下，来自四方，以忘我的勇气，冒生命的危险，万众一心，分秒必争，投入抗震救灾的工作。大家响应胡锦涛、温家宝的号召，只要一息生命的希望，就要作百倍的努力。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幼被无数无名英雄抢救而起死回生。新闻媒体摆脱了平日上级的清规戒律，以独立负责精神，深沉厚重的感情和最快的速度，冒极大的风险，奔赴最危险的灾区，忠实、全面、生动、透明地报道和反映了这场既令人悲痛又感人的情景和中国军民的勇气和智慧。每天24小时的电视把全国人民和国外观众带到现场，牵连着亿万人民的心弦，鼓舞着人们夺取胜利的斗志和信心。这里没有什么等级区别之感，人人都是真情实意，听不到那些铺天盖地的套话空话。

中国领导历来担心泄露“机密”，尤其怀疑外国人居心叵测，每逢重大事故灾难，就急忙关门闭户，封锁新闻。这次大不相同，一开始就相信外国记者的良心，欢迎到灾区深入采访报道，也相信各国人民和政府的诚心好意，衷心感谢他们派遣救灾和医疗队来救死扶伤，接纳外国捐赠的

药品、物资、食物、饮用水等援助。又是一夜之间中国成了一个充满人道主义和国际友情的地球村。它有力地证明，尽管各国具体情况不同，但人类的基本基因是共同的。普世价值观不仅属于西方，它同样属于中国。

在这个复杂和多元化的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观点、看法、做事的方法不同是正常的。外国看中国，中国看外国，都有不顺眼的事情。但只要各国都怀着人类是一家人的感情，平等对待、相互尊重、和平协商、求同存异、加强交流、互相学习，就能争取同舟共进，异曲同工，达到双赢或多赢的胜局。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更应该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欢迎各国善意的批评，虚心学习先进的文明，充分发挥东方文化的亮点，胸怀大志，勇敢面对世界，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重新认识自己并与世界心灵沟通，不要为了维护高度集权难舍难分的政治制度和盘根错节的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借口中国特色，对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但愿人为的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冷战思维的对立逐渐从地球上消失，使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观，殊途同归，井然有序地覆盖全球。

彭迪、钱行早年就读燕京大学，1944年同赴延安，都在新华社工作，1946年开创英语广播，钱行是第一个播音员。建国后他们在新华社担任要职，又是新华社最早和最久的驻外记者，写了大量有影响的国际评论和通讯。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炎黄春秋》创刊 15 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售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论 孔 子 学 说

吴 江

今有“论语热”，探讨孔子学说，宣扬传统文化，善事也。究竟什么是孔子之学？兹从旧作中摘出一些段落，供“百家”评议。

——作者注

孔子学说是儒家学说的开创学说。我说“开创学说”，是说孔子本人的学说并不包含我们现今所讲的儒家学说的全部，甚至也不包含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的全部。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就说过：“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韩非子·显学篇》）韩非是

研究过孔子及孔门各家学说的，他的这个问题提得有道理。战国时代几个大儒，取舍已很不相同，如孟子取“仁”，荀子取“礼”，子夏居魏地，为魏文侯师，他是传经大师，又和法家关系密切。看来，他们同是儒家，同传孔子之学，但各有侧重或创新。战国以后就更是这样了，像董仲舒、程朱陆王，他们的学说距孔子的原始儒学尤远，尽管他们都自称孔门嫡传，都表示虔诚地拜在孔子的门下。

对原始儒学，即孔子本人的学说，现时代的人认识也不同。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奴隶说话，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封建立言。有人说孔子贵“仁”，有人说孔子重“礼”。有人把六经看做孔子的学说，有人不以为然，以为那不过是周的旧籍，如此等等。两千多年前的事，或全亡无征，或其征不足，或有征而解释不同。看来，不仅孔门后学难以考订，就是孔子学说的有些内容也难以考订。有



祭孔仪式

些问题已经打了一二千年的官司，恐怕还要继续打下去。不过困难虽然有，我们还是要勉力来做这场官司的一方。因为关于孔子的学说，剔去种种超时代的增饰，毕竟还有线索可寻。

—

研究孔子，根据什么？无非是根据有关书籍记载和所处的时代。孔子十五志于学，二十四岁葬母时就有门人帮忙，但他的著述生涯却开始得较晚，根据周卜官和史官积累的材料整理出六经时已近七十岁了，修订《春秋》是在他死前的两年。有人说，六经即孔门儒学。六经为古籍古事，经孔子删定，孔子当然是立意宣扬并有所寄托的；有的可能是作为珍贵的掌故文献保存下来。《列子》记杨朱的话说：“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六

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在平王东迁时丢失一大部分,春秋时所剩无几。加之,原来在王室掌管书籍的缙绅先生们这时多已离散,各自找饭吃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删定六经,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大批有价值的古文籍,实属难能可贵。

现在我们研究孔子,主要根据四部书。一是《春秋》。孔子用鲁史官所记《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凡242年。《春秋》这部书对于孔子来说与其他经书大不相同。孔子自命为“继周者”,且自命为下一代的“新王”。“新王”之礼就寄托在《春秋》里面。孔子说:“吾志在春秋。”孟子也曾转述孔子的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孔子在周道衰微时通过修《春秋》以拨乱反正,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是著作,也是著作。历来人们公认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于正名分、立名教,有褒有贬,使乱臣贼子惧。所谓“正名分”,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夫妇、贵贱尊卑等各符其名,各守其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就以《春秋》为最高标准。古代中国一以贯之的宗法等级思想,以及奴隶制宗法等级思想与封建制宗法等级思想的一致性,都充分地表现在《春秋》一书里。

二是《论语》。关于《论语》的源流尚有争论,但一般认为《论语》系战国时孔子的再传弟子据说是曾子、有子的门人)编纂而成,非孔子亲笔。康有为认为,《论语》虽出自孔门弟子之手,战国时儒分为八,则难免“各尊所闻,各明一义”,就难免有战国儒者的一些观点掺杂其中。因此,《论语》尚不足以尽孔学的全貌。

三是《易经》。据《史记》载,《易经》的一些卦象辞、爻象辞是孔子亲作。孔子的重要哲学思想反映在《易经》这部书里。这里附带说一下,《易》一般认定是殷末周初的作品,但后来郭沫若提出新说,认为《易》是战国初年的作品,姑存疑。

四是孔子删定的《仪礼》十七篇及其他礼学著作。孔子生前大声疾呼以“复礼”为己任。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正名分的思想,在《春秋》中已有充分表述,《春秋》不妨说就是一部礼学著作。《仪礼》十七篇,其中最重要的是《丧服礼》一篇,孔子弟子卜子夏特为之作传,其中亲亲尊尊长幼

男女有别那一套规定得最具体清楚。此外,阐明孔子礼学的,还有汉时儒生所编的《礼记》一书。此书有些篇目如《中庸》《礼运》,记载孔子一些言论,其价值不低于《论语》,可以补《论语》之不足,明《春秋》之未尽。

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明白:孔子自己确实没有专著,孔子多借整理古籍或史料寄托自己的思想;再就是孔子后学追记下孔子的一些语录,片言只语在所难免。凭书籍研究孔子,由于根据不一,理解各异,见仁见智,发生争论是极正常的。因此,要研究孔子,弄清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十分重要的。

二

孔子所处的是怎样一个时代呢?孔子生当春秋末期,周王室已衰微,成了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礼废乐坏,旧的等级名分被破坏,宗法秩序被搅乱,尊王之风殆尽。这就是孔子所谓“乱臣贼子”的时代:天子失政,诸侯互攻,大夫争国,私门斗公室,弑君弑父之事时有发生。孔子所亲见亲历的就有:周王子朝攻逐敬王;鲁季氏逐昭公,阳货囚季氏;卫灵公父子争国,太子蒯聩出走,后来又是蒯聩与其子蒯辄争国;齐崔杼、陈恒先后弑君;楚平王弑灵王;吴阖闾弑王僚。此外,各诸侯尚有不少篡乱。《春秋》二百多年就记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三”。其时还出现诸多“百工暴动”,就是下层群众起来造反。在郑国就有耕奴为“盗”,太叔兴兵,尽杀之;鲁国有匠人“皆执利兵”,进攻公室;晋国人民不服从国君的命令,听到命令就像遇见强盗似的纷纷逃走;齐国由于公室加重剥削,人民受不了饥饿,纷纷逃到待遇较好的陈氏家中去,等等。这些事件反映了时代的大变动,即所谓“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这种情况在旧统治者眼中自然是礼崩乐坏,“上下失礼”。礼制被破坏,是当时统治者最头痛的一件事。“礼,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一年》)“无礼必亡。”(《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旧统治者自然要竭力维护礼,力挽礼的颓势,使反叛作乱者复归于礼。

其时,法家学派尚未形成,一些有远见的政

君”说、“仁恕”说等等。

若问我的看法如何,我的看法是:孔子之学以礼为首。孔子本人的论述甚广泛,针对不同问题所说的话,其侧重点往往不同,“贵仁”也是事实。但是,就孔子在他那个特定时代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来说,我以为,提出孔子本人的学说的着重点在“礼”,孔学主要是礼学这个看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下面我就来谈谈为什么说孔学主要是礼学,并说明孔子如何处理礼与仁的关系。

三

首先,当然需要弄清关于“礼”的含义。据查,“礼”在《诗》、《书》中并不多见。禮字从示从豊,大概从祭器出来,最早是古代宗教的一处仪式。所以《礼运》说:“礼所以宾鬼神。”后来逐渐衍变成一种行为规范了。这种行为规范又是根据名分即宗法等级来确定的。统治者将这种行为规范编成一代的礼,就出现所谓“夏礼”、“商礼”、“周礼”等。三种“礼”不相同:“夏礼”已难考订;殷人是“先鬼后礼”,即先鬼神后人事;周人则以礼为先,先重人事,对鬼神则敬而远之。《左传·隐公十一年》引孔子的话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可以认为是“礼”的质的规定性。所谓“经国家,定社稷”,就是维护凭血缘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国家及其制度;“序民人”,就是分等级,别尊卑贵贱;“利后嗣”,就是维护世袭制。所以,“礼”是指社会制度(主要指宗法等级制度)、各等人的行为规范(即名分)、社会秩序等上层建筑而言,其含义要比作为伦理道德观念的“仁”宽广得多。君臣、父子、夫妇以及“上”“下”之分;君子(“统治者”)小人(“被统治者”)之分,都在“礼”内。下面关于“礼”的话都摘自《左传》:“夫礼,所以整民也”;“礼,国之干也,礼不行则上下昏”;“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利也”;“礼是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使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等等。概括说来,礼是为了分别贵贱尊卑,各守其分,不得逾越。这种“礼”的法度,藏在尊爵彝器的神物中,名曰“宗庙社稷之重器”,亦称“宗礼”。“礼”只属于统治者。《仪礼》中说:“庶人见君不行什么礼,因为礼不下庶人”;“礼不为庶人而设,统治者对庶人只用刑。《荀子·礼

治家已提出不能单纯靠“礼治”,也要有点“法治”。所以,郑国子产制刑书(有条文的法律),邓析制竹刑(竹法)。接着,晋国的范宣子铸刑鼎,把贵族秘而不宣的法度公之于众,这种行动在当时有利于“私室”而不利于“公室”。这就引起了一场关于礼、法之争。有人对这场争论采取超然的态度,如管子。《管子·枢言篇》说:“法出于礼,礼出于俗。”意思是,俗间的习惯便是礼,礼加上强制力便是法。孔子则明确地站在“礼治”的立场上而反对“法治”。他认为“法治”就是破坏了周礼,他说:“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按:晋国最初受周封的君主是唐叔,他从周天子那里带来了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对于范宣子的铸刑鼎,孔子表示十分不满,所以说说话颇有些慷慨激昂。

孔子是不是完全否定“法”呢?也不是。孔子有几句格言式的话:“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是主张“齐之以礼”的,因为在他看来,“礼者禁于将然于前,而法者禁于将然之后”(《大戴礼记·礼察篇》)。就是说,礼能事先禁止不法行为的发生,法只能在不法行为发生后消极地予以惩罚。这就是孔子主张“礼治”而反对“法治”的主要理由。

我以为,从这场争论可以引出关于孔子学说的主旨或中心内容究竟是什么。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大政论家和大伦理家,也是大教育家。他的学说以政治和伦理为主,是积极用世的,竭力为统治者立言。他的学说,礼、乐、仁、义均包含于其中。礼、乐属于制度、名分范畴,仁、义属于伦理、道德范畴。礼、乐、仁、义四者当中,孔子究竟以何者为重,即以何者为其学说的中心内容呢?对这个问题,现代学者看法各异,取舍不一。郭沫若取“仁”,范文澜取“礼”。其他学者也是非“仁”即“礼”,或者如蔡尚思昨日取“礼”今日取“仁”,昨日取“仁”今日又取“礼”。有人甚至说,孔曰“仁者人也”——这就是“人的发现”,这个发现要早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云云。此外,关于孔子学说的主旨,还有“仁礼统一”说,“忠

论篇》也说到：“恃手而食”的劳动者“不得立宗庙”，因此用不着行“宗庙之礼”。周代还用“礼”来区分夷夏：华夏地区称周礼地区，亦即所谓“礼仪之邦”；不行周礼的少数民族，则称夷、蛮、戎、狄等等。

如果我们不把孔子的学说看成单纯的伦理道德学说，而首先是一种社会政治学说，其伦理道德也是为了挽救礼废乐坏的颓势。那么，承认孔子的学说以礼为首，他是以礼治或德治为经世之道，我想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孔子学说的实质归根结底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其理论基础是中庸之道。中庸就是“允执其中”，就是要抓住两端之“中”，要“适中”，既不可过，亦不可不及。这个“中”当然是指行为的“度”，或行为的“标准”。那么，这个“度”或“标准”又是什么呢？《礼记》载子贡问孔子，怎样可以称为“中”？孔子答：“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就是说，礼是一切行为的度。仁、孝、忠、治国、外交、军事、经济、教育、音乐、敬神事鬼等，都要以礼为标准。人的一举一动，饮食、衣饰、乘车、谈话、交友、见贵夫人等，都要合乎礼。《礼记》还记载孔子下面这些话：“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哀公问》）；“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曲礼》）；“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哀公问》）。请注意：在孔子看来，道德仁义也要以礼为标准）。孔子有时讲“道”，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这个“道”，据冯友兰解释，就是“中”，也就是“礼”。我看这一解释是对的。总之，孔子讲的“礼”是千古不易之道，是“天下之正道”“天下之定理”（朱熹语）。孔子对他的独生子孔鲤说过两句话：“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孔子自称“三十而立”，是说他到三十岁才“立于礼”，才有了“立身之本”。

孔子认为周礼是最完美的礼：“周监于二代”（按：指周借鉴夏商二代的礼以制定自己的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从周”即从周礼。孔子生当灭礼僭乐之世，以复礼即恢复西周之礼为己任。他认为，夏殷周三代的礼是相沿袭的，虽各有所损益，但根本的东西是百世不

变的。孔子说过他希望“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也就是，他希望当时已比鲁国进步的齐国向落后保守的鲁国看齐，而又希望已够保守了的鲁国再恢复到文武周公那个时候的状况。由此看来，我们实在很难说孔子不是在搞倒退。孔子修《春秋》，其目的也在此。孔子说：“吾志在春秋。”就是说其志在复礼，即复西周之古，复文武周公之道。

礼学为孔学的要旨，这一点也为孔学的反对者墨子所紧紧抓住。墨子生于孔子卒后十多年，是鲁国人。少时也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墨子对孔学的了解，大概要比两千年后的我们多得多。墨子认为，孔学“其礼烦扰，伤生害事，糜财贪民”（同上）。墨子集中反对孔学的等差森严，亲亲为大，礼节繁缛，久丧为害等，都是针对孔子的礼教而发的。墨子非礼，亦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这是墨学后来过早终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起来说，孔子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所创设的关于礼的学说，以及孔子之后许多儒学大师发挥的礼论（首先是荀子的礼论），为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礼教打下了基础，其影响之大、之深是人所共知的。

四

在孔子那里，不论礼、乐、仁、义这四者在哪一场合被强调，都是围绕着礼，并最终服从于礼。关于礼和乐，孔子认为，礼不能离开乐，以乐配礼，礼才易于为人所遵守。因为，乐是从感情上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有求和、求同的作用；而乐、感情也必须受礼的节制，要合于礼、止于礼，做到“思无邪”。《孝经·广要道》引孔子的话：“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孔子津津乐道的乐经早已亡佚，一谶《周礼·大司乐章》就是儒家所传之乐经。仁义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孔子所说“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这里的“德”广义而言便是指仁义。孔子讲义，是要求人们的行动合乎礼。“义者，宜也”，要合乎礼方算是宜。所以，孔子说“仁近于乐，义近于礼”（《礼记·乐记篇》）。对以上所说，我想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还是仁与礼的关系。因此，对这个问题我

不免要多说几句。

我谈中国古代社会的深层结构时,特别对殷周奴隶社会为什么产生“仁”的概念作了一点探讨。“仁”只有“君子”,即统治者才能有,只有他们才能做“仁者”。小人“是没有份的”。“君子”、统治者互相间要按照礼的标准,对别人表现出一定的真情实感、忠恕之道;“知礼贵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按:如果离开时代,这几句话是颇有伦理价值的),以安定统治者内部,这就是所谓“仁”道。但此外,“君子”也要对“小人”表现出一定的“仁心”,即从宗族立场,晓谕“小人”们要懂得“亲亲为大”,对主人的侍奉要尽心竭力,畏天命,畏大人,畏祖宗,畏刑罚,知尊卑贵贱之大防,“遵礼不下庶人”之至理,决不做一点逾越规矩的事。这就是孔子关于“仁”的立场。至少在孔子的时代,在孔子本人,“仁”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是服务于礼的,并被礼所规定。礼义不可以无仁。但“仁”的实质内容是“礼”。《论语·颜渊》有一段:“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左传·昭公十二年》也记载孔子的话:“古也有志(按:古代也有记载),克己复礼,仁也。”

顺便说一下,后儒也是这样看待仁、礼关系的。例如,唐柳宗元说:“儒者以礼立仁义。”宋张载说:“仁守之者,在为礼也。”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说:“礼者,仁之实也。”

有人把孔子所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解释为“仁”在这里有超等级的意义,是“人的发现”,有相当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等等。持这类看法的,前者有梁启超,后者有郭沫若。梁启超赋予孔子的“仁”以超等级的意义

(参见梁启超《孔子》一文)。郭沫若则认为孔子的“仁”表现了“牺牲自己为大众服务的精神”(见郭沫若《孔墨的批判》一文)。哗然从之者也不少。他们大抵从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出发,用心是好的。我不否认二千五百年以前提出这些命题的文化价值,但我认为,这里的探讨应从当时的实际可能出发。

春秋后半期已使用“人”字,我们且不追究这个人“究竟是单指‘君子’,还是‘君子’与‘小人’都在其内。先说《中庸》所引孔子关于‘仁者人也’这句话的含义。孟子也说过‘仁也者,人也’这类话)。这话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以“人”训“仁”。仁从二人,表示两个人才能显示出仁的意义。汉郑康成(玄)解释“仁者人也”是说这里的人是“相人偶”的“人”字,偶即是耦而耕的耦(参见《礼记·中庸注》)。这就是说,“仁者人也”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与人发生相互关系才能称之为“仁”。这种解释自然是不错的,但这只是一般的解释。问题在于“仁”的关系究竟发生在何等人之间?我们已指出,孔子在当时是认为只有“君子”之间才有“仁”的关系;“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这就再把“小人”排在“仁”的关系之外了。梁启超对于这里的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相人偶)倒有一种解释。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指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君要尽君道,臣要尽



孔子学院落户俄罗斯,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揭牌仪式

臣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里全是相互关系,这就是“相人偶”。我觉得,梁启超对“相人偶”的解释是可取的。而这里的一切关系都要根据礼,用礼来做标准,就是要合乎名分。

对“仁者人也”的另一种解释,就是认为这里的人“是将‘君子’与‘小人’;奴隶主与奴隶(庶人),一律当做‘人’看待。这就是近代意义上‘人的发现’;认为这里的人已经成为‘理性的主体’;有独立的人格等等。我以为,这种解释过于牵强,是把古代的东西‘近代化’了。西方资本主义发生时期,人摆脱封建等级关系成为有独立人格和平等要求的人,成为自由理性的主体(即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可是人是自由的),这是一个摆脱黑暗中世纪的全新时代的开端。而我国春秋时代的‘人’尚远未成为这样的自由理性主体,他们仍然在等级制内的牢笼内,必须循礼‘安身立命’。《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人不能离开礼,任何人都具有等级规范性,只能委身于上下尊卑的服从关系,这样何来人的主体性和独立人格呢?所以‘仁者人也’的‘人’,也只能是依等级安身立命的无理性的存在物。不但‘小人’是这样,‘君子’也是这样。因为那时‘君子’也是具有等级规范性的,各等‘君子’人物既不会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更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都有严格的从属关系和依附关系,这就是等级社会之所以为等级社会。一般‘君子’拜见王公大人须循礼而行,自不必说,就是‘子见南子’难道能够随便便平起平坐乃至眉目传情吗?

再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个“爱人”是什么意思呢?古来讲“仁之法,在爱人”;“仁者恻怛爱人”,可谓比比皆是。只有朱熹所说“仁主于爱,而爱莫切于事亲”(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卷四》),这句话较合真义。这里的“爱”只能是等级之爱,宗法之爱。我们不可忘了:“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这一点很重要。根据“亲亲为大”的原则,这里的“爱人”主要是爱父母,爱宗亲,以爱父母、爱宗亲为仁。孔子讲“仁”包括恭、信、忠、恕、惠、敏、智、勇、孝、悌等。其中,孔子以孝悌为“仁之本”;也可以为“爱人”作注释。那么,“君子”又如何爱人呢?韩非子有一个解释,他的解释又

是引用孔子的话:“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这就是说,“爱不可逾越等级,要循礼而爱。士只能爱其家,不能爱官职;大夫只能爱其官职,不能爱境内;诸侯只能爱境内,不能爱天下。若过其所爱,即爱其所不当爱者,如士觊觎官职,私室觊觎公室,诸侯觊觎王室,那就是野心分子,就是破坏礼制,就是不仁。”

那么,能否将“仁者爱人”解作“君子”爱“小人”呢?

大概与孔子同时的人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孔子卒后才出世的墨子,是以讲“兼爱”著称的,有人甚至把墨子的“兼爱”精神誉为“小基督,大马克思”(梁启超语)。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墨子的“兼爱”究竟是怎样的呢?《墨子·兼爱上》阐述其兼爱的理论,说天下之乱皆起于不相爱:“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而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而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盗爱其家不爱异室,故窃异室而利其室;贼爱其身而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大夫各爱其家而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而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墨子的“爱”的理想世界是:子爱父,弟爱兄,臣爱君,而不是只知自爱自利。这里丝毫没有废除等级之意。特别是他提到盗贼应当爱异室、爱人,而不可窃异室、贼人,大夫应当爱异室而不可乱异室,诸侯应当爱异国而不可攻异国等等。由此看来,墨子似乎也难逃反对“乱臣贼子”,甚至反对“百工暴动”之嫌。不过墨子的特点在于,他尚同,但又承认天子、三公、诸侯、卿大夫的尊卑等次,所以墨子的“爱”其实也是“等差爱”;此外,他还劝告统治者学大禹过勤劳艰苦的生活,甚至放弃剥削,这自然是一种空想。墨子的学说自相矛盾处甚多,这大概是儒墨争论中墨家敌不过儒家的一个原因吧!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孔子在讲“仁”时提到的“人”和“爱人”这件事看得不重要。孔子这样说至少表示他在调节当时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方面采取了相当灵活的态度;“和而不同”的态度。孔子重“人”而不重“神”。孔子的确不愧为“时髦圣人”(圣之时者)。但孔子对于他所说的“人”却是不折不扣的礼本主义者,一切以礼为准,而非近代意

义的人本主义者。

孔学“立于礼”，礼源于宗法。孔子贵仁，仁本乎“亲亲”。只要宗法等级制度不变，社会制度虽变易，封建制代替了奴隶制，礼学照样有生命力。“圣王之道莫善于礼”，诚然是百世不易之论。

以上是孔子时代的“礼”“仁”关系及“仁”的含义。在孔子那里，“礼”是全部行为的规范，“仁”属于伦理道德及内部性情的显露。到了距孔子一百七十年后的孟子那里，“仁”在儒学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仁”的含义也不同了。庞朴同志根据1993年湖北省荆州市郭店村一号楚墓出土的一批竹简，考定孟子开拓一条儒家向内求学的为学之路，着眼点不是外在的天道或天命，而是天进入了人心，形成人性，直接给人以命令和命运。这就是“仁”。这个“仁”包括三个方面，即性与命、性与情、性与心。这也就是孟子的所谓“心性”之学，亦即“仁”学，它使儒学进入了一个新境界。这也是孟子继承和发展孔子之学的主要之点。

五

现在回到礼学本身来。六经《诗乐合一》又称《五经》中的礼，原只是孔子删定的《仪礼》十七篇，后来才有《周礼》《仪礼》《礼记》三种。《周礼》并不是相传周公制作的旧典，它是战国时候才出现的，战国儒者将夏商周各时期的官制（这些官制在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可知并非捏造）汇编在一起，加上儒家的政治理想（如井田制），才成此书。孟、荀都不讲《周礼》，可见此书出现在孟荀之后，或者在汉时才开始流传。后世人的托古改制，多从《周礼》找根据。王莽的“王田”，就是根据《周礼》的井田制。张载也重《周礼》，认为治天下不用井田，即不会太平。王安石更发《周礼》，作《周礼新义》，作为变法的根据。直到太平天国、康有为，还是这样。《礼记》则是西汉儒生戴德、戴圣两人博采孔门后学所记关于礼的文字（孔子、荀子的居多）编纂而成，共一百三十九篇。《大学》、《中庸》就是其中的篇章，被宋儒抽取出来独立成书。

孔子之后，礼学有三变，或者说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我在此约略做些说明：

第一阶段。战国时期有两位儒学大师，其中

如上所说孟子发挥了关于“仁”的学说，对发展儒学影响极大，其中还有不少“民本”思想；荀子发挥了关于“礼”的学说。荀子（荀况）是先秦儒家中最后一位大师，他继承并发展孔子的礼学，集中表现在：在进入封建社会后，他第一个将西周之礼加以损益，在旧的等级名分破坏之后，建立起新的封建的等级名分。为此，他将礼、法两者结合起来，礼还是第一位。

和孔子一样，礼是荀子学说的最高范畴。荀子为礼提出了一个理论根据，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术，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篇》）。接着，他提出“礼有三本”：第一本“祭天地”，第二本“尊祖先”，第三本“隆君师”。这第三本就是确立封建君主的绝对权威和独尊地位。孔子作《春秋》是为奴隶制正名，荀子作《礼论》是为封建制正名。《荀子·富国篇》再三申述：“礼者，贵贱有序，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所称也。”“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天下之通义也。”荀子特别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都要各安本分，这是万古不变之秩序（《荀子·王制篇》）。孔子最重视丧服礼，荀子也主张“三年之丧”，并严格规定丧礼的等级制度，如天子棺槨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等等。

荀子主张礼法并用。他提出“圣人以明礼义而起法度”的命题，认为人主要图治，第一要“明礼”，第二要讲“法度”——“法者，治之端也”。但用礼用法，荀子是有区别的。他认为，制礼的是圣人，行礼的是王公大人。所以，天子至尊至贵，握最大权力。故自天子至士，按礼分禄，是合理的；众庶百姓不知礼，必须用刑法来制服，使之出力生产，以供养长上，这也是合理的。所以，荀子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度制之。”（《荀子·富国篇》）。

总之，荀子的礼论是直接继承孔子的，而又有所发展，卓然自成一家，开启了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荀子之后，像范文澜所说，儒家的礼学就不再有什么新发展了，汉代编纂的《礼记》不过是对荀子的《礼论》做点注疏而已。

西汉独尊儒学，董仲舒制定“三纲、六纪、五常”，将荀子的封建礼论在实践中具体化、制度化，这是儒家礼学的第二阶段。

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六种纳入宗法系统的关系；“敬诸父兄，六纪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白虎通义》）。

为什么称“三纲”？《白虎通义》解释道：“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阴得阳而成，阳得阴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称三纲。”这是用神秘的阴阳刚柔相生相克之道来解释“三纲”，是董仲舒这位兼擅阴阳五行学的孟派儒生的特色。关于“三纲”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有争论。梁启超曾说：“三纲”是董仲舒独创，本非孔子所有。蔡尚思在《礼记思想体系》一文中说，孔孟有“三纲”之实，而尚无“三纲”之名。孔子原就有所谓“三正”之说：“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民从之矣。”后来荀子常讲儒者重君臣、父子、夫妇三者。荀子的弟子韩非则把这三者概括为“三顺”说。西汉董仲舒才把“三顺”改称为“三纲”。（蔡尚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第355页）这说明，儒家历来以“三纲”思想为礼教的核心。

“五常”指仁、义、礼、智、信（诚），亦称“五性”。孔子也是讲这五个字的。但五字连用，并把“仁”放在首位，则始于孟子。《白虎通义》解释道：“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按：履行正道成为礼文）；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这种解释本来没什么独特的地方，但《白虎通义》却又以“五性”附会于“五行”、“五气”乃至人的“五脏”，说五行之气形成“五性”，甚至说“五性”是从人的五脏六腑出入的。这正是儒家的特点——把儒学阴阳化、神学化了。

封建统治者有系统地施行礼法，自汉代始。叔孙通定朝仪，定君臣之礼，从此臣子们不敢再在皇帝面前撒野了。过去曾溺儒冠的刘邦，这才认识到儒家礼学的重要性，所以在他死的前一年亲用太牢祭孔子，开皇帝祭孔的先例。汉末大乱，魏晋倡玄学，“礼”一度被冷落。南北朝时期，纲常

礼教更趋沦丧。隋唐以后，渐渐又有起色。到宋朝重振纲常，皇帝带头表彰“孝悌”；宋明道学家们更是编织出严密控制人们思想、生活的封建礼教网，这才使礼教重新大倡起来。所谓“道学”实即礼教之学。这就是我所说的儒家礼学的第三阶段。

在中国封建礼教史上，因为荀子将礼纳入封建轨道，礼法合一，竭力为封建宗法制度明礼，所以后世有些学者把礼教的罪恶统统归到荀子头上。晚清的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就是这样。梁启超说：“孔门之学，后为孟子、荀子两派……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按：这是不对的，毋宁说汉代经师多出孟子。）两千年间，宗派屡变，一皆盘旋荀学肘下（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谭嗣同则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仁学》卷下）谭嗣同是晚清的激烈维新派，但他只反礼教而不反孔，所以把礼教的开山祖孔子开脱了。这固然是偏见，但也足以证明荀子的礼论对于封建之世的巨大影响。

绵绵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礼教，开创者孔子，增益者荀子，大倡者董仲舒和宋明道学，他们各有千秋，但有的已超出了孔子儒学的开创范围，使之更加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礼法愈来愈严密。所以，说起封建礼教的罪恶，后来这些人（尤其是董仲舒和宋明道学家们）“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本文作者为著名哲学家，中央党校原教务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刊扩版调价启事

应作者和读者要求，从2009年1月起，本刊篇幅从84页增加到92页。由于扩版和纸价大幅上涨，自2009年1月起，本刊定价从5.80元提高到6.90元，全年82.80元。

炎黄春秋杂志社

2008年7月

追溯中共初创时期的历史

《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序

李锐

交给我的这部书稿《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就它的原始材料而言，已经搁置了整整半个世纪。采访者、整理者、编辑者是同一个人，近现代史专家王来棣先生，她让我写篇序言，乐意为之，是自己也可增长见识。

上个世纪 50 年代起，来棣先生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从事现代史研究。她被指定研究中共初建时期的历史。由于文献资料极少，研究困难很多，她从口授资料的搜集入手。那时，经历过中共初创时期历史的当事人，还有不少健在。1956 年中共八大召开时，来棣先生请求所长、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介绍她采访有关的外地代表。范老热情相助，介绍她采访了李达、冯白驹、曾希圣，以后又介绍她采访了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到 1957 年，她先后采访了二十多人，还包括陈望道、施复亮、沈雁冰、邵力子、杨之华、丁玲、王一知、徐行之、董锄平、朱务善、刘仁静、于树德、邓颖超、刘清扬、贾石亭、马馥塘、黄秀珍、吴德峰、夏之栩、萧三、陈公培等。整理出来的访谈录稿，受访者大都作了仔细修改、补充和订正。她还搜集了不少文献资料。

研究刚刚有些进展，来棣先生的家庭突然遭遇了一场“横祸”：1957 年那个“急风暴雨”的夏天，夫君许良英先生因仗义执言，被打成“极右分子”，她本人因此受到牵连，被开除党籍，研究中共历史的资格也被取消。访谈计划不得不中止，采访记录连同搜集的文献资料全部交公。后来所里倒将资料退给了她保存。然而，1966 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一来，造反派威逼她交出材料；在极度恐惧和愤怒的情绪下，她不得不忍痛将可能引起麻烦的资料付之一炬。所幸的是，大部分文章的原始记录保留了下来，这才有了这部书稿。

时间过去几十年，有关中共初创的历史资料，如今有了较过去更为丰富的发掘。但是再丰富的发掘，像来棣先生这样的访谈，肯定是不会再有了。当年访谈的对象都已作古，无一在世。当年受访者为尊者讳，或在整理稿中直接删节，或叮嘱采访者删节，隐去不少史实；此次编书，来棣先生将原始记录稿和修改稿一并收入，以便读者对照阅读，既反映当事人对历史叙述的原貌，也能使人感受极左意识形态和专制政治给人们带来的局限和恐惧。唯其如此，这部书稿更显出研究的价值。

我有过与来棣先生类似的经历。50 年代初，在湖南省委宣传部工作，曾费力搜集过毛泽东早年的生平资料，同毛泽东早年的师友亲属周士钊、李达、毛宇居、易礼容、陈书农、蒋竹如、田士清、薛世伦、王季范、张干、罗元鲲、杨开智、李醒安等人作过交谈或托人收集过资料，向当时被关押的相关当事人彭国钧、熊梦飞做过了解；还在图书馆积满灰尘的旧报刊中、在准备送造纸厂化纸浆的废纸堆中，翻找出不少难得的史料。经过整理，编成了一部《毛主席旧作辑录》，印了 50 本。但招来严厉指责：“有害无益”，并要求全部上交。我当年三十多岁，血气方刚，索性发愤著书，写出一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90 年代再版时改名《早年毛泽东》）。书正是来棣先生罹祸的 1957 年出版的，其时我巴“金盆洗手”，不事文字、转行水电，投笔从工了。两年后，我也遭

遇 横祸”，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 反党集团的追随者”，开除党籍，发配北大荒；文革”中更是被关进秦城监狱，二度坐牢 延安 抢救运动”时曾关过保安处），直到 1975 年出狱；文革”结束后才平反复职。

来棣先生的书稿，追溯的是中共初创时期的历史。近些年来，我一直主张要搞清楚三个问题：党、理论、历史。因为这个党、这个党所奉行的理论，对于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乃至今天的中国现实，已经发生、仍在发生或许还将发生至深且巨的影响。这部书稿正是探究这三者的源头，一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说：“访谈录的中心内容是学习十月革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走俄国人的路”。

中国人学习十月革命“走俄国人的路”、建立共产党，是 20 世纪最初二十来年的事情。20 世纪初叶的中国，处在一个思想激荡的年代。辛亥革命打倒了最后一个皇权，却没有摇动专制主义的基础；建立了中华民国，却远没有实现真正的宪政。先是帝制复辟，后有军阀混战，一片乱象和衰象。思想界、知识界开始寻求新的救国济民的良方。一时间，党派林立，异说杂陈。各种学说、主义中，“社会主义”成为最时髦、最新潮的一种。所谓“社会主义”，其实包含了诸多流派。瞿秋白说过一段为研究者广为援引的话：“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 19 世纪 40 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中共早期创始人原来大多信奉无政府主义，在“纷乱”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中，最终选定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

促使中共早期创始人做出这个选择的，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我们最熟悉的说法，就是毛泽东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中国人知道马克思而言，毛泽东所说并不准确。有充分的文献证明，俄国十月革命前，中国就有人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了。甚至有零星的中译文马恩著作。就对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作用而言，毛泽东又没有说错。中共早期创始人几乎都是十月革命以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不必说了，来棣先生访谈的林伯渠、沈雁冰、邵力子、邓颖超、刘清扬、夏

之栩、陈公培等人都回忆了十月革命对自己的影响。十月革命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了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呢？从他们的自述看，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十月革命后，俄国苏维埃政府宣布放弃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二，十月革命从制度上解决了俄国的问题；第三，十月革命采用了动员群众、组织军队、武力反抗的手段；第四，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被描绘成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凭着对十月革命的这些传说，他们心中的天平开始倾向苏俄，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又在共产国际来人的直接催促下，建立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党。

对十月革命，中共早期创始人终究还是“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的”。参与筹建上海中共早期组织的陈公培在访谈录里就坦陈：“当时我们对十月革命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岂止“模糊”，今天看来，应该说是蒙蔽。单说所谓放弃不平等条约，苏俄除了一纸空文并无任何实际行动外，甚至连“放弃”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还要求中国政府通过与苏俄的谈判，使它在外蒙驻军“合法化”。无怪乎今天有学者指出，这是在宣布“放弃”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又在增添新的不平等条约。（朱正《解读一篇宣言》）可是当年的中国人却被蒙在鼓里，还“无任欢喜”。

重要的还在于十月革命本身。有学者指出，今天披露的大量历史文献表明，那场被称为“震撼世界的十天”的攻占冬宫起义，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只是发射了一颗信号弹，用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当天通告的说法，是“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所谓“震撼”，无从谈起，即便起义发起者也相当低调。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其实是十月革命只响了一炮。倒是两个月后，1918 年 1 月 5 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府调集军队进入首都，强令解散立宪会议，要求将权力交给苏维埃，这个事件真的是震撼了俄国，引起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各种政治力量的强烈不满甚至愤怒。连左翼作家高尔基都悲愤地说，布尔什维克用“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美梦”！这场所谓“第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毁坏了“二月革命”的成果，中断了“二月革命”开启的由专制传统转向宪政民主的进程，革了“宪

政”的命，演变成了一场从“专制”到“专政”的改朝换代的战乱。（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对此，当年中国人竟有“酷爱自由、真理和主持人道正义”的赞誉。十月革命事实的真相从一开始就被掩盖了，连后人都是今天才知晓，遑论当年的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从俄国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是俄化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后来还加上斯大林主义）。毛泽东那句名言，说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耐人寻味的。列宁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有许多相异和相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变种。比方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了生产力时，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几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胜利。恩格斯明确说过，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建成。而列宁偏偏要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封建帝国俄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偏偏要说一个国家也能建成社会主义。还比方说，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就把它变成共产党专政；斯大林则将党专政干脆简化为领袖专政，实际上转化为他个人专政，而且是不受任何制衡的个人专政。于是，中国人接受苏俄的观念，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苏俄革命和俄化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被神化了。中共党人不仅对它的动员手段和暴力手段情有独钟，而且对它后来建立的专制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严酷和铁腕的党制无比向往。过去不是有一句话吗：“我们就是一边倒”，还说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无论是苏俄革命的经验，还是苏联的专制制度，无论是列宁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都是对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等人类普世价值的背离。十月革命74年后，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事实证明，背离人类普世价值自由、民主、科学和法治，脱离人类文明依靠科学知识即智能发展的规律，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都只能为自己敲响丧钟。这个结果，是中共早期创始人始料不及的。

但是，中国人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并不全是外界因素使然。中俄两国国情相近，产业落后，基本上是农业国度，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比较起来，中国更加落后，更加缺乏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两国都有长久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

又没有经历像西欧那样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样，比较起来，中国三纲传统的专制主义历时更长，国民处于蒙昧状态，普遍存在奴隶主义的人格心态，根本不具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等近世文明理念。中国与俄国又有不同，近代以来中国受外国入侵，是在被动的条件下开始发展产业，从农业社会向工农业社会转型的。这种社会转型不仅费时（到现在也没有完成），而且畸形（既受到外国资本的驱动，也受到外国资本的挤压），付出的社会代价极高而鲜见成效。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先进的中国人步履维艰。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中滋生出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毛泽东1921年元旦说的一段话，极有代表性：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以下几种：

1. 社会政策；
2. 社会民主主义；
3.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 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文集》第一册）

在毛泽东看来，议会、自由等等这些是“走不通”的路子，只有列宁的“激烈共产主义”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

上述这些，说明中国有着移植俄式革命的适宜土壤和气候。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民智未开的蒙昧状态，奴隶主义的国民人格，加上乌托邦式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大同”想像、激进主义的心态，使得苏俄革命和苏联模式很快就在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并且浸润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其结果是，具有启蒙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五四时期高扬的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倡导人权、自由、公正、宪政，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而抛弃，尤厌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列宁主义、斯大

林主义。在价值取向上,中共早期创始人转向崇尚革命而鄙视改良,崇尚突变而鄙视渐变,崇尚暴力而鄙视和平,崇尚对立而鄙视妥协,崇尚群体而鄙视个体,崇尚党性而鄙视人性。刚刚朝人类文明主流接近的中国,再次脱离人类文明主流的轨道,并且渐行渐远,完全背道而驰。

毛泽东们选择的“俄国人的路”,帮助中共党人经过共产革命,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是终究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迟滞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执政以后,毛泽东和中共完全按照苏联斯大林模式,建立经济上垄断、政治上专制、意识形态上舆论一律的制度。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要充当国际共运的领袖,要把中国建成国际共运的新样板,不仅把“苏联的今天”变成了“中国的今天”,而且使“中国的今天”大大超过了“苏联的今天”。从镇反、肃反、合作化、反右派到“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已,生灵涂炭,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上亿人受到牵连,上演了一幕幕愈演愈烈的人间悲剧,使得国家、民族和社会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迟滞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80年代以来,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建设的重心,走向市场经济道路,举世公认,物质成就斐然。但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依旧禁锢重重,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钳制异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得不到真正维护。所有这些,反思起来,都要从上个世纪“走俄国人的路”追根溯源。

我们应该感谢来棣先生。她的书稿,提供了回顾历史的资料,有助于人们反思。经过八十多年起伏不已的共产革命历史,特别是经过五十多年劫难相继的当代历史,我想,今天的反思不会再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了吧。

2007年12月9日

(本文作者为中组部原副部长,曾任毛泽东秘书)

(责任编辑 杜晋)

广 告

大午温泉度假村

大午温泉度假村位于保定市徐水县,距北京110公里(京石高速徐水出口),是以大午温泉地热井为依托兴建的一处园林美景。

大午温泉地热井深3003米,井底水温62℃,出井水温56℃,日出水量达1200立方米。温泉是地壳深处经过几亿年的蕴酿而成,含有多种具有活性作用的微量元素,如钙、钠、镁、钾、锶等离子,有一定的矿化度。大午温泉水质卓越,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

大午温泉度假村地处乡村田野,绿树环抱,鸟语花香,清幽娴静,远离尘嚣,初入使人有世外桃源之感,可谓“源于自然、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若天成”。度假村下设温泉贵宾馆、温泉佳宾馆、温泉游泳馆、温泉露天池及大午企业文化主题公园,馆内设休闲大厅并配备大、中、小型会议室,集温泉沐浴、按摩保健、休闲娱乐、会议接待、餐饮住宿、度假旅游多功能于一体,可观赏田园风光,品尝乡村野味。宾馆高档舒适,价格低廉,服务超值,适合工薪阶层全家出游,更适合离退休老人的休闲疗养。

“古有武陵源,今有大午城”,大午的天是蓝的,水是甜的,人是善良的,诚实善良的大午人,欢迎您的光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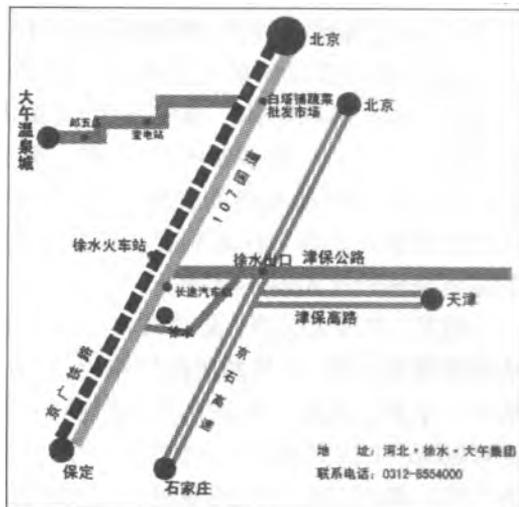
客房价目:大午庄园标间60元,温泉佳宾馆标间280元(含温泉门票48元)。

地 址:河北省徐水县河北大午农牧集团

联系电话:0312-8554000 8554999

自驾:京石高速徐水出口下,沿107国道北行至白塔铺蔬菜市场,沿大午集团指示路牌西行5公里即到。

火车:从北京西客站搭火车到保定火车站或徐水火车站。大午温泉度假村距徐水火车站5公里、距保定市25公里。保定市12路公交车直达大午温泉度假村。



地 址:河北·徐水·大午集团
联系电话:0312-8554000

亲历农村改革的几场风雨

季音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农村改革为序幕展开的。30年前,亿万农民以非凡的勇气,奋起冲破“左”的重重壁垒,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我在人民日报农村部工作,对此进行了多次采访与报道。我作为一个记者,见证了这场深刻变革的一些风风雨雨。

向计划经济射出的第一枪

乡镇企业的崛起,是农村改革的前哨战。乡镇企业过去叫社队企业,它是70年代中期开始在农村出现的一个新事物。这个新生儿一降世就遭到重重围攻。国家计划部门指它“以小挤大”,大即国有工业企业。国有商业系统指责它“破坏社会主义流通渠道”。一些国营大厂由于人才流失到乡镇企业而指责它“挖社会主义墙脚”,还有人指责它搞不正之风,等等。在农业部门内部认识也不一致,有些抱着传统保守观念不放的人,认为搞农业就得“以粮为纲”,发展乡镇企业是“不务正业”。总之,各种批评纷至沓来。可笑的是,这场争论也反映到了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内部,工商部有些编辑记者,受到经济管理部门一些干部反对乡镇企业论点的影响,也指责农村不该支持发展乡镇企业,有时双方争论得面红耳赤。

当时,江苏无锡是乡镇企业发展最快的一个县,各方面对它的压力也特别大。他们给报社来信,迫切希望得到舆论界的理解和支持。农村部的同志经研究认为,面对这场关系农村发展前途的大争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支持乡镇企业这个新生事物。我们的看法,得到了编辑部领导同志的认可。

1978年3月,我奉命来到无锡县,由县委的同志陪同,到全县一些公社和大队(当时还是人民公社体制)作了比较深入的调查,我看到乡镇企业确实为这个人多地少的江南农村,找到了一条全面发展经济的路子。我们去采访了安镇公社。这是全县闻名的困难社,粮食生产在全县倒数第二,社员生活困难。困难是因何造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单一的“以粮为纲”,只抓粮食生产,不准搞工业,副业也很少。这个公社地面上耸立着一座胶山,有丰富的石灰石资源,却长年沉睡,无人敢动。贫穷压得他们走投无路。后来几个大胆的干部带着社员向胶山发起进攻,开采石灰石,办水泥厂、水泥制品厂,生产石英砂……围绕着胶山大做文章,工业越办门路越多,公社办,大队也办,同时又大办副业。前后3年时间,这个出了名的穷社开始富裕起来了。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公社正修桥铺路,建造了8座新桥,还建起了农机站,一派生机。3年里农田基本建设的投资,超过了过去二十几年的总和。乡镇工业开始显示出它的威力。

我们还去调查了玉祁公社的民主大队。这个大队人均只有5分多耕地,过去叫它“三靠队”,即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供应,国家每年给这个大队统销粮食30万斤。这个大队的穷根也是人多地少,单一抓粮食。这两年,他们兴办起不少乡镇企业,开办磷肥厂、粮食加工厂、大型养猪场……使生产大队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业收入跃升到总收入的50%,副业收入占20%,农业收入占30%。结果,“三靠队”变成了“三贡献”队,向国家贡献工业品、农产品、副产品。

我来到无锡县的时候，正是江南春寒料峭的三月初，我冷得披着棉被在县委招待所写稿，写出了一篇调查报告和一篇社论的初稿。1978年4月5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了我执笔的题为《社队企业要有个大发展》的社论，和无锡县的调查报告《农业高速发展的途径》。这篇社论在送审时得到了党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肯定。

社论和调查报告发表后，受到各地农村干部的普遍欢迎，他们纷纷给报社来信，表示支持。无锡县的干部和农民更是兴高采烈。当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批评意见，认为报纸的报道背离了“以粮为纲”的大方向。

乡镇企业的崛起是我国农村走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也是向计划经济体制发起的第一次冲击。在这次冲击中，射出第一枪的是无锡县农民。

“可以”与“不可以”之争

1980年春天，我再度来到江苏省采访。

那时，正是农村改革初期，围绕着包产到户，全国正展开一场激烈的全民大辩论。这是真理标准讨论在经济领域的直接反映，双方壁垒分明。一方主张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农村推行受到农民普遍欢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主张继续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反对农村改革。由于种种原因，开始时国内不少省市领导干部，站到了反对农村改革的一边。

江苏省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来到江苏后，受到了不正常的冷遇。这是毫不奇怪的。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村改革，受到了不少省市领导人的指责。因此到那里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有些省市，不但拒绝接见记者，甚至连凳子也不让坐。江苏省领导机关向全省发出一个紧急呼吁：“坚决堵住西大门！”我到了江苏后，听到这句话甚为不解，这是何意？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要坚决顶住从西边邻省安徽传来的包产到户的意思。原来，安徽凤阳县农民最先搞起包产到户，得到了省委书记万里的坚决支持，很快就在全省推广了。西边的邻居包产到户搞得热气腾腾，生产迅速发展，东边仍处在贫困中的农民就坐不住了。可是有些领导干部却坚决不许苏北

农民学习安徽的办法，推行包产到户。

我来到江苏时，正逢省委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大会，讨论农村问题。我要求列席旁听，被对方婉言谢绝。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对我说：“我们领导上经过研究，你还是不参加为好。”我是《人民日报》记者、报社农村部副主任，应邀参加会议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我却被拒之门外，这在过去还没有遇到过。

怎么办？我想，记者活动的天地大得很，不参加会议，仍然可以在会外进行采访。我利用会议间隙，找了几位县委书记座谈，并进行了一些单独访谈。这些来自基层的领导干部，不赞成“堵住西大门”的主张。泗洪县委书记李洪来在座谈中给我介绍了泗洪县农民瞒着上级偷偷搞包产到户的情况。泗洪县是一个著名的穷县，多年来社员每年人均分配水平只有40元左右，糊口都很困难，一些年轻人出生以来就不知道白面馒头是什么味道。这个穷县有个上塘公社，更是穷中之穷。人们被逼得走投无路。1978年，有几个生产队干部壮着胆子在花生地里搞了“包种”（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词，就简称“包种”，即包产到户）。这里的沙质土壤适宜种花生，过去也有种花生的传统。由于多年来搞“大呼隆”，产量低，浪费大，到后来生产队连种花生的成本（每亩约30元）也拿不出来了。干部狠了狠心，把花生地包给社员种。这一包立即见效，负责承包的社员看到地里有了草，就立即去锄。下雨天，全家老小戴着斗笠，披着塑料布下地干活。收获时更是深刨细捡。李洪来给我说了个有意思的数字。有人调查，过去搞“大呼隆”的时候，一平方米左右的花生地里，要丢弃花生五六十粒。实行“包”的办法后，只找到了几粒。过去收花生，社员一边收一边吃，少数人还偷偷往口袋里装，从地里到村头，沿路都是花生壳。如今地头路边干干净净，很难看到花生壳，社员家里的花生囤却堆得满满的。有好几个生产队过去花生亩产只有六七十斤，现在增长到200多斤和300多斤。

李洪来说，上塘公社这两年悄悄地搞包产到户，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都有明显起色。过去没钱买化肥和农机，现在有钱买了。社员的分配水平和口粮都有较大幅度提高。这个饱受穷困之苦的农村公社，出现了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勃勃生

机。

可是，天下就有这样的怪事。上塘公社农民开始吃饱了肚子，消息传到淮阴地委（泗洪县属淮阴地区），地委主要领导人竟着了急，先后派出三批工作组来到上塘公社“纠偏”，他们批评县委和公社党委“犯了方向性严重错误”，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责令立即纠正，并报告了江苏省委。所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气候变了，农村基层干部不再一味“唯上”、“唯书”，他们口头上作检讨，行动上仍然我行我素，坚持包产到户，并逐步推广到全县。

苏北建湖县县委书记说，看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非搞不可。他举了本县近湖公社两个生产队种棉花的例子。这两个生产队是紧邻，生产条件几乎完全一样。一个生产队种了20亩棉花，长得差，虫子多，1979年亩产皮棉86斤，1980年下降到60斤。边上的南庄生产队，将18亩棉花包给了社员，又追肥，又捉虫，棉花拾掇得如同绣花一般细，1979年亩产皮棉100多斤；1980年雨水多受了涝，依然实现了增产。

包产到户不但在泗洪那样的穷县有效。比较富裕的吴江县县委书记说，他在本县摸了一下底，全县有183个生产队悄悄地推行了包产到户，凡是这样做的队几乎队队显著增产。

包产到户究竟是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还是兴农良方？这个争论其实已经延续了20年。60年代初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农民就创造了包产到户。当时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斥之为“单干风”与“黑暗风”、“翻案风”并列，凡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皆被打倒。不料，“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春风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围绕着包产到户的新争论，是从1979年开始的。党中央农业文件里关于“包”的提法，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初是提出“也可以”“允许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超产奖励。以后明确提出边远山区和落后贫困地区，长期三靠（即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可以“包产到户。中央的农业文件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但农民们把“也可以”改成了“更可以”。而江苏有些领导干部，包括省级领导干部，把“也可以”改成了“不可以”，矛盾就是这样尖锐。

这次的江苏之行，我根据采访的所见所闻，写了篇通讯，题目就是《可以与不可以之争》，发表在1980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二版头条。我在文章的最后说：“在实际工作中对某些问题认识暂时不一致，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是一个实践的过程。真正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虚心、诚实地对待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敢于否定经过实践证明是错了的东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就能不断地前进。”

一场惊动中央的鱼塘风波

“食无鱼”！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个长时间里人民生活的一个叹息。社员家庭养鱼，被斥为“搞资本主义”。生产队的集体鱼塘“吃大锅饭”，管理不善，不可能给市场提供多少商品鱼。当年在北京想要吃上淡水活鱼，是非常困难的。

1981年，广东一个叫陈处兮的读者给编辑部寄来一篇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说：广东高要县沙浦公社沙一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陈志雄，是个养鱼能手，他和妻子从1979年开始承包集体鱼塘，专业养鱼。他承包后的变化可归结为三个大，即鱼产量大增，本人收入大增，生产队集体收入大增。1979年，陈志雄的年纯收入3100元；1980年，他的纯收入增加到7250元。与此同时，生产队的收入也显著增加。沙一大队第五生产队有33亩鱼塘，过去派几个劳力管理，一年最多收鱼6000斤，扣除成本和各项开支，年年亏本。1980年下半年，陈志雄承包了这33亩鱼塘，仅半年就产鱼1万余斤，生产队不花一分钱，不出一个工，就净收入承包金4500元。

调查报告还说，对这件事，人们看法不一，发生了争论。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赞成陈志雄承包鱼塘，认为应当让这样的“养鱼能手”大显身手，这对集体对个人都有好处；也有一些人反对，认为这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争论的具体问题有两个，一个是雇工问题，一个是跨队承包问题，其中又以雇工问题为争论焦点。这位广东读者希望能够得到报纸的支持。

当时我在农村部主持工作，编辑黄彩忠同志

把这篇调查报告给了我。我读后感到文中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又感到有些棘手,因为它涉及一个非常敏感的“边缘问题”,即雇工问题。怎么办?最简单的处理办法就是把它丢进纸篓,不发表,天下太平。但我不甘心,既然实际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重要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端到报纸上,让读者自己去鉴别,去思考,去讨论呢?我决定在报上组织一次读者讨论,并请示编辑部领导,得到同意。5月29日,我在二版头条地位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的调查报告,并写了一个编者按语。按语说,这篇报告里所提出的问题在其他地方也有,确实值得议一议;“新情况给我们提出不少新问题,需要我们按照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认真探讨,求得正确解决”。接着,我们就以《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为总标题,开辟了一个讲座专栏,摘要发表读者的来信来稿。这个讨论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读者来信来稿之多超出我们预料,多数对陈志雄承包鱼塘的方式表示赞同或基本赞同,有少数持否定看法。我们选了其中22篇,陆续在报上发表,基本上把两方面的意见都摆了出来。

没有想到,这个讨论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就在讨论开始后不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华南师范学院有两个工作人员受到讨论专栏的启发,专程跑到陈志雄所在的沙浦公社作调查,用“左”的观点写了篇调查报告,报告依据的具体事实与5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报告基本相同,但这篇报告的观点是“陈式承包以雇佣劳动力为基础,脱离集体统一经营,已不属集体经济内部责任制性质,而成为资本主义经营,弊多利少,应予限制”。两位作者对人们称陈志雄为“能人”也持否定态度,总之,他们认为“陈志雄的经营方式同旧社会(资本家)实在没有什么差别”。不待说,这份调查报告所提出的问题,用过去习惯的语言来说,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不可等闲视之。

不久,由国家农委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讨论会上,《人民日报》讨论专栏提出的问题,成了会议上热烈争论的问题之一。会上散发了广东社会科学院与华南师范学院两位工作人员写的指责陈志雄承包鱼塘是“资本主义

经营”的调查报告。一位显然同意这个观点的新华社记者,根据这个调查报告,写了一份“内参”,在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发表了出来。这就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几位领导同志都作了批示。胡耀邦同志看了“内参”后当天就作了如下批示:“请润生同志注意并提醒广东省委。”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的批示是:“瑞芝并仲夷同志,此事请酌处。”两个批示都是温和、商讨的口气。赵紫阳同志的口头批示说得更明白:“承包鱼塘可以么,多收点鱼税银子就是了。”可是胡乔木同志的批示却尖锐而吓人。他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写了封信:“仲夷同志:附上材料一份(按即国内动态清样),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或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他还把这封措词严厉的信,同时抄送给了胡耀邦、万里同志和国家农委。这个批示无疑是对陈志雄式的鱼塘承包,下了一道讨伐令。

这封信下达后,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中央高层领导的意见岂能轻视?于是由省到地,由地到县,一层层讨论。省委书记任仲夷责成农委组成调查组,再赴陈志雄所在地进行调查,地委、县委也纷纷派出专人,前往查明真相,当地生产队干部与陈志雄本人,一时间几乎应接不暇。广东省农委调查组写出了一份《高要县承包大户陈志雄的情况调查》,报告列举的事实与过去的调查基本相同,但与广东社科院那两位写的调查在观点上却明显不同:报告说,“陈志雄这种以雇佣劳动为主的大面积承包带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但不能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完全画等号。因为在陈的经营收入中,大部分作为承包金交给了集体。这种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果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要先进得多。”

广东省农委的调查报告最后归纳了公社党委、县委和地委的意见说:“对推行专业承包生产责任制中出现的问题,大家认为应当从总结经验教训上去解决,并从政策上加以引导和限制,不宜采取通报批评的办法。”这就是说,他们不同意胡乔木同志在信中提出的“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的做法。广东省委同意了农委的意

见。

围绕着陈志雄事件而掀起的这阵风浪里，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即许多干部吸取了自 50 年代后期以来的沉痛历史教训，他们不再一味地盲目“唯上”、“唯书”，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基于这种认识，一场风波被顶过去了，人们没有按照胡乔木同志那封信的要求去“制止”和“纠正”承包鱼塘的这件新事，他们勇敢地保护了陈志雄。

《人民日报》这次讨论持续了三个月，于 8 月 30 日结束。讨论结束时没有作讨论总结，只在最末一期专栏上，发表了北京读者余大奴、黄克义写的题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的一篇文章，我写了个编者按语。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吴象同志以后又专程去广东高要县，访问了陈志雄，带来喜人的新信息。他在一篇报道里说：“前年，《人民日报》曾经开展过一场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提高了人们对专业承包责任制的认识，坚定了陈志雄对‘包’下去的决心，他经营数百亩鱼塘，4 年来向集体上交了承包金 14.1 万元，向国家交纳税金 2900 多元。4 年中，陈志雄还扩散了他的捞鱼花、育苗等技术，有 5 个社员被他培育成了养鱼能手，他光荣地被选为高要县的劳动模范。”

开发荒山的突破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面积大约占国土面积的 70%，其中有不少荒山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是可以开发利用的。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包产到户的推行，主要解决了农田问题，荒山如何有效开发，仍然没有闯出一条路。

1981 年秋，我来到闽南的穷县仙游，听朋友陈金添说，那里有个农民个人大面积承包开发荒山，在当地引起了争议，我和我的朋友连同新华社记者林群英，一起赶去访问了这个敢于向荒山进军的开拓者。

这个农民名叫李金耀，他精干强壮，是个典型的闽南农民。他承包的荒山名叫马山，山地面积有 1200 多亩，坐落在仙游县境的东南方，属于盖尾公社莲井大队所有。马山离大队所在地莲井村有 10 里，地处周围 5 个大队的交界处。十多年

来，大队无钱去经营，只是每年派 6 个社员轮流看管，每人每年补贴 150 元和 100 斤粮食。管山人员年年更换，还是没有把山管好，他们回村过节，山上的树木就被偷砍光。社员没有从山上得到一点好处，却年年要分担管理费。大队干部束手无策，一座好端端的山，就这样荒芜了。

54 岁的莲井村农民李金耀，眼看好好一座山长年荒废，于心不忍，便挺身而出，在 1979 年年初，向大队提出承包这座荒山。大队召开干部会和社员代表会讨论，会议整整开了两天，最后一致同意让李金耀承包，并于 1979 年 6 月的一天，正式签订承包合同，全队 32 个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在合同书上盖了章。

反对李金耀承包荒山的争议，首先发生在他的家庭内部。山荒在那里，天下太平，你跑到山上去栽树，不是招惹是非吗？何况开发荒山还要大量投资，此事既有政治风险，又有经济风险。因此，李金耀的妻子和子女一致反对。在外地工作的儿子闻讯特地赶了回来阻止。李金耀生气地说：“你们懂啥！别看是座荒山，满地都是银子，你们却看不见。”全家只好依着他。他把坛坛罐罐统统搬上山，在山上安了家，并动员两个女儿也一起上了山。他多方筹集资金，拿出家里多年的积蓄，卖掉妻子的首饰，以及老夫妻的两副棺材板，共得款 8000 余元；又向亲戚借款 27000 元；经大队介绍，向银行贷款 25000 元。总算筹集起 6 万余元的办场资金。接着，李金耀又经大队党支部批准，招聘了 20 名青壮年当林场工人，每月工资 44 元，比原来大队付给看山员的补贴费多 30 元。

李金耀开发荒山的事业，就这样开始了。他们没日没夜地苦干，盖起了 30 间简易房子，修筑了两条共 3 公里长的盘山土公路，在山上栽了大量树木和各种作物，从 1979 年到 1981 年秋，不到 3 年时光，昔日的荒山居然变得一片葱绿。

一天，我由朋友陪同，走上马山，去参观李金耀经营的林果场。李金耀带着我们一边观看满山翠绿的各种树木，一边介绍情况。他说，近 3 年间，山上共栽了杉木 7 万多株，柠檬桉 7 万多株，柑橘、芒果、香蕉等 3000 多株，还培育林、茶苗 200 万株，林地里套种杜仲、玫瑰茄等中药材 15 万多株，另外还采取抚育、移苗等办法，补植了

30多万株马尾松，现在这些马尾松普遍长到了2米多高。同行人说，过去这座荒山，被砍伐得光秃一片，早已飞鸟绝迹，山泉干涸，现在树林里又听到了啾啾的鸟鸣，山洞里又流出细细的泉水，山活了。

别看李金耀没上过专科学校，他对林业相当内行，林场的生产组织得井井有条。经过近3年的投资建设，他的6万多元资金已基本花光。林业生产周期长，单靠营林不可能在近期有大量收益，他就采取“以短养长，以山养山”的办法，在幼林地大量套种各种中药材，与县医药公司签订收购包销合同。又在向阳坡开辟苗圃，培育林、果、茶苗，向其他社队出售。在成片的幼杉林里，套种速生快长的柠檬桉，这是本地香料厂急需的原料。此外，李金耀还在山脚下包了一些耕地，种植甘蔗等经济作物，在山上办起了采石场、养猪场等副业。以上各项事业，使林场每年可有几万元收入。可是林业建设投资大，目前林场仍处于亏损状况。但李金耀很乐观，他说，再过三年，林场就能做到收支平衡，再往后，这座宝山的财源将滚滚而来。

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与马山一路之隔的对面，也高耸着一座不小的山。李金耀告诉我，那是属于另一个大队的，他们没有实行承包，只见满山荒草萋萋，树木稀疏，与林木葱笼的马山，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李金耀对我们前来参观林场，异常兴奋和激动，他泪流满脸。这是为何？他家人告诉我，李金耀自开发荒山以来，因为得不到当地领导干部的支持，困难重重，这个倔强的汉子背地里曾哭过多次。但这次流泪不同已往，这回是高兴的眼泪，因为他终于看到了北京《人民日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来到了马山，我们是第一批走上马山的国家干部。过去李金耀日日夜夜渴望他开发荒山的事业能得到本县领导干部的理解和支持，但他失望了。近3年来，只来了一些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县一级的领导一个也没有上过山，分管林业的县委副书记就住在离马山不远的地方，却执意不上马山，因为上山就意味着批准。这种个人大面积雇工承包荒山的做法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吗？党的文件上没有说过，他可不敢擅自做主。

李金耀承包荒山的事，在当地引起广泛议

论。多数基层干部和社员表示支持，认为李金耀为家乡办了一件好事，既为社会为集体增加了财富，也为村里的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那时人们对发展林业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的意义还认识不足）；一些公社和县干部则反对。分歧主要发生在：李金耀虽然全家参加劳动，但他又聘了20个社员帮工，这是不是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算不算雇工剥削？

采访基本结束，我与同行的林群英、陈金添两同志合作写了篇通讯《开发荒山的大胆试验》。

这篇通讯于1981年12月8日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发表。通讯发表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翼《福建日报》立即全文转载。他还亲自来到新华分社看我（我当时住在新华分社招待所）。对这篇报道给予鼓励和肯定，说对福建工作有很大帮助。

不几天，项南同志专程来到仙游县，登上马山，视察林场，表扬了李金耀的大胆开拓精神。接着，县委书记、公社书记也纷纷跟着上山了。冷落了3年的马山林场，登时变得热闹非凡。

项南不只是一般地参观了林场，当他了解到大队与李金耀签订的承包合同，对李过于苛刻，便帮助李金耀，与大队干部一起，重新修订了承包合同。原来合同的有些规定很不合理，比如，规定林木投产后杉木收入90%归大队，李金耀仅得10%；马尾松收入全部归大队，李金耀不取分文；等等。项南对大队干部说：“李金耀觉悟高，不计较个人得失，这种精神是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要讲政策，绝不能损害先进人物应得的利益，必须保证李金耀有合理的收入，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合同修订后，各方面都表示满意。这件事在当地传为美谈。

后来项南同志再度去视察了马山林场。他所以如此重视这件事，因为福建是山多平原少的省，发展林业振兴山区经济，对福建至关重要。不久，李金耀承包开发荒山的经验在全省推广，到1982年，已有2800户农民，承包了16万多亩荒山。国家林业部后来也肯定了李金耀承包荒山的做法，并在全国推广。大面积承包荒山的“禁区”，就这样被突破了。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原农村部主任）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感受 1978 年历史转折

汪澍白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溘然长逝,10月6日“四人帮”束手就擒,文化大革命的空前祸乱,至此宣告结束。由于继位者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因遵遗训,各项工作便只能在徘徊中龟步前进,但是,党内的进步力量强烈要求变革,到1978年便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在组织上也迅速推进了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在政治上,更通过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并在初步清理“左”倾错误和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础上,进而实现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

1978年对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对我个人的命运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联系这两方面来追怀往昔,有几点感念特深。

(一) 一场热火朝天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时,我正下放在益阳橡胶机械厂。益阳地区人民同全国各地人民一样喜出望外,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游行。游行队伍载歌载舞,有舞狮子、耍龙灯、踩高跷的,还有人演出了笑骂“四人帮”的活报剧。老百姓争相燃放鞭炮,它的残屑堆积在街头都有几寸厚。这种历史性的欢庆场面,我有生以来,只有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和1949年南京解放时亲身经历过。遗憾的是,在这一热烈欢庆之后,接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却在讲话中强调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还要继续批邓。并提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新任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又于11月18日主持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强调揭批“四人帮”要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稍后,省委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我作为益阳橡胶机械厂的宣传科副科长参加了那次会议。会上传达了汪东兴的讲话,他强调要宣传“华国锋有内秀”、“邓小平

那两下子已经试过了,不行嘛!”至于揭批“四人帮”,他不提批“左”,说重点在于批右。我原先期待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一定是一次思想解放的会议,不想汪东兴的讲话大开倒车,让我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1977年2月7日,全国各报发表了由李鑫(原任康生秘书,此时为中央理论组负责人)主持起草、汪东兴批发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文章以最权威的方式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被称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它实质上是要把毛泽东生前的最高指示和决策延续到当下以至今后。这样一来,人民群众热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与历来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要求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解放出来,要求纠正极“左”路线,发扬民主精神,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改革,等等美好愿望,都将化为泡影。

就我个人来说,只因坚认1957年《新湖南报》的反右有问题,30年来头顶上已先后被扣上“中右分子”、“右倾反党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多种帽子,总是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来。粉碎“四人帮”时,原指望有一个解放思想和平反冤案的新时期,谁知又抛出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气得我七窍生烟。

面对“两个凡是”的压力,幸好理论界、新闻界的先觉之士早就在摩拳擦掌,酝酿进行批驳。1978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成所写的《标准只有一个》,文章不长,也没有排在重要的地位,但作者的观点很鲜明:“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是批判“两个凡是”的牛刀小试。

接下来,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该报特约评论员的长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第二天由《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并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全文。

按照平常的习惯，如由《光明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那是很平常的事，现在由《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转载了《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就不同寻常，令人刮目相看。我反复阅读了几遍，深感此文理论上很深刻，政治上很准确，是一篇能够冲破“两个凡是”精神枷锁的重头文章。我又联系自己的思想，试作了一篇题为《破除宗教迷信》的文稿，但因多年没有练笔，自觉此文理论苍白，文词晦涩，不敢把它投给报刊，只好暂时束之于高阁。

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我越来越想回到理论工作岗位去。为此，下决心去省委组织部找干部处长赵培义申述我的愿望。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并且提出要我到湖南各大学去了解哲学系与马列教研室的情况，自己作出选择，然后再由组织部进行安排；这同1974年他和我谈话时所采取的僵硬态度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呢？主要是形势变了，赵的思想跟上了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胡耀邦出长中组部以后，把解决积案如山的冤假错案当成火烧眉毛的当务之急，他那种疾恶如仇和“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精神，对各地组织部门干部的确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按照赵培义的意见，我首先去湖南大学找校党委成员涂西畴了解情况，他认为湖大的领导班子思想“左”倾僵化，劝我不要在那里。第二站我去了湘潭大学，哲学系的卢枫老师表示学校还属草创阶段，但有可塑性，希望我去哲学系共同奋斗。卢枫又陪我去看望了哲学系主任沧南和经济系主任尹世杰，两人都表示欢迎。再回省委组织部汇报，干部处就于1978年8月12日正式把我的关系转到湘大哲学系来。（卢枫看到介绍信上我是行政13级，职务一栏又是副科长，他很气愤地说：如果对我这样不公正，我就坚决不接受。我说：我的态度是“追求真理，不计名位”，现在能让我归队做理论工作就算是不错的。）

哲学系主任沧南根据我的学历和经历，建议我今后担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新课程。由于这门课程在国内还没有哪个学校开设过，也没有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便派我去找北京大学向行

家求教。1978年12月我从长沙乘伊-14飞抵北京，通过原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方克的关系住在《红旗》杂志社的招待所里。然后去北京大学找1946年由我安排在爱晚亭边住过的西南联大哲学系同学邓艾民，他这时是北大中哲史教师，对我这个当年的山涧邻居（我当时也住在爱晚亭旁）很热情。但他表示自己对于马哲史并不懂行，便介绍我去找在这方面有相当基础的黄楠森请教，黄先生送给我一本由苏联人编写的有关马哲史的小册子，他表示：这一课题在中国还刚刚提出，一切要从头做起。

在住宿《红旗》杂志招待所期间，方克与我联系比较密切，他拿出一篇准备参加真理标准讨论的大文章，要我毫不客气地动笔修改。当时《红旗》的总编辑熊复是从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调来的，他于1978年5月到任时，就宣称《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是有问题的；两个月后，由于全国各地和各界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十分热烈，熊复忽然打破沉默说：“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要写，但要注意现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应强调发展与创新，不应强调新结论代替旧结论，而应强调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以坚持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写出一篇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抗衡的文章，这一任务交给了副总编方克。

方克遵命作文，拟题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经熊复请示汪东兴，汪提出标题要改成“实践论的认识论”，只讲一般的认识原理，不专门讲实践标准问题。方克觉得避开实践标准这个大家关心的问题不好，后来调和一下，将标题定为《重温“实践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初稿开篇有几句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的话：“我们认为，这次讨论不仅有利于弄清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的整个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汪东兴认为这样估计太高了，不是什么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这段话被迫全文改写。

初稿原来有一部分着重批判“四人帮”的所谓“阶级标准”，熊复表示反对。他的依据是《五·一六通知》中关于真理阶级性和批判“真理面前人人平

等”的话是毛泽东亲笔所加，批这两句话就是批毛泽东。由于有这个障碍，便避而不谈真理有无阶级性。但对彭真讲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还是违心地开展了批判，这实际上还是屈从于“两个凡是”和权力真理论的压力。

方克在湖南工作时，有两三年因住地相近，我们过从较密，他上调到“红旗”这个“左”派老根据地后，被迫撰写同实践标准唱反调的文章，我仍有一些同情他的处境困难，但却无法同意他在汪东兴等人指挥下写出的文章。故此，捧卷踟蹰数日，没有增删一字，终于原璧奉还给作者。

(二)右派翻案的胜利

我1954—1955在《新湖南报》大约工作了一年时间，1955年调往省委高干自修班当理论辅导员，也是这个班的实际主持人。1957年自修班放暑假，我搬到慎恒在报社的宿舍来度假。报社的编委从1956年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到1957年的整风鸣放，斗争都很紧张，我为了避免卷入漩涡，平时杜门谢客，不上两派朋友家门，但为了要看北京上海的报纸，便趁星期日到编委办公室去。也许是鬼使神差，当我正在阅读6月8日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时，傅白芦和蔡克诚双双走了进来，老蔡劈头就问我对老官（官健平）来报社当总编的看法。我说老官解放前在《国民日报》只当过校对，1954年在治湖工地共事，我看他政治文化水平都不行，讲话还脏话连篇。但他在益阳时就讨得周惠的欢心，周惠提为省委书记以后，在各部委都安插他从益阳和常德地委带来的亲信，报社也是他要掌控的部门，便早有选派老官来主事的意思。1954年在治湖工地，老官同我谈到省委有意安排他到报社来当总编辑。我说那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你何必挤到那里去？留在部委或下到地委去当头不是很好吗？他没有听我的劝告，报社便从此多事。

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实际上是反右派



197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斗争正式开打的信号弹，此后几个月，报社便成了湖南省反右派斗争的主战场，编委中除主持反右的官健平、孟树德是坚定的左派以外，邓钧洪、苏辛涛、傅白芦、蔡克诚、张雨林、柏原、李冰封、袁家式等8人都划成了右派，整个编辑部，打出右派54人，我的妻子慎恒因不肯落井下石，也未能幸免于难。我因6月8日那一席话惹了大祸，幸亏省委书记李瑞山原来主管审干时，对我的历史情况已有透彻了解，现在他兼管自修班的事，对我的现实表现更十分清楚。他不赞成拿我开刀，于是便将高干自修班与党校合并，由党校召集中层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对我的右倾思想与自由主义言论进行批判，定性为“中右”分子。

“中右”是一顶隐形的帽子，平时戴上去不痛不痒，一到有事时，就像孙悟空头上那顶无形的金箍帽一样，只要唐僧一念紧箍咒，孙悟空就会痛得在地上打滚。从1958年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这个紧箍咒害得我痛心切骨也有过多次。1959年周惠在庐山反水，回湖南将我这个小萝卜头也定为右倾反党分子，进行了极为残酷的斗争。这个问题平反以后，1964年从流放地上调省哲学所，所里又大搞所谓“机关革命化”，指责我与“摘帽右派”妻子没有划清界限，慎恒被逼得破指血书表示自愿离婚。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我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批斗，然后押往福田五七干校“专政

班‘劳改，爰子枣枣独居长沙，被迫害成精神分裂症。1974年冬，省委组织部干部处长赵培义找我谈话，我在回答问题时，明确表示：第一，我在‘专政班’主要是劳动改造，谈不上有什么思想上的收获。第二，我1957年就认为‘新湖南报反党右派集团’是一场错案；‘文革’期间官健平的历史反革命面目被彻底揭穿以后，进一步认清那是一场特大冤案。为此，干部处认为我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没有解决好，需继续下放锻炼，但他们安排我去千山红农场和矿山通用机械厂都被拒绝收容，最后只好分配到益阳橡胶机械厂去。回想我1945年投身革命，那时走南闯北，都还能打开局面，两次被捕在狱中的英勇表现，在会师大会上还受到表彰。自1957年6月8日直言招罪以后，到处遭到欺压、排挤、凌辱，粉碎‘四人帮’松了一口气，不料‘两个凡是’的枷锁还是紧紧套了上来，今后的斗争势必会更为曲折复杂！

然而，从长远来看，陵谷迁变，时异势殊的转折在自然与社会历史上都是有规律地发生的，进入1978年就的确出现了这种历史转折的征兆：其一是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迅速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连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和亲自拍板的《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都已在实际上被突破，否则，邓小平就出不来，拨乱反正也进行不下去。其二是胡耀邦出主中组部以后，他在信访工作会议上针对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的‘左’倾观点提出‘两个不管’：“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后来《组工通讯》全文刊载了这篇讲话，对解决包括“右派”在内的冤假错案，起到了势如破竹的推动作用。

1978年6月，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牵头在烟台召开有五个部门参加的会议，来解决‘右派’的遗留问题。会议拟定的文件提出普遍摘掉‘右派’帽子，个别完全搞错了的可以作为特例予以改正。起初我耳闻有这样一个会议专门研讨解决‘右派’问题，感到格外高兴。稍后又听到别人转述的文件精神，便有空喜一场的失落感。

胡耀邦在听取参加烟台会议的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的汇报以后，认为这个会议没有解决问题，他安排中组部政策研究室以中组部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复议。到同年9月，中央决定由五大部在北京开会，复议如何认真解决‘右派’改正问题。这次会议拟定的五十五号文件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新内容：‘对不应划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这几句话，才真正为沉冤莫白二十余载的‘贱民’放开了一条生路。

五十五号文件发出以后，‘右派’改正迅即成为新闻报道的热门话题。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单位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首先见报，民政部、各大专院校等其他单位也紧紧跟上，形成了一股改正‘右派’的热潮。

《新湖南报》反右时，整个编辑部不过143人，打出的‘右派’54人，其中党员占29人。而主持反右的官健平在‘文革’中被查明是一个伪造全部履历、混入党内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的姓名、籍贯、年龄、学历、工作经历全是假的，唯有性别一栏没有造假。由于揭露出了这些惊人的材料，那些蒙冤十载的‘右派’们从1967年起就有人在编印专刊进行申诉与翻案活动。我因对他们表示过同情与支持，多次受到过批斗与惩罚，前文略有记述，这里不再重复，只是有一件事要作补充，就是1972年夏干校宣布我获得解放和恢复组织生活时，还附加了一句话：‘有遗留问题需另作处理。’我猜想所谓遗留问题，恐怕还是1957年《新湖南报》反右那桩冤案。现在中央的五十五号文件已经下达，我得要趁热打铁，解决这个纠缠不清的难题，便赶快跑到石佳冲省五七总校政治处去查档。值班人员从档案柜中反复翻检，找出省委组织部发出的一个机密文件，内容涉及右派翻案问题，并决定给我以严重警告处分。我立马把这个文件抄录下来。回家便向省委写申诉信，提出省委组织部的这个文件有几项错误：第一，根据1978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来衡量，1957年《新湖南报》的反右明显是一大冤案，当年我同情和支持这个右派集团翻案没有错。第二，凡属省委所管的党员干部，如有违犯党纪的错误行为，应由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核查并报省委作出处分决定。组织部对党员干部作处分决定是一种越权行为。第三，对党员干部作出处

分决定,应与有关党员干部见面,给我以严重警告却对我进行封锁,岂不荒唐之至!这封申诉信没有得到及时答复,但后来省委经过慎重研究,终于下文,撤销了省组那个机密文件。我一时感到十分高兴,但高兴之余,又不免有些疑虑,根据长期上当受骗挨整受罪的经验,我的确有几分担心,谁知省委新近发来的文件所解除的是不是套在我脖子上的最后一根绳索呢?

慎恒听到我转告五十五号文件的内容,感到很称心快意,她连忙赶到报社去催促落实政策。政策落实办的干部便向她提问:你认为哪些人可以改正?哪些人不可以改正?据告,“右派”中便有人提出朱正与钟叔和是真正的右派,不宜改正。慎恒表示,朱正与钟叔和同其他人同样属于错划,只是他俩更有才学,更加值得珍视,怎么反而要排除在外呢?

慎恒回家便把在报社遇到的情况和问题同我谈了,我也抒发了一些个人的感慨。我说1957年的反右不是个别有错或部分有错的问题,而是从总体上错了;当年我同情和支持《新湖南报》反党右派集团“翻案,实际上也是要通过突破这个特大冤案来推动右派翻案的全局。现在中央的五十五号文件,并没有从总体上否定1957年的反右,却在实际上解决反右造成的全部冤假错案开辟了宽阔的道路。然而每一个问题的具体解决,往往还会有曲折复杂的斗争,朱正与钟叔和都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先进分子,他们提出的独立见解,在“舆论一律”的社会里,很可能被人们视为异端邪说,为了要肯定他们是错划的,必要时,还可以进行一番真正的辩论,把被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另外一种情况是有的人改正得不彻底,龙英华是一个很老实的人,解放前在湖南省立一中与慎恒同学,那时慎恒就介绍他入了党。1957年他在北大哲学系打成右派,1978年得到改正,但不准他恢复党籍,他自己也毫无办法。后来慎恒动员他直接写信向胡耀邦申诉,很快就解决了问题。事实表明,五十五号文件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改革派与“凡是派”反复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在执行和落实文件精神时,“右派”朋友们还得以自救解放的精神,努力去打破所在单位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为获取人权而进行韧性的斗争。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一定要努力争取右派翻案的全面

胜利,不要留下死角,留下遗憾。

(三)令人感念难忘的一次中央全会

我这次到达北京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紧张进行,但当时我一点都不知道,直到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接着举行时,40年代在湖南大学的老同学、老战友杨翊赶到《红旗》杂志招待所来看望我。他从1946年起就长期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消息比较灵通,一见面就将中央工作会议振奋人心的消息详细见告。

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华国锋等原来打算在不触动“两个凡是”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但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同志认为只有首先清理“左”的错误,才能实现工作重点的真正转移。陈云在延安时担任过中组部长,他对“文革”期间把许多老同志整得那么惨,感到十分痛心。因此,他在东北组开头炮,提出清理“左”倾错误要从平反冤假错案入手:首先要解决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对“文革”中错定为叛徒的同志应进行复查;陶铸、王鹤寿的材料,应由专案组移交给中组部复查,彭德怀的名誉应得到恢复;天安门事件应肯定是一次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

陈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聂荣臻、萧克、胡耀邦、杨得志、万里……争先响应,提出诸多历史遗留问题,要求切实解决。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由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解决有关“文革”和历史上的九个遗留问题。

从11月26日起,会议接着就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进行讨论。由于杨翊本人并没有亲身与会,又知道我最急切关注的是清理“左”倾错误和平反冤假错案,因此,他没有详细介绍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讨论情况。

杨翊走后,我不久就从报纸上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我感到最高兴的是全会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向现代化建设转移的战略决策。公报还指出:为了推进重点转移,对内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对外要吸取各国的先进经验,这样才能打破长期在“左”倾思想统治下所造成的封闭状态,开辟出广阔的前进航道。

全会公报还郑重宣告撤销了“文革”期间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关于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的错误决定,为领导核心的转移扫清了障碍。全会还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为在全国范围内平反积案如山的冤假错案树立了榜样。同时,全会还增选陈云为中央副主席,胡耀邦等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黄克诚等九人为中央委员。读到这段话时,我立即想起白居易的两句诗:“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陈云、胡耀邦、黄克诚等都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最能坚持独立思考,敢于同错误路线作顽强斗争的老同志,让这些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多参与领导工作,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都会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在几十年的“左倾”路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自相残杀中,我对党和党的领袖几乎都丧失了信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基本上恢复了对党的希望和信念,但是全会公报对毛泽东功过的表述,我还有一些不同意见。比如说,公报第一节写道:“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党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打断了,破坏了。”这段话,我看就不切实际。第一,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已决定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其后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发动反右和其他一系列阶级斗争,打断了工作重点的转移。第二,周恩来因1956年反冒进不断挨批,他的总理职权也遭到削弱,实际上难以展舒长才,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第三,从发动“大跃进”开始,毛泽东走上经济第一线,亲自领军。但他依靠的“政治挂帅”、“土法上马”、“人海战术”一类马上打天下的经验,同现代经济发展规律并不合辙,其结果是导致百业凋蔽,哀鸿遍野,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痛失败。第四,开国以后,林彪在长期养病,通过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但并未兼顾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至于“四人帮”,谁都知道那是“文革”时期扶植上台的一股邪恶势力,50年代他们并无权势,甚至还互不相识,哪有力量来打断工作重点转移和破坏经济建设呢?联系以上四点,

我感到公报还是在多方为毛泽东文过饰非。为什么要这样呢?也许是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历史转折关头,他们认为,将一些暂时难以定论的问题搁置起来,留待日后从容计议,逐渐达到认识上的一致,更为有利于党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吧!

不管党中央何时能安排时间来论定毛泽东的功过,我总认为从现在起就多有一些人来认真探讨这个问题,对明确今后的方向和道路会有好处。作为一名哲学工作者,这时候我便下了决心,要以后半生的主要精力来研究毛泽东这个课题,并给自己定下了两条规矩:第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第二,坚持独立思考,秉笔直书,不媚上,不媚俗。

岁月易逝,30年匆匆过去,回首前尘,这些年总算遵守自订的规矩,老老实实地在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但成绩却不大理想。究其原因,在主观方面,主要是1984年我到厦门大学以后,躲进小楼成一统,同学术界缺乏交流,对本身浸染很深的教条主义也没有自觉地加以清算。从客观方面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中央对经济体制改革抓得很紧,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从苏联引进的,在我国扎根不深,向市场经济转轨遇到的阻力不大,进展相当顺利,现在我国的经济实力同30年前相比,已猛增60多倍,令举世为之惊羨。政治思想领域的变革,却相对滞后。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除了仿效苏联的一套以外,还有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主义传统在发挥作用,这些“洋”“古”的结合,使我们始终没有能从革命年代高度集权的专制型政体转变为依靠民主和法制管理国家的现代型政体。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曾经打破“两个凡是”的枷锁,带来一个思想解放和政治清明的八十年代。但是,1989年的北京风波之后,思想言论失去了自由,政治权力失去了制衡与监督,而结党营私、违法乱纪、贪污腐化之类的问题则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能再来一次像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那样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旋乾转坤、改变历史的中央全会呢?我现在常常想念的,就是要争取看到这么一天。我今年86岁了,也不知在有生之年,能否实现这一美好的愿望。

(本文作者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安排境外机构救援要有预案

阎明复

5月12日下午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传来,我感同身受,心急如焚。当天傍晚,台湾佛教慈济功德会证严法师令人打电话给我,急切关注震区灾情,表示要立即派出救援队奔赴灾区参加救援,希望阎部长协助向大陆主管部门转告,得到他们的同意和支持。我因病不能亲自联系,便当即请韩全永同志向民政部救灾司报告。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民政部上上下下立即投入紧张的救灾工作,当天全永同志打电话找到救灾司负责人,答复震情尚不十分清楚是深度还是浅表地震,已发出二级响应;家宝总理通知赴灾区升级为一级响应。第二天,即13日早上,我给百忙中的中华慈善总会范宝俊会长打电话,通报台湾慈济功德会要求派人去灾区救援的信息。范会长当即表示支持。接着我又请韩全永设法找到民政部救灾司负责人转告台湾朋友的要求。在当天5月13日下午4时)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正式宣布中国欢迎境外国家、地区派救援人员到地震灾区参加救援,并说当前震区山体滑坡,交通中断,前往灾区十分困难(大意如此)。我再次请全永同志同王司长联系或发短信转告台湾慈济功德会要派人到灾区参加救援,并说“早来还来得及救人,晚来只能找到遇难者遗体”。此时救灾司负责人亦奔赴灾区,不知后来有没有收到我的意见。

据四川省新闻办5月18日下午称,5月15日至5月17日12时已有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四个国家,香港、台湾地区共七支救援队在四川灾区进行搜救工作。

其中,日本救援队于16日抵达灾区,16日、17日两天在青川、北川搜出遇难者遗体共15具。

俄罗斯救援队于16日下午17时抵达成都,随即赶往绵竹汉旺镇实施搜救,在勘察没有生命迹象后前往都江堰市实施搜救,17日21时成功救出一名中年妇女。

韩国救援队于5月16日晚抵达什邡灾区,到18日下午搜救出16具遇难者遗体。

新加坡救援队于5月16日晚抵达灾区,在德阳什邡红白镇实施搜救,未发现生还者。

香港救援队于5月17日抵达成都后,赶往绵竹汉旺镇,目前(即到18日下午为止)搜出17具遇难者遗体。

台湾救援人员5月16日到达成都,到18日下午,在绵竹汉旺镇实施搜救,搜出6具遇难者遗体,未发现生还者。

从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发布的信息来看,境外的救援团队都是在5月16日抵达灾区,也就是在5月12日下午2时28分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4天,也就是96小时后实施搜救遇难者的。尽管这些境外救援团队克服难以想像的困难,在余震不断的险境下,不顾自身的生命安全,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在废墟中搜救遇难者,但因错过了最初72小时的最佳时机,而未能救出更多的生还者。

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发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怎样在地震发生后争取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尽早尽快地到达灾区开展救援工作,必须成为应急预案的第一要素。

从这次汶川地震发生后的情况来看,12日下午发生地震,13日下午民政部声明欢迎境外救援队伍到灾区参加救援,这个开放的声明是及时的,而震区交通中断的确影响了境外救援队伍的开进。为了争取时间,似可以安排境外救援队伍先行到达中国国内邻近灾区的地方,然后视交通情况再进入灾区。不要等交通恢复后再通知他们启程来华。这些应急措施都应有预案。正像温家宝同志在灾区庄严宣称的,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用百倍的努力,去抢救生还者。

2008年6月20日

(本文作者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责任编辑 吴思)

我在海城地震时采访

周保华

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省南部海城、营口一带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此时正是十年浩劫的后期，新闻更被严密控制，社会公众是难以了解灾情、灾区真实情况的。2月5日，即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新华社才播发了一条发生地震的简讯。3月12日，播发了《国务院通报表扬辽宁省南部地区地震预测预防有功单位》的消息，同时还播发了我和辽宁分社几名记者共同采写的《辽南地震灾区人民泰山压顶不弯腰、重灾面前不低头》的新闻稿。

在上述数量少得可怜的稿件中，没有人员伤亡数字，也没有房屋倒塌的统计。稿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向国内外透露出“我国地震工作队对这次强烈地震做出了预报”，使这次地震在这个人口稠密地区所造成的损失大大减轻”的重要信息，但也仅限于这两句干巴巴的话。

33年前，我是新华社辽宁分社派出的第一位采访辽南地震的记者，而且参加了持续一个多月辽南地震报道的全过程。最近，我找出当年保留的资料，写出这篇迟到的报道，掀开蒙在海城、

营口地震长达33年的面纱。

地震办里度过难忘的一夜

1975年2月4日晚上，我吃过饭后，来到分社办公室，向领导汇报情况。突然间，办公楼剧烈地摇晃起来。我立即意识到发生地震了。分社领导当即派我到辽宁省地震办公室了解情况。我二话没说冲到楼下，坐上分社老掉牙的苏式吉普车赶往省地震办公室采访。

地震办灯火通明，走廊里人来人往，打电话的喊叫声接连不断。从地震办同志口中得知，地震发生在辽南地区，震级超过了七级，有人员伤亡。我用电话将这些情况报告分社值班员，他们再用长途电话向北京新华总社报告，最后由总社根据电话记录铅印成内参稿，直接送中南海。在当时通讯设备极为落后的状况下，这已是最快速最有效的办法了。就这样，有了新情况，我就马上打电话向分社报告。

大约在夜里12点左右，辽宁省委书记来到了地震办，这是当天夜里到地震办级别最高的领导。他得知我是新华社记者后，当着我的面指示地震办的领导：在简报没有送省委之前，情况一律不能向记者提供。我立即表示反对，说：“通过内参渠道如向中央反映情况，是党中央交给新华社记者的光荣任务，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干扰新华社记者对地震灾情的采访。”“秘书长见我态度坚决，换了个口气说：“你要考虑到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总比新华社晚，对省里的工作不利。咱们商量一下，能不能等



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6秒，辽宁省海城县发生7.3级大地震

省委向中央报告之后你再发稿。”在这人命关天的时刻，听了这种话，我非常气愤，明确地告诉他：“我是新华社记者，也不归你领导，你指挥不了我。”说完，我转身又去了解情况，忙着继续发稿了。好在秘书长一行呆了一会儿就走了，对我的工作没有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但事情并没有结束，这位秘书长后来就此事专门向辽宁分社社长孙铭惠同志狠狠告了我一状。我把当时的情况如实做了汇报，老孙略加思考说：“你没有错。当新华社记者就是要对人民负责，对党中央负责。但今后你要学会处理问题的方法，不能授人以柄。”

1975年2月4日的那一夜，我和辽宁省地震办的同志们都熬红了双眼，喊哑了嗓子。也就是在这一夜，我学会了吸烟。

全世界第一次成功的地震预报

海城、营口地震发生之后，中央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为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为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前往灾区慰问。同时，国家地震局局长也率大批地震科技工作者赶赴灾区，监视震情，并进行科学考察。分社领导把随国家地震局专家采访的任务交给了我。

瓦砾，废墟，残垣断壁。震后的海城、营口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都是一片凄凉的景象。坐在飞机里向下观望，地面上房屋受损程度呈现出波浪式，即一片废墟之后，紧接着却是一片受损程度不同的房屋，接着又是一片废墟……同行的国家地震局专家告诉我，地震发生时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像海浪一样，有高峰也有低谷，于是就产生了这种现象。

辽南是东北最为繁荣的地区，人员稠密，地震发生时正值寒冬腊月的夜晚，这些因素无疑都会增加人员的伤亡。按建筑物遭到破坏的严重程度估计，海城、营口地震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至少应在10万人以上。但事实上，这次地震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并不大，遇难者共有1328人，而且主要



在海城地震中受损的大楼

是行动不便的老人。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搞清楚了出现这一奇迹的原因：国家地震局和辽宁省地震办对这次地震做出了成功的中期和短期预报。

海城地震预报的前期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6年邢台地震以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以著名科学家李四光为首的一批科学工作者投入到地震科研工作之中。李四光教授根据地质力学的理论和地震活动迹象，明确指出“京津唐张要注意”。地震科技工作者也明确将东北的辽宁列入地震危险地区，给予了重点关注。根据邢台地震以后国家确定的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群众，做好预测预防工作的方针，辽宁城乡广泛建立健全了“群测群防”地震预测预报网。这些都为后来的中短期预报获得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973年内辽南地区小震活动增强，前兆异常出现；1974年6月全国地震会商会确认了辽宁提出的1至2年内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中期预报意见；1975年1月国家地震局又确认了辽宁提出的短期预报意见。

时间一天一天地接近2月4日，辽南地区各地震观测网点不断向省地震办报告临震前的种种迹象，其中营口市石砬峪地震台、旅大市（现大连市）地震台金县观测站、盘锦地区地震台、海城县地震观测站等众多的观测点，在第一时间陆续向上级报告出现明显地震前兆现象。2月4日0时，辽宁省地震办把临震预报意见送达了中共辽

宁省委。2月4日上午,辽南地区临震的前兆更为明显,省地震办领导心急如焚,想尽办法找到了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伯秋。李伯秋是到地方“三支两军”的军队干部,时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伯秋听完汇报后立即下达了命令:全省各市,特别是辽南地区各市、县、公社、大队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迅速组织群众撤离房屋。在农村要动用民兵逐户劝说群众离开房屋到院子里暂住,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组织群众到场院看电影的办法,把大家吸引到屋外。李伯秋的一道命令是2月4日上午10时30分发出的。海城、营口一带的群众,在干部和民兵的劝说下,纷纷在屋外搭起草棚居住。有些年纪大的人根本不信有什么地震,硬是不愿离开,最后是被民兵强行抬出去的。但也有犟的,就是不出屋,也有的年老体弱者不能出屋,后来的结果表明,死亡者中主要是后面的两种人。当日,即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7.3级强烈地震发生了。

由于事先有预报、有预防,灾害大大减轻。其实,早在1974年夏海城中期地震预报发布后,辽宁省就动员各行各业,在抗震普查的基础上,对一些无抗震措施和年久失修的重要工程设施进行了应急设防。例如用钻孔注入环氧树脂的办法,加固了太子河中游浸窝水库业已裂缝的水泥大坝,使其经受住了7.3级地震的袭击,保护了下游辽阳、营口及两岸几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是一次成功的地震预报,也是根据临震预报采取措施最得当的一次。据专家估计,海城地震预报成功至少拯救了10万人的生命。在极震区,无一人死亡的有493个村,占总数686个村的72%。我在采访本上飞快地记录着这些数字,心情格外的兴奋。以李四光教授为代表的我国地质地震科技工作者功不可没,同时有我国鲜明特色的“群测群防”网络也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我挥笔写下了反映这一重要科技成果的内参。随后又在此基础上改写成了公开新闻。新闻稿发到北京后,新华社总社国内部领导格外重视,作了精心的修改。然而,当时的舆论被“四人帮”牢牢控制,这样重要的稿件必须送审姚文元。其结果可想而知,此稿被他“枪毙”了。

表扬地震预报有功单位的争论

我和国家地震局的几位专家驱车跑遍了辽南大地的各个地震观测台站,收集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与专家们朝夕相处,我学到了更多的有关地震的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人类对地震还处于不断认识的阶段,并未完全认识它。尤其是地震预报,可以说长期、中期的好办一些,临震预报还是非常困难的。海城地震临震预报的成功,有其必然性——从1966年邢台地震以后,我国加强了地震震情的分析和预报工作;也有其偶然性——海城地震震前的地质水文、物理及动物异常等征兆十分明显,特别是辽宁省当机立断,采取了非常的、强有力的措施。总之,我们既不能抹杀科技工作者的成绩,又不能盲目夸大这一成果,更不能以此得出我国已攻克地震预报难关的结论。这些知识对于后来正确处理“表扬地震预报有功单位”的事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以华国锋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在听取营口市石砬峪地震台同志的汇报时,高度赞扬了这个台在辽南地震预报中的作用。华国锋当即表示要以国务院名义通报表扬石砬峪地震台,并征求在场的国家地震局局长的意见。这位局长是一位老干部,对于地震临震预报工作的难度,他应当是心知肚明的,但此时他却点头称是。

中央慰问团回到北京后,在国务院秘书长吴庆彤主持下,组织有关人员开始起草表扬营口市石砬峪地震台的通报,中央慰问团随行记者、新华社国内部李国锐同志也参加了起草工作。性格豪爽直率的李国锐在起草小组会上反映:海城、营口地震预报工作是国家地震局和辽宁省地震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只表扬一个石砬峪是不妥当的。但他的意见没有得到起草小组的认同。

与此同时,我们几个在灾区的记者,听到李国锐同志在电话中说的情况后,十分着急。于是我们立即采访了灾区考察的几位知名地震专家,想通过内参渠道反映情况,从正面支持一下“掌握真理的少数人”李国锐同志。

我们赶到新华社鞍山记者站的驻地,匆匆忙忙地把稿件写完,打长途电话念给总社的编辑。

在稿件中突出说明,在地震临震预报面前,人类还没有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靠一个地震台或靠一种技术手段是不可能做出准确的地震临震预报的。显然通报一个石硼峪地震台,不仅不符合客观事实,而且将在国际上造成不好的负面影响。

此时此刻,在中南海的李国锐得知有一篇支持他观点的内参稿,马上打电话告诉编辑部别铅印了,赶快将电话记录稿火速送进中南海。后来李国锐告诉我,电话记录稿刚交到他手里,华国锋同志就来到了会议室,准备听取通报起草的汇报。李国锐赶忙报告说:有一内参提出不同意见,

云云。华国锋同志听完李国锐的汇报,笑着说,这个意见好嘛,那么就表扬一批,上到专业地震台,下到群众业余测报组。1975年3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出通报,表扬了营口市石硼峪地震台、旅大市地震台金县观测站、盘锦地区地震台、海城县地震观测站、营口市虎庄公社邮电支局业余地震测报组和辽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102队业余地震测报组等一批在辽南地区地震预测预报中有功的单位。第二天,全国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新闻。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	张纯如	28.00	6.00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朱元石整理	26.00	6.00
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刘冰	34.00	7.00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托洛茨基	58.00	7.00
季羨林自传	季羨林	45.0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6.00
经历——我的1957	和凤鸣	29.00	6.00
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	李向东 王增如	34.00	7.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6.00
淮海战役秘密战	夏继诚	33.00	7.00
辽沈战役秘密战	松植	35.00	7.00
平津战役秘密战	松植	36.00	7.00
人生至理的追寻	梁漱溟	35.00	7.00
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上下)	程美东	68.00	8.00
综合哲学随笔	高亮之	22.00	5.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6.00
日记的胡适	李伶伶 王一心	29.80	6.00
红墙见证录(上下)			
——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尹家民	69.80	8.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锐	18.00	5.00
赫鲁晓夫回忆录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29.00	6.00
沧桑十年——1966—1976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	29.80	6.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28.00	7.00
季羨林谈读书治学	季羨林	19.00	5.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叙述了1949-2005年间中国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其深刻经验教训。书中收集的突发事件每一个都具有标志性意义,第一次农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共和国史上第一个导致副总理被处分的“渤海二号”石油沉船事故;第一个导致部长被撤职的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

《沧桑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的那场空前灾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天的年青人已难以置信,那些曾受过迫害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作者真实、公正、客观地写下了当年的遭遇,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教训,目的是杜绝惨绝人寰的悲剧重演。

《经历——我的1957》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1957年的反右斗争,作者和丈夫共同被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教养。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丈夫被活活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里,作者的大半生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不幸和痛苦、受尽各种凌辱委屈,经受了—一个女性所难以承受的各种情感遭际与心灵创伤。这是血和泪写就的历史。

《日记的胡适》胡适自16岁开始,直至去世的前三天,共留下二百多万字的日记。从日记看胡适,这位中国新文化的弄潮儿与代表人物展现给我们的,必定不只是他人生中精彩的一面,或许更多,我们将看到隐秘于那些琐碎文字背后映射出的个性和真实自我,那便是一番别样的风景了。

瞿独伊忆父母瞿秋白杨之华

孙维熙

瞿独伊是革命老前辈瞿秋白杨之华的爱女。现今 87 岁。她虽然一生历经坎坷，但乐观豁达，晚年在北京市中老年交谊舞比赛中获冠军；在新华社老年组模特表演赛中获头等奖。直到今天，她还坚持每周两三次的游泳。经过多次交谈，这位不愿张扬的老大姐同意记录下她讲的故事。

(一)

瞿独伊的生父是浙江闻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他同杨之华结婚后，决心不依赖家庭自谋生活。但是，当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谋生之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的引诱，政治上不求进步，生活上甚至不检点，这使杨之华怨愤之极。独伊说，妈妈于 1921 年生下我之后取名独伊，意思是说，我只生你一个，决不再生。1922 年，杨之华在上海参加了妇女运动。1923 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当年上海大学的校长是于右任。经向警予推荐作为社会学系的系主任瞿秋白认为他的学生杨之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坚强女性”，决定做杨之华的入党介绍人。后来两个人感情日益加深。

杨之华对瞿秋白也十分倾慕，但考虑到自己结婚生子，左思右想，不知如何办好。她决定回浙江萧山老家暂时回避一下。在此情况下，瞿秋白认为，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她？于是赶赴萧山杨家。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干脆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一起商谈。于是，他们三个人开始了一场认真的、戏剧性的、奇特的“谈判”。谈判结果同时刊登在当年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友好启事。1924 年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典礼。瞿秋白亲自雕刻了一方“秋之白华”的印章，留作纪念。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瞿秋白在一枚金别针上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杨之华。

独伊回忆说：“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我的父亲瞿秋白话不多，很温和，戴着眼镜，很清瘦。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爸爸’。让我叫‘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的，而他就亲切地称我‘小独伊’。在我的心目中，瞿秋白就是我的慈父。”

(二)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进入了低潮，在此情况下，中共召开了“八七会议”。会上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1928 年 6 月 18 日—7 月 10 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乡间别墅中召开。当年参加“六大”的正式代表有：瞿秋白、任弼时、周恩来、罗亦农、杨尚昆、陆定一、苏兆征等第一代革命领导人。7 岁的瞿独伊也随父亲进入了“六大”驻地。今天，唯一到过“六大”驻地尚活在人世间的只剩下瞿独伊。

1928 年 4 月，参加“六大”的代表分别从上海登程。瞿秋白和罗亦农

同志属首批从国内出发赶赴莫斯科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不幸的是，罗亦农同志尚未启程，就被叛徒出卖，惨遭枪杀。1928年4月29日瞿秋白打扮成商人前往莫斯科。

杨之华时任中央委员，也是“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杨之华同另一位代表，即罗亦农烈士的妻子李文宜为伴一起从上海动身。在那反共势力十分嚣张的情况下，杨之华不知把独伊放在何处为好，只好带上她随行。杨之华和李文宜一身贵夫人的打扮携独伊从



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和爱女瞿独伊 1929年在莫斯科

上海外滩秘密登上苏联的货船。经过三天三夜的海上颠簸抵达大连。然后乘火车经哈尔滨到满洲里。在哈尔滨期间，为了掩护“六大”代表分批出境，杨之华经常带着独伊陪同男同志外出活动。每次外出之前，杨之华都一再嘱咐独伊：“如果遇到盘查，有人问起叔叔，你就大声喊‘爸爸’，一定要记住。”独伊乖巧地点点头，也真的照办了。次数多了，独伊不禁好奇地问：“妈妈，我为什么会这样叫‘爸爸’呀？”

中共“六大”自1928年6月18日开幕到7月10日闭幕共22天。会议期间瞿秋白承担大会领导工作，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和《政治决议》，并代表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时在批评“左倾”盲动主义时，瞿秋白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诚恳地希望代表们对他犯的错误予以批评和帮助。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向忠发成为中共总书记。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杨之华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瞿秋白、杨之华工作学习太忙，只好把独伊送进一家孤儿院。1928年年底，独伊被转到莫斯科郊区“森林学校”读书。1930年7月，瞿秋白和杨之华奉命回国工作。考虑到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带着孩子从事秘密工作很不方便，只好忍痛

将独伊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并委托国际友人鲍罗廷夫妇代为照顾。

独伊拿出了一张保存了70多年的明信片。是从德国柏林寄出的。明信片上面印有一束美丽的“勿忘我”花，用中文写的独伊的名字，背面用俄文写的“送给独伊”，落款是妈妈、1930.8.1、克里米亚。独伊看得出中俄文所写都是爸爸的笔迹。此刻，独伊才明白父母并非到南俄执行任务，而是远离莫斯科另有使命。到底到何处去了，独伊是全然不知。她并没想到父母是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更没想到接到这张“勿忘我”明信片之际是和爸爸永远的离别。这张明信片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保存到今天，成为瞿秋白和杨之华留给女儿的一件最为珍贵的纪念品。

(三)

独伊在谈到鲍罗廷夫妇时激动异常，她说，她毕生都不会忘记“这两位老人对我们全家，尤其对我的关爱和帮助。我不记得我的亲奶奶和爷爷，鲍罗廷夫妇犹如我的亲奶奶和亲爷爷！”

鲍罗廷是共产国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大革命时期，他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顾问，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1924年5月，鲍罗廷

夫妇受孙中山委托到上海考察。杨之华代表中国共产党向鲍罗廷夫妇汇报中国妇女运动的情况，瞿秋白当时任翻译。鲍罗廷对瞿秋白、杨之华印象深刻。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难以分割的友谊。

瞿秋白和杨之华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工作学习期间，除了抽时间到独伊所在的学校探望自己的女儿外，就是到鲍罗廷夫妇家探访。第一次带独伊去拜访鲍罗廷夫妇时，两位老人就把独伊认作“中国孙女”，独伊成了鲍罗廷一家颇受宠爱的孩子。

独伊回忆说：“在鲍爷爷家生活是那么愉快，感觉那么亲切。晚饭后，鲍奶奶就放唱片听音乐，尤其是来到鲍爷爷家的孩子多的时候，大家就伴着音乐翩翩起舞。鲍爷爷的儿子、媳妇都参加，又唱又跳，热闹的很。鲍爷爷和鲍奶奶对各国的革命前辈的孩子都十分热情。我国革命前辈苏兆征的子女苏河清、苏丽华，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的女儿米季达，以及美共领导人的后代黑人尼利等都到鲍爷爷家玩耍。”

1935年秋的一天，独伊和儿童院的同学到乌克兰的德聂伯彼得罗夫斯克旅游。就在这一天的《共青团真理报》上独伊读到瞿秋白英勇牺牲的消息。独伊顿时一阵强烈的头晕目眩，失声大哭，当即昏倒在地。老师和同学急忙抢救，独伊慢慢从深沉的哀痛中苏醒过来。回到莫斯科后，鲍罗廷夫妇将独伊接到家中给以无微不至的关照。

独伊回忆说，鲍罗廷爷爷与美国记者安娜·路伊丝·斯特朗创办了《莫斯科新闻》的英文版。为此，1948年，在苏联的肃反运动中，苏联当局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将斯特朗驱逐出境。鲍罗廷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惨死在牢狱之中。50年代初独伊和她的爱人李何在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工作时，曾在街上见到过鲍奶奶。在遍地克格勃监视的情况下，相互都不敢打招呼。后来，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对独伊说，那一天，鲍奶奶在街上看到了你，却不敢相认。回家后哭了一场。独伊听后哽咽无语。1956年，苏联政府为鲍罗廷平反昭雪。独伊说，1956年夏天，我和妈妈去拜会了鲍奶奶。

1957年元旦，周恩来总理访问莫斯科，独伊陪同做翻译。访问结束后，周总理特邀鲍夫人到

下榻的克里姆林宫做客，并赠送了邓颖超为之准备的一份珍贵礼品。鲍夫人手捧礼品，老泪横流。临别时，周总理紧握着鲍夫人的双手，满怀激情地说：“对于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我们永远铭记鲍罗廷！”

(四)

独伊说，30年代初爸爸和妈妈回国后不久，就遭到刚刚回国的王明等的迫害。瞿秋白离开了领导岗位，杨之华当年所担任的中央妇女委员的职务也被撤销。经济上也予制裁，使之生活艰难，瞿秋白只好转入文学艺术领域，与鲁迅等结为亲密战友，以笔杆子为武器，为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33年9月起始，在全党开展对瞿秋白的批判，污蔑瞿秋白为“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不久，又指派他到中央苏区。临行前，患有严重肺病的瞿秋白请求让妻子杨之华同行，竟遭到拒绝。

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带领一支小分队在福建闽西山区游击转移的紧急突围的战斗中，何叔衡因年老体弱中途不幸光荣牺牲；邓子恢冲出包围幸免遇难；瞿秋白因长期患肺结核，翻山越岭难以支撑而被敌人逮捕。独伊回忆，按蒋介石密令给父亲照相以验明正身的人曾很感慨地说：“瞿先生与行刑者走在一起时全然不惧，竟分不清谁是即将杀人者，谁是即将被杀者！”在父亲就义前夕，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曾派了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到长汀监狱去劝降，企图用亲友之情打动父亲。父亲回答说：“事实上没有附加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的……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给他们带来长期耻辱和痛苦。”1935年6月18日，父亲就义的日子。据当年天津《大公报》的报道，瞿秋白来到行刑前照相地——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酒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然后，瞿秋白慢步走向刑场，他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用俄文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

岁！共产主义万岁！”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点头说：“此地很好。”独伊谈上述情况时，眼眶里一直汪着泪水，一再说：“我十分敬佩爸爸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我的‘好爸爸’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1935年秋，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杨之华当选为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务理事，留在莫斯科工作。会议结束后，她立即去拜访了鲍罗廷一家，以谢两位老人对独伊的关爱之情。接着到国际儿童院看望独伊和其他中国革命老前辈的后代。离别五年之久的母女终于团聚了。但是，这种略微有些欣慰的日子过了不久，杨之华母女的灾难又临头了。王明等“左倾”宗派集团的头头们又回到了莫斯科，重掌共产国际的大权，捏造罪名，污蔑杨之华有“政治问题”，撤销职务，停止党的生活，没收医疗证，停发生活费，宣布隔离审查；禁止杨之华同女儿独伊见面。杨之华母女在这种政治迫害中熬过了两年。

几年以后，党中央在延安清算了王明宗派路线的错误，任弼时同志被派往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领导，为杨之华平反，恢复了组织生活，安排她到东方大学边工作、边学习、边治病。独伊这才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五)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中共决定部分留苏人员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杨之华携小女独伊离开莫斯科路经新疆回国。到达迪化，竟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其中包括我党应盛世才从延安请来在新疆帮助工作的人员和一些在新疆养病的红军伤残员共150名干部及子女)。中共领导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惨遭杀害。

杨之华当时没有暴露身份，化名杜宁。她不止一次地教育和叮嘱独伊：“被捕，在革命是难免的，反真理的敌人不配审判为真理而斗争的人。到那个时候，真理要审判反真理的敌人！”独伊亲眼目睹了敌人押着杨之华去受审讯的情景。独伊说：“妈妈迈着坚定的步伐，昂首挺胸，无所畏惧地走出牢门。审讯时，妈妈大声揭露盛世才出尔反尔迫害共产党人的阴谋，敌人竟然拍桌子大叫大喊，扬言要枪毙。妈妈冷眼相对，明确地对审讯

者说，我们从信仰共产主义那天起，就准备掉脑袋，决不改变信仰！”

敌人除派来一个姓黄的叛徒监视被关的同志外，另外一个姓张的来到被敌人隔离开的周建、刘志云等人中间进行策反：“你们年纪轻轻地，现在若出去，可以和丈夫团圆，共产党嘛，出去以后还可以再加入的。”朱旦华（毛泽民的夫人）和杨之华等耐心给妇牢的同志们做工作，敌人在审讯中未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材料，策反也未成功，于是，就盯上了“囚徒”中年纪最小的独伊。在一次审讯中敌人以诱惑的口气说：“你还年轻，只要答应我们，出狱后会很快给你找一份工作。”独伊愤怒地回答说：“我决不单独出狱，决不会为你们工作，我们无罪！你们必须把我们全体无罪释放，并把我們送回延安！”在狱中，独伊和大家一起参加静坐绝食的斗争，要求改善牢狱生活；参加悼念难友牺牲的纪念和抗议活动等等。

独伊说，在狱中生活确实十分艰苦。患有严重肺病的乔国贞、吴茂等同志由于缺少营养外加精神上的折磨，不幸在狱中病故。为了长期斗争的需要，必须创造条件锻炼身体。独伊说：“在牢狱的几年中，都是我负责带领难友做早操。早操后大家一起高唱林基路烈士生前创作的《囚徒歌》。

独伊说：“妈妈患有肺病，在狱中病情加重。狱方不得不派人陪她外出到医院看病。医生是苏联人，妈妈用俄语同医生交谈，希望医生能通过苏联领事馆向共产国际通报中国革命者在新疆被捕的情况。不久，妈妈再一次看病的时候，苏联医生悄悄地塞给妈妈一张小纸条。回到家中，妈妈打开纸条一看，原来是共产国际给大家发来的鼓励电话：“同志们，你们要坚持！”落款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这张小纸条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开展斗争的士气。”

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要求蒋介石释放在新疆囚禁的共产党员。蒋介石同意放人，指示张治中将军负责办理。张治中临行前，周恩来、邓颖超专程为之送行，请他务必救出被关的难友，并派人护送他们回延安。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又单独找到当年曾任迪化市市长的屈武（原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的女婿），委托他找到杨之华以营救被关在牢狱的难

友出狱。屈武市长在女子监狱找到了杨之华的下落。然而，新疆警务处处长胡国贞却不允许杨之华与屈武见面。屈武当即点名要见瞿独伊。

屈武对独伊说：“我是于右任的女婿，认识周恩来，也认识你父亲。我是同情共产党的人。周恩来很关心你们，问你们有什么困难。”

接着屈武又说：“张治中将军到过延安，现在来新疆任职，你们快要被释放了。”

不久，张治中再次派屈武到狱中探望杨之华等，并带了一些钱慰问大家。难友们唯恐上当受骗，拒绝接受钱财。当时屈武解释：“张治中主任派我们来为大家办好事的。这些钱不是国民政府的钱，是张治中主任受周恩来委托，给大家改善生活用的。”经过研究收下了这些钱，同时，牢中的党组织决定，由杨之华亲自给张治中写信，要求恢复自由以及关于何时回延安事宜。张治中接信后，亲自会见并宴请杨之华母女、陈潭秋的助手吉合、朱旦华等六位中共难友代表，并说：“你们要赶快准备，越快越好，不能先宣布释放，更不能先见报再走。否则，会有危险。”

他对杨之华说：“师母（张治中在上海大学学习时，是瞿秋白的学生），请你相信，我已三次到过延安作保证，保证把你们安全送到延安。”

不久，张治中安排交通处长刘霖哲少将带队，调动了十辆美式大卡车，配备了通讯、医务、军需人员等护送我们 130 名蒙难人员离开新疆牢狱，历经一个月长途跋涉，终于回到了延安。

党中央为新疆蒙难人员的归来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不久，毛泽东又特邀杨之华、瞿独伊、朱旦华、毛远新到家中做客。后来，毛主席单独请杨之华母女到家中做客。毛主席郑重地说：“瞿秋白同志的问题解决了，中央已作了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瞿秋白的冤案，党中央有了明确、公正的结论。独伊笑着说，难怪我们从新疆回到延安时，康生一改常态，亲自爬到汽车上高喊：“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

1946 年，用独伊的话来说，是她一生中少有的幸福岁月，走出了牢狱回到了延安；爸爸的名誉得到了恢复；妈妈担任了党中央妇女委员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她自己由张子意（新疆牢狱领导人之一）、严振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

党。由于独伊在牢狱中表现突出，入党时免后补期。这一年，独伊和她的丈夫李何一起被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工作。

（六）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独伊说，是她一生中“永远的骄傲”。她受组织委派陪同以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为首的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登上了天安门前的观礼台。当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一种民族自豪感使我激动不已，我是含泪向苏联友人翻译解说大会的盛况和自己的感受的。”

开国典礼的消息是由新华社著名记者李普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宣言译成俄文是独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电波播送到全世界的。独伊说：“那一天十分繁忙、劳累而紧张。但是，那种为祖国而兴奋，那种光荣却成为我毕生回味无穷的自豪和骄傲。”

1950 年 3 月，作为新中国第一批驻外记者，独伊和她的丈夫李何受命赴莫斯科组建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站，李何还兼任《人民日报》驻莫斯科记者。

独伊先后多次为周恩来、宋庆龄、郭沫若等革命老前辈任翻译。建国初期，俄语翻译人才少，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时，经常要请她出任翻译。

独伊说，当我刚刚感到工作有成，能以享受到人世间的快乐和幸福时，灾祸相继而来。1962 年，丈夫李何不幸早逝。随后，儿子克林于 1963 年也离世而去。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在“文革”某些领导人的煽动之下，到八宝山烈士陵园挖了瞿秋白的坟，砸了周总理手书的“瞿秋白同志之墓”的墓碑，批判瞿秋白在监狱写的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紧接着，康生亲笔批示将杨之华列为“重点审查对象”。造谣说，“40 年代被盛世才关押在新疆监狱时，杨之华、瞿独伊等接受敌人的钱财作为活动经费”，“同国民党的代表张治中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然后和国民党人一起潜伏在我们党内”。于是，当年被关进新疆监狱的同志们均被污蔑为叛徒集团成员。杨之华被关进牢狱达六年之久。瞿独伊作为苏修特务、军

统特务、国民党员和叛徒，备受折磨。独伊的女儿晓云被赶到内蒙农村。杨之华的一家老小统统被扫地出门，北京的户口被注销，住房被占。

1971年，独伊的婆母亡故。借吊丧的机会，她从劳动改造地河南干校前往福建，后又到北京看病。同时在京打听妈妈的情况。她向有关单位提出探望母亲，遭到拒绝。本想回河南干校，正巧林彪9·13事件发生，形势有了新变化。独伊决定留北京了解妈妈的情况。茅盾、胡愈之等老前辈在京，他们是独伊父母30年代患难与共的老战友。独伊说：“就在这一年见到了茅盾等几位老前辈，他们惊喜不已，热情接待。患难中见真情，永志不忘。”

“在了解妈妈情况过程中，有一次专案组突然交给我一封妈妈写来的信。信中说犯病了，监狱里缺少‘脉通药’。”

独伊看出这是双关语，提示她寻找渠道给中央写信；“通天”反映情况。茅盾、胡愈之一边帮助寻找药品，一方面积极支持独伊给周总理写信。独伊说，她是在茅盾同志家写的信，要求看望妈妈，并能允许妈妈到医院看病。之后，专案组告诉独伊，你给总理的信收到了，你妈妈已经转到医院治疗，但独伊作为叛徒集团同案人禁止探视。独伊再一次上书周恩来，终于在1973年秋的一天获准首次探视。独伊说，当我看到离别多年的妈妈，瘦骨如柴地病瘫在床上，心如刀割。妈妈说：“没有想到还能见到你。”

临别时，妈妈依依不舍地说：“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讲啊。”一向反对泪水的妈妈，禁不住掩面哭泣起来。1973年10月16日，离探视期还有6天，专案组突然通知我可以探视，我匆匆赶到医院，妈妈已奄奄一息。两天后，远在上海的小姨杨之英也赶到医院，全家含泪在妈妈的床前。妈妈拉着家人的手说：“你们来了，很好，不要难受了。”独伊很清楚，妈妈在人世间的时间不多了。她电话告知30年代同妈妈共同战斗过的胡愈之、周建人、周扬等老朋友。第二天下午，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和周建人的夫人先后赶到医院。妈妈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脸上呈现愉悦的微笑，还很幽默地说：“今天，人真多，正是老中青”，还说了一句：“我和独伊是母女加同志。”胡愈之老人强忍心酸插话说：“我们和你，是同乡加同志加

同学。”周建人的夫人临走时说：“华姐，你在医院没有什么可说的，我给你炖一点鸡汤吧。”杨之华微微地点头感谢，最后一字一顿地说：“我还想吃西红柿。”次日凌晨，她还没来得及品尝鸡汤和西红柿就含冤而去，终年73岁。临终，给独伊留下如下几句话：“独伊，你和小女要永远乐观！永远跟着党干革命，要准备迎接更大的考验！”

(七)

1978年，独伊和妈妈杨之华的历史冤案终于平反昭雪。而瞿秋白的名誉一直未得恢复。独伊她先到中央专案组查问，得不到明确的回答。她拜访了原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又走访了中组部原部长安子文和廖承志。廖承志主动给独伊出主意：“独伊，你应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你父亲平反。”陆定一同志在医院抱病亲自执笔给陈云和黄克诚同志写信，要求党中央为瞿秋白同志平反。信件原文如下：

陈云、黄克诚同志并转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

说瞿秋白是叛徒，我很怀疑，现向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提出，请求复查此事，理由如下：（一）瞿在被捕之后写了《多余的话》，情绪消沉。这篇东西，因周总理看过，确是秋白所写。但以此为据，判定秋白是叛徒，则证据不足。因为它究竟不是自首书或反共宣言。（二）定秋白为叛徒的，是以谢富治为部长的中央公安部，时间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谢富治人很坏，当林彪、“四人帮”走狗，诬陷了很多好人，对瞿秋白的叛徒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值得重新检查，不能轻率相信。（三）秋白被枪决，国民党曾发过消息，登过报。如果秋白叛变了，国民党必须大肆宣传，但这种宣传并未发生。

专致
革命敬礼！

陆定一

1979年2月1日于北京医院

独伊立即动手给党中央写信要求为父亲平反。

为了弄清瞿秋白被捕后的情况，独伊寻访了当年国民党在福建的高级官员宋希濂。宋对独伊说：“当时，我直接审问过瞿先生。蒋介石还派了

两个中统特务到福建长汀找瞿先生劝降。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这篇文章是瞿先生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从文字上看情调伤感低沉,但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

“瞿秋白问题复查组”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提交给中共五中全会批准。遗憾的是,中共五中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对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过。独伊给时任中宣部的部长王任重挂了电话:“为什么五中全会未能通过给我父亲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是不是因为‘文革’期间毛主席批发的关于十次路线问题的文件中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是叛变自首的原因?”对方回答说:“是的。”独伊明白了“两个凡是”还在起作用。

独伊继续为父亲的正式平反而奔波。在一批老干部的支持下,她向中宣部写报告,请求由中国文联、作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举办一次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45周年的座谈会,书记处很快就予以批准。

1980年6月17日,座谈会在人大大会堂召

开。茅盾刚刚做了眼睛手术,竟然坐着轮椅赶来出席会议。他建议把他的政论由文献编委会负责编辑成册。谭震林说:“邓小平同志不久前说过,我们党内领导同志只有瞿秋白同志不搞家长制,他是最讲民主的。”李维汉说:“我们党内从陈独秀到毛主席都搞家长制,惟独瞿秋白不搞。秋白同志‘八七’会议后接替了陈独秀的领导,他还是尊重陈独秀作为一个学者,尊重他的人格。会后还去看望他,与他谈话。瞿秋白犯盲动主义错误是认识问题,与王明的错误完全不一样。”

1985年7月18日,中央在中南海召开了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紀念会。邓颖超、杨尚昆、胡乔木出席。杨尚昆代表党中央高度评价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独伊回忆说:“那一天,激动、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我含泪默默地告慰九泉之下的爸爸、妈妈:安息吧!女儿深深地怀念你们!党和人民永远怀念你们!”

(本文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治方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征文启事

2008年,是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孙治方诞辰100周年。在左祸深重的年代,孙治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曾不惜身陷囹圄达7年之久。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孙治方又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无畏探索,得到国人的高度崇敬。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既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孙治方的最好怀念。为此,“孙治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公共政策研究基金”《炎黄春秋》杂志《纵横》杂志联合发起“治方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征文活动。本次活动由新浪网独家网络支持。

一、征文内容:

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进步,一方面可以从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台来诠释,另一方面可用亿万百姓所身临其中的每一步印记来展现。本次征文以这两方面为主。要求:1、以“亲历、亲为、亲闻”一件事情为题,突出“小事件,大历史”的主题;2、以纪事本末体讲述30年来的一个历

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作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

二、时间:2008年4月1日至9月30日。

三、评奖及颁奖

本次征文的优秀文章,将陆续在《炎黄春秋》和《纵横》发表,并付稿酬。征文结束后,由大赛组委会评选出获奖文章,颁发奖金和奖牌。颁奖仪式于10月孙治方诞辰100周年时在“治方书院”举行。

投稿信箱

xqq0825@vip.sina.com(《炎黄春秋》杂志);

yun9008@163.com(《纵横》杂志)

投稿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全国政协《纵横》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811)

(请在信封注明“治方杯征文”字样)

陈独秀旧居怅想

操凤琴

2007年仲冬，在重庆采访之余，我特地来到距城区百余里之外的江津区（原江津市），拜谒陈独秀先生旧居。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将关押了五年的陈独秀从南京监狱提前释放。此时的陈独秀已是家破人亡——乔年、延年壮烈牺牲后，陈独秀的前后两任妻子高晓岚、高君曼和长女玉莹都因悲伤过度而陆续离开了人世。

带着患难少妻潘兰珍，陈独秀出南京，奔武汉，颠沛长沙，流落重庆，在江津的鹤山坪安顿下来，清苦自持四年，最终在穷困和孤寂中客死在这异乡的土地。

独秀旧居离城区尚远，蒙蒙细雨中车子在泥泞的盘山道上九拐十八弯，停在半山坡上一座石墙围合的院落前。

这是幢青竹环抱的三进平房，占地约五亩，围墙由一块块巨大的条石砌成，故被称为“石墙院”。上世纪90年代，江津市委市政府出资把居住在这里的几十户居民陆续搬迁出去，整修后将其辟为“陈独秀旧居”。

一遍遍，我徜徉在这冷清安静的院落里，沉思，怀想，除了我，没有一个游客。故居的看门人是当年收留了陈独秀的杨家后人，一个朴实的中年男子，他对我介绍了当年“陈老先生”在这里的一些情况：

陈独秀夫妇避难到重庆前，他的世交好友邓



陈独秀重庆江津故居

仲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伯父)在江津开了一家诊所，邓力邀独秀先生来他家居住，但邓仲纯的悍妻却担心受陈独秀牵连而拒客于门外，进而恶语相向。陈独秀写给三子松年的信中也如此记载：“幸亏你们与祖母未同来。竟遭邓太太拒之门外。”。

一生傲气的陈独秀哪里受得了这种侮辱？“若不碍于行李拖累，定然马上重返重庆（陈独秀致松年信）。幸有江津乡绅杨学渊仰慕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旗手、五四运动总司令”的名声，盛情邀请他于地处鹤山坪的祖屋石墙院居住，他担心陈独秀无功不受禄，就以修订杨氏家谱、整理先人遗稿之名相邀。

在石墙院里，我久久伫立在陈独秀生前居住的两间偏厢房里，室内光线昏暗，泥地面潮湿阴冷，只有一床、一桌、一椅，简陋之极，隔壁的耳房里陈设有他们夫妇躬耕垄亩的农具，一如当年……



陈独秀北京故居

好在历史并不永远都是政治的婢女！近年来陆续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表明：1923至1927年间，苏共（联共（布））政治局就中国共产党的各种问题开了122次会，作了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决议！事无巨细遥控指挥年幼的中共。在斯大林眼里，中共不过是个胎毛未净的“中国支部”，而陈独秀以“支部书记”之低微，一次次与以斯大林为核心的共产国际进行抗争！大革命期间，陈独秀曾抵制共产国际的决定，反对加入国民党，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我们应该即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危急关头也曾部署反蒋计划，但一再被斯大林压服——“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告全党同志书》）。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一败涂地。一切责任却都推向陈独秀，一切错误也都给了陈独秀。

中国“托派”元老王凡西在其《双山回忆录》中写道：陈独秀这个人，不管他有怎样的弱点，但他毕竟是一只雄狮，人家可以打败他，甚至可以杀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将全部责任往陈独秀头上一推。陈独秀如果肯和斯大林合作来串演这出悲喜剧，自认全部错误，以来洗清斯大林的罪过，那么，陈独秀不仅可以在共产国际当要人，而且多半还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

偏偏陈独秀不是个软骨头的政客，偏偏他撞得头破血流还要独立思考探求真理，终于陷入被多方夹击的困境，不，是绝境！

悲剧拉开帷幕。

陈独秀一生东奔西走，反满清，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老子党”，反法西斯，反“托派”……八次被通缉，四次坐监牢。1937年最后一次获释时已是一身疾病，心上有“无数伤痕”的老人。

他去往何方？

去延安？不能！出狱流落到武汉后，董必武代表党中央出面，让他写份书面检讨，就可重新安排回中央，陈独秀傲然：“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后很快被康生等诬为“日本人每月给300元津贴”的汉奸（延安《解放》杂志1938年1-2月号）。

去苏联？不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命令陈独秀到莫斯科反省，陈独秀坚拒：“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请教外国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要反省，我在中国反省，绝不去莫斯科！”恼火之下的斯大林亲自在办公室里约见张国焘咨询对策，甚至担心陈独秀会筹钱另办报纸另行组党（张国焘《我的回忆》）。

应邀到国民政府做高官？蒋介石杀害了我的许多同志和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陈独秀这样答复奉蒋介石之命来拜访他的戴笠和胡宗南。

回家乡落叶归根？安庆已落入日寇的铁蹄！

江津人民以博大的胸怀收留了陈独秀。“何处乡关感离乱？蜀江如几好栖迟。”——贫病交加的陈独秀在石墙院里这样抒怀。

在这个院落里，陈独秀抱病写下《小学识字课本》这部近代史上的文字学杰作，用科学的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小学”指文字学，类似于《说文解字》。他也为外面的书馆编书，挣点稿费糊口；“馆中倘能信任，必有与钱相当之稿与之，不至骗钱也。”（陈独秀致台静农信）

但生活实在太艰难了！他家徒四壁，只有几张破桌椅和耕种生产的一堆土豆（包惠僧回忆

录)。在给四川友人杨朋升的信中,陈独秀多次写道:“一年半前……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长此下去,实属不了!……弟尤为困难”;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命耳!”

在这个院落里,陈独秀宁可典当度日,也断然拒绝达官显贵们送的钱物:“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而面对北大同学会寄来的三百元钱,他“且感且愧”;面对共产党员刘伯坚从互济会经费中拿出的一百元钱,他热泪盈眶:“这些钱应该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的遗孤。”

在这个院落里,陈独秀“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奋笔写下多篇政论《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被压迫民族之前途》《我的根本意见》……在这个院落里,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最终形成了以民主为核心的“最后见解”!

他石破天惊,宣布“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而且“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

他反对斯大林,但更多是剖析产生斯大林的独裁制度,他提出“社会主义也要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要民主化”;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呢?”

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把现实与陈独秀的预言相对照,不能不惊叹他的判断是多么准确!

但是,如果仅仅是惊叹于这位思想家的前瞻,敬慕于这位革命家的执着,后人是否依然只流于把栏杆拍遍的浅吟低唱?

如果悲剧谢幕后,观众仅仅是掏取红巾掩翠袖,为主人公的坎坷命运搵一把英雄泪,曲终人散,任清泪随风而逝,那最具价值的怅想还有什么意义呢?

历史应当有回声。

“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邓小平同志回忆党内路线斗争问题时评语铮铮。蔡元培先生的称赞也重又荡在人心:“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

陈独秀!”

坦荡磊落,是人性的光辉,是灵魂的高贵,而在铁血的政治斗争中,莫非褊狭阴鸷注定成为党的领导人置自己于灭顶之地的阿基琉斯之踵?

如果说,一个政党在走向壮大和成熟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这惨痛的人生做“药引”,至少现在在希望能把这苦难的普罗米修斯铸成一座永恒的雕像,警示我们在陈独秀毕生高倡的民主和科学大道上少抛点锚,少走点岔路,更快地驶向理想的目的地。

(作者为《参考消息》报主任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8期目录

学界新论	不平等加剧伤害了谁?	陈心想
书屋讲坛	“五四”理念变动的重新评说 两位真正的思想者 ——记王元化与顾准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怀念王元化先生	刘再复 罗银胜
旧事新识	思想是社会前进不可或缺的推力 白话作家及其命运 多边关系的《论语》与孔子	李文熹 裴毅然 狄 马 王耀文
书屋品茗	雄辩的与亲和的文学 知识分子与自由	王 蒙 林贤治
人物春秋	傅雷书信中的“死路历程” 被遗忘了的现代作家——徐贻 蛛网中看萧红	苗振亚 李荫远 伍 国
思史佚篇	蔡元培、梁启超的“有限合作” 厚道还是霸道:杨昌济与“湘中二杨” ——读《达化斋日记》及其它	张晓唯 秦燕春
灯下随笔	看似出奇非无因,谁人识得帝王心 与绞肉机对峙的身体	霍红伟 蒋 蓝
裁书刀下	心远斋笔记十三则	曹良实
流年碎影	胡秋原与周恩来、邓颖超交往始末	裴高才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五个不幸早逝的人

赵友慈

《炎黄春秋》今年第1、第3期先后刊登了《被迫自戕的我的七位老上级》和《我们连里的七个“反革命”》，读后感触颇深。不禁使我联想起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在五七学校短短的三四年中，我们仅有百十人的连队，竟有5个人凄惨地离开了人世，实在令人痛惜。为了缅怀故人，激励生者，忆往鉴今，现凭记忆所及，将彼时的景与情记述于后。

老红军邱兰标

邱兰标，长征时在红四方面军，解放后长期在中央机要部门工作，文革前是我们机关的负责人之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机关另两位负责人被中央点了名，上了红头文件，罪名是“窃取中央机密”，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没被点名，有人猜测：传说长征途中叶剑英得悉张国焘企图谋害毛泽东，叶要将此信息告知毛，那时邱兰标在红四方面军当通讯员，此信息可能是邱传递的，立了功，中央现在要保他。可是随着运动的发展，邱的处境艰难了：一些人要揪，一些人要保，争论不休，形成对峙。到了1967年初，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到我们机关，在大会上宣布：邱兰标是杨尚昆的人。一句话给邱定了性，成了“三反分子”，对他未来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69年初，机关全体人员来到江西五七学校。邱已年过五旬，经过了两年“黑帮分子”的生活，身体已很虚弱，又经两天两夜的旅途劳顿，到干校后的第二天就到寒冷的筑堤工地参加劳动，回来就病倒了。他卧床两日，病情加重，急送南昌医院，但为时已晚，加之医生得知他是“走资派”，不尽力抢救，当日就停止了呼吸。这位十几岁参加革命，经过出生入死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洗礼，经过千难万险的考验，对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老红

军，就这样凄惨地离开了人世。临终时，他身边没有一位亲人。

部主任吴善昌

吴善昌，50岁上下，身体结实，为人正直，生活俭朴，口碑很好，过着单身生活，是我们机关一个部门的主任。文化大革命他在劫难逃——既然机关负责人因“窃取中央机密”被打倒，他作为保管中央机密部门的主任，自然是“帮凶”了。

在小组批斗会上和写交待材料时，吴不说假话，不乱咬“人”，不承认“罪行”，因而遭到严厉斥责。他顶住巨大压力，不低头，不屈服。在当时情况下，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实在难能可贵！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彭德怀的影子。

到五七学校后，吴仍过着“黑帮分子”生活，没有行动自由。约1972年冬，突然听说吴善昌死了。情况是：某日夜，吴突患急病，未能及时抢救，遽然去世。我们连队地处农村，方圆几十里一所简陋的医院也没有，去县城或南昌，每天只有一次火车，连队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台手扶拖拉机，去南昌要颠簸几个小时。得了急病，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严重的缺医少药和长期的精神折磨夺去了这位本应受到人们敬重的老干部的生命。

壮年木工老李

李某，30多岁，木工，身体健壮。原来我们不是一个单位，由于我住他们单位的宿舍，经常看到他提着工具箱到各宿舍院修理门窗。来五七学校一年后我们两个连队合并，但对他的情况知之甚少，连他的名字现在也想不起来了。在连队，他主要做木工、瓦工活儿。可能是1971年春，某日，突然听说：李××死了！又是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缺

医少药,造成了这一悲剧。噩耗传到北京,他爱人急来江西,料理后事,在五七学校住了很长时间。

高材生罗敬贤

罗敬贤,1965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我们机关。当时我们机关选调干部条件高、审查严,各高等院校也首先将优秀毕业生输送到中央机关。小罗来机关仅半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到五七学校后,我们曾同住一个宿舍。他给我的印象是:思维敏捷,敢于发表意见,生活节俭,对家庭情感很深。后来知道,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全靠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又不知克服了多少艰难困苦,供他上学直至大学毕业。约1972年夏,听说小罗怕干重活,还经常请假。又过了一段时间,得知小罗病了,腿都肿了,得的什么病也不清楚。某日凶讯传来:小罗死了!小罗的死在连里引起很大震动,因为他太年轻了,才二十六七岁,太可惜了!不祥之感笼罩着连队,小罗这么年轻,说走就走了,这种厄运不知哪一天会落到谁的头上。

噩耗传到广东罗家,罗母、妻子携一岁多的幼子火速赶到五七学校。婆媳二人整日泪水洗面,悲痛欲绝。在追悼会上,婆媳哭得撕心裂肺、肝肠欲断,站立不住,要两个人架着。这是我参加过的追悼会最悲惨、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一次。事后很长时间,人们还在谈论:罗家孤儿寡母,祖孙三人今后的生活出路在哪里?他们在未来的生活道路上要渡过多少道难关啊!

小姑娘冯元秀

冯元秀,小名小六儿。来五七学校前,我和她家同住一个宿舍院。那时,我们每周回家一次,周六下午,小六儿和她的哥哥姐姐与我的两个孩子结伴,到公交车站接她的爸爸和我。见到我们,孩子们高兴极了,簇拥着我们回家。我对小六儿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今天想起来犹如昨日,历历在目。

一件是:某年“六一”,机关组织各家属院的孩子联欢,小六儿和我女儿(她们同龄,当时约四五岁)报名参加演出,合唱《太阳照在金山上》。联欢会那天,我带着六七个孩子,很早步行前往。一路

上孩子们蹦蹦跳跳,有说有笑。联欢开始,轮到小六儿她们演出了。二人从未登过台,当她们看到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时一下就蒙了,张口要唱却忘了歌词。越紧张,越想不起来,呆呆地站在台上。我十分焦急,在台下又无能为力,多想主持人能提醒一句,她们就会顺利完成演出。遗憾的是,尴尬的局面持续了几分钟,主持人说:“那你们就下去吧。”两个孩子垂头丧气走下了台。回家的路上,没有了欢笑,听不到歌声,真是偃旗息鼓、铩羽而归。

另一件是:我们到五七学校两三年后,在北京没有工作的家属陆续来江西安家落户,小六儿一家也来了,全家团聚,其乐融融。她大哥元松到我们排当小“五七”战士,与我同住一个宿舍。某日午休,只见房门轻轻地开了,小六儿蹑手蹑脚走到哥哥床前,用小手抠哥哥的脚心。元松被弄醒了,睡眼惺忪地寻找恶作剧者。小六儿躲在门后,作着鬼脸,得意地笑了。此时她那俏皮、天真、活泼的样子,好像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过了些日子,我去冯家串门,一进屋,就感到屋内被悲凉、凝重的气氛所笼罩,全家人都在,只是不见小六儿,我不禁问道:“冯嫂,小六儿呢?”没想到,经此一问,冯嫂再也无法控制心中的悲痛,放声痛哭。原来,前几天小六儿被蚊子叮咬,得了急性脑膜炎,由于附近没有医院,去县城、南昌又没有交通工具,没能及时抢救,病魔无情地吞噬了她那不到7岁的生命。

小六儿如果还在,该是四十多岁了。

今天重提这些令人伤感的往事,不仅是悼念逝者,也是让人们知道,这些不幸的人都是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逝去的,且很有代表性:既有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老红军、老干部,也有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才华未展的青年知识分子;既有正值壮年的普通工人,也有花朵般的小姑娘。可见那场浩劫的危害之广,灾难之深。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从这些不幸人的遭遇,也暴露了我国长期构建的城乡二元社会的严重弊端: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交通不便,……因而造成种种不公、歧视甚至悲剧。庆幸的是,国家已决定花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以使曾对社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亿万农民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权利。

齐奥塞斯库之死

张汉文 周荣子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是前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他曾多次访华，为中国人民所熟悉。1989年12月罗马尼亚刮起一场政治风暴，几天后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埃列娜竟倒在本国人的枪口下。我们是新华社驻罗马尼亚记者，亲历了这场政治风暴，见证了齐奥塞斯库之死。

山雨欲来

齐奥塞斯库在执政后期实行个人专制，压制民主，不顾百姓生活，引起社会上的不满。

1979年在罗共十二大上，罗共创始人之一、前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斯坦丁·帕伏列斯库即席发言，批评齐奥塞斯库摆脱党的领导、凌驾于党之上。他反对齐奥塞斯库连任党的总书记。当时，这件事被西方媒体称为“一颗政治炸弹”。

1987年11月15日，罗马尼亚中部工业重镇布拉索夫市工人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齐奥塞斯库的示威游行，示威者以全国著名的“红旗”卡车厂的工人为主。

1989年3月，6名罗马尼亚前高级党政干部通过外国电台联名发表一封给齐奥塞斯库的公开信，指责他造成国民经济崩溃，践踏人权，使社会主义名誉扫地。这6名前领导人是：前党中央第一书记（1954年4月至1955年10月）、前政府副总理格奥尔基·阿波斯托尔，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德鲁·伯尔勒德亚努，原外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罗共创始人之一、前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斯坦丁·帕伏列斯库，罗共党报《火花报》前总编西尔维乌·布鲁坎，和罗马尼亚前驻美国大使馆政务参赞米尔恰·勒强努。

由于《自由欧洲电台》等西方等广播电台的传播，此信在罗马尼亚家喻户晓。罗普通百姓对

此信给予称赞，认为说出了他们心里的话。许多人说，面对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连老干部都无法忍受，站出来说话了。

广大群众对齐奥塞斯库十分不满，但由于当局的严密控制，人们无法发泄，就编了许多政治笑话讽刺、挖苦齐奥塞斯库。当时罗马尼亚政治笑话很多，流传很广。下面选笑话两则：

一次，在一家肉铺前许多人排长队等候买肉。一大清早人们就来排队了，十分辛苦，能否买到还是未知数。一个人骂骂咧咧地说：“市场供应这么糟，全是齐奥塞斯库搞的。现在我去把他干掉！”说完便走了。过了一会儿，此人返回，继续排队。其他人就问他是否把齐干掉了。他一言不发。大家就骂他是胆小鬼，放空炮。此人实在忍受不了了，就大声说：“那里的队伍排得比这儿还长！”

在布加勒斯特，许多申请出国的人正在排队领取护照。其中一人回头看到他身后的人不是别人，而是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看到他吃惊的样子便说：“既然大家都要出国，那么我也走。”此人立即对齐奥塞斯库说：“如果你走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出国呢！”

十二月风暴

1989年12月的政治风暴是从罗马尼亚西部的蒂米什瓦拉刮起来的。蒂米什瓦拉是罗马尼亚西部最大的城市，它距离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边界只有40多公里。城市居民除了罗马尼亚族人外，还有匈牙利族、日尔曼族和塞尔维亚族。在这里人民打开电视机就能看到匈牙利、南斯拉夫的电视节目。

1989年10月匈牙利政局发生剧变，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建为社会党，匈开始实行多党

制。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人对近在咫尺的匈牙利政局变代十分敏感。1989年12月间,匈牙利电视台多次播放罗马尼亚匈牙利族牧师特凯什·拉斯洛批评齐奥塞斯库的言论。对此,齐奥塞斯库十分恼火。12月15日晚,几名罗马尼亚警察打算强制匈牙利族牧师拉斯洛从这座城市迁走,结果遭到



毛泽东会见齐奥塞斯库夫妇

200多名匈牙利教徒的强烈反对(罗马尼亚是多民族国家,罗马尼亚族占全国人口的89%;匈牙利族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匈族人占这个国家人口的百分之6%—7%)。第二天(12月16日)下午,这个城市爆发了有上万人参加的游行,其中多数是罗马尼亚族人,他们的要求已从反对让匈牙利族牧师迁居变成反对齐奥塞斯库专制。16日晚,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连夜召开党中央会议,商讨对策。17日在齐奥塞斯库的指令下,罗马尼亚军警在市内开了枪,抓了一些闹事者,平息了骚乱。18日齐奥塞斯库按原计划出访伊朗。20日下午齐奥塞斯库结束访伊回到布加勒斯特。

12月20日晚,飞扬跋扈、过于自信的齐奥塞斯库决定21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群众大会,支持他在蒂米什瓦拉采取的镇压行动。他万万没想到,这次集会恰恰给愤愤不平的群众提供了上街闹事的良机。21日中午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共和国宫广场上,数万名布加勒斯特市民出席了这次群众大会。12时15分齐奥塞斯库走上设在罗共中央大厦阳台上的主席台,开始讲话。但没过多久,群众便开始起哄,会场上一片混乱。齐奥塞斯库未讲完话,便退进室内。与会的人们很快汇成几支队伍在布加勒斯特的大街上开始了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反对齐奥塞斯库专政的口号。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军警同游行示威者对峙。

12月22日上午10时,即在布加勒斯特爆发示威游行的第19个小时,支持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军队开始倒戈,罗马尼亚军人从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撤走。罗马尼亚防暴警察再也挡不住游行队伍的冲击。示威群众立即汇成几股洪流向齐奥塞斯库所在的党中央大厦聚集,并向党中央大厦冲击。一些人打破一层楼的窗户,把齐的著作和画像扔了出来。齐奥塞斯库夫妇看大事不好,下令调来直升机,从大厦的顶部平台逃走。12时10分,直升机起飞后向首都布加勒斯特北部郊区飞去。

12月22日一个新的政党——罗马尼亚救国阵线成立。它是群众自发行动起来后由一些罗马尼亚头面人物组成的,也是当时在罗马尼亚发生的一系列重大行动的策划和组织者。

救国阵线的主要领导人伊利埃斯库,他原来是罗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因与齐奥塞斯库意见不一,1971年被齐奥塞斯库解职。齐奥塞斯库死后他当选为罗马尼亚总统(1990—1997年)。

1989年12月罗马尼亚刮起的这场政治风暴,其势头之猛,风速之快,出乎众人的意料。它最终使这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罗马尼亚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途中变故

直升机向何处飞?齐奥塞斯库拿不定主意。

他决定先到布加勒斯特以北几十公里处的总统别墅——斯纳戈夫别墅。12时30分直升机抵达总统别墅。齐奥塞斯库夫妇下机后，匆匆走进别墅，把一些物什装进两个蓝色的大提包里。在一个提包里他们还放了一些面包。

直升机的载着齐奥塞斯库夫妇和他们的两名保镖再次起飞。飞机起飞后机长瓦西里向空军指挥部通报了情况。他试图掉转直升机飞往离首都不远的一罗马尼亚空军基地，但在齐奥塞斯库保镖的威胁下，他只得向西北方向飞行。瓦西里偷偷向基地报告了自己的方位，并尽量升高，使雷达便于跟踪。最后，他对齐奥塞斯库说：“地面雷达已捕捉到我们，几分钟之后防空武器有可能使我们粉身碎骨。”齐奥塞斯库一听大为吃惊，要求立即降落到地面。直升机降落在布加勒斯特西北52公里处的一条公路上。

现在齐奥塞斯库一行只剩下4个人：齐奥塞斯库夫妇以及卫队长内亚戈耶和保镖马利安。这时，马利安拦住一辆驶过的罗马尼亚国产达契亚小轿车。马利安拿枪对着车主说：“快下车，把车钥匙给我！”车主是位医生，他看到是齐奥塞斯库夫妇，感到十分惊讶，但他非要自己开车。齐奥塞斯库上车后便坐在车主身边，他的夫人坐在后排。汽车狭窄，后排坐不下三个人，齐奥塞斯库夫人和卫队长上车后，保镖马利安未上车，便留在公路边。齐奥塞斯库下令把车开往夫人埃列娜的老家——登博维察县的首府特尔戈维什泰市。下午2时，汽车出了故障。卫队长劫持了另外一辆小汽车，并让车主继续前行。由于沿途多次被当地示威的群众阻拦，汽车便开往特尔戈维什泰县警察局。18时15分他们从后门进入警察局。这时，县警察局局长正同在政局剧变中成立的政党——罗马尼亚救国阵线的两名代表进行交谈。他们看到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后，立即对齐夫妇进行了搜身检查并通知了当地的兵营领导。当地的兵营的指挥官马雷什少校把这一情况向罗马尼亚国防部最高领导作了汇报。国防部命令把齐夫妇转移到兵营里，严加看管，绝不能让齐的亲信把他们救走。齐奥塞斯库夫妇当即被送进了兵营。这个兵营是主管罗马尼亚中部布加勒斯特、布拉索夫和特尔戈维什泰三市空防任务的防空基地。

秘密处决

自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关进防空基地的兵营后，亲齐奥塞斯库总统的罗马尼亚保安部队人员闻讯后开始向兵营打枪，企图救出这对逃难的夫妇。为了防止齐奥塞斯库被人救走，罗马尼亚军方向该兵营调集了坦克、反坦克炮、装甲车和山地作战部队，当时兵营里共有驻军1200人。

齐奥塞斯库夫妇在兵营里被关了三天三夜，从未出过兵营的大门。走出大楼进院子有几次，是在专人监护下上厕所。有两次齐夫妇被关入装甲车里，是为了防止保安部队“进攻兵营后被救走，也为了确保齐夫妇的人身安全。”

12月24日罗马尼亚救国阵线领导人在布加勒斯特开会决定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审理和处决齐奥塞斯库夫妇。

12月25日是圣诞节。下午1时，罗马尼亚救国阵线组建的特别军事法庭在兵营内开始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审判团由7人组成。齐奥塞斯库夫妇完全否认这一军事法庭的合法性，并在审判时拒绝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辩护律师问齐奥塞斯库夫妇是否要求上诉。被告如提出上诉，罗马尼亚最高法院要予以审理，即使驳回上诉也要一周时间；被告不上诉，判决便是终审判决，处决立即执行。齐奥塞斯库对此不予理睬。由救国阵线指派的辩护律师还问齐奥塞斯库夫人过去和现在是否有神经病。如果埃列娜说有，那法庭也不能对她进行判决。军事法庭必须把她送到医院进行检查。这种检查一拖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但埃列娜说没有。特别军事法庭是以下述罪名判处齐奥塞斯库夫妇死刑的：屠杀罪（有六万多人是殉难者）；破坏政权罪；破坏公共财产罪；损坏国民经济罪；在外国银行存有10多亿美元并企图逃往国外（事后，事实证明在国外银行存款这一罪名是无中生有）。

审判结束后，齐奥塞斯库夫妇一先一后被捆绑着押送到室外。兵营里没有刑场，厕所前的空地便成了执行枪决的地方。从楼房到刑场约有30米远。厕所所有两扇窗子。齐奥塞斯库被带到了两扇窗子之间的墙下，面对着持枪的士兵站好。当押解他们的士兵走开后，齐奥塞斯库高呼：“自

由和独立的罗马尼亚万岁！随后而来的埃列娜则唱起了《国际歌》。这时，持枪的士兵在行刑队指挥官尚未赶到的情况下，便开了枪。齐奥塞斯库中弹后跪倒下，后脑勺撞在了厕所的墙上。他死后仍睁着双眼。齐奥塞斯库夫人头部中弹，颅骨开花，脑浆外溢。

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后，法医对他们的尸体进行了验证。然后让士兵们用毛毯把尸体裹起。当晚，审判团成员乘直升

机返回布加勒斯特，顺便也把齐奥塞斯库夫妇尸体带到布加勒斯特。直升机停在了罗马尼亚武装部队的体育俱乐部——《星》俱乐部的体育场上。参加审判的人把两具尸体抬下直升机后就急忙去吃饭了。他们返回时，直升机已飞走，但放在地上装有齐奥塞斯库夫妇尸体的包裹却不翼而飞了。人们大吃一惊，天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尸体到哪里去了？

第二天（12月26日）清晨，护送尸体的官员在运动场的一大土堆后面找到那两个大包裹。原来，25日晚有手球运动员到过运动场，他们看到有两个长包裹放在那里，觉得很不雅观，便把它们般到大土堆的后面。他们哪里知道包裹里是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尸体呢。

四天后，即12月30日下午傍晚，装有两口棺材的冷藏车在军人车队的护送下抵达布加勒斯特西南郊的根恰公墓。这时天色已黑，雪花纷纷扬扬地自天而降。车队穿过市区向根恰公墓驶去。

在根恰公墓，军人把两口棺材放在相距二三十多米远的已挖好的两个墓穴中。埋葬时没有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也没有任何围观者。坟墓的十字架是第二天才放上去的。齐奥塞斯库的十字架上写着：“波帕·达恩上校 1920—1989年”，埃列娜的十字架上写着：“埃内斯库·瓦西里上校 1921—1989年”。罗马尼亚当局之所以这样做，



齐奥塞斯库夫妇在所到之处都组织群众举行盛大欢迎。图为齐夫妇在参观一学校时，学生们手举齐夫妇的照片。

是为了掩人耳目，不把事态扩大。也有人说，这是为了防止有人掘墓毁尸。

随着政治风波的平息，罗马尼亚当局觉得再在齐奥塞斯库坟头上弄虚作假已无任何意义，于是派人把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姓名写在了墓碑上。1996年年初布加勒斯特一家大企业的工人在齐奥塞斯库坟地四周竖起了铁栏杆。

从革命者到专制者

齐奥塞斯库1918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在青少年干过鞋匠和铁路工人，年轻时就积极投入了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和法西斯势力的斗争。1936年他18岁时加入当时处于地下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从1934年起他就多次被捕，曾被关押在有“罗马尼亚巴士底”之称的多夫塔纳大狱达五年之久。1944年8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协同罗马尼亚军队中的爱国人士和包括当时的罗马尼亚国王在内的皇室成员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亲法西斯德国的政府，并向德国军队开战，之后苏联军队进入并解放了罗马尼亚。

1965年3月前，齐奥塞斯库是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1965年3月罗最高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生病逝，47岁的齐奥塞斯库被任命为罗共中央第一书记。齐上台后工作是小心谨慎的，注意坚持集体领导。1968



1989年12月22日中午齐奥塞斯库夫妇在党中央大厦屋顶乘直升机逃走

年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此，以齐奥塞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罗马尼亚本身也受到严重的威胁。齐奥塞斯库不妥协，加强了军事准备，并在全国成立了大规模的民兵组织——“爱国卫队”。齐奥塞斯库坚持独立、反对外来干涉的立场受到全国的拥护，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赞许和支持。

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齐奥塞斯库逐渐变得居功自傲起来。1971年，当时的罗共中央书记伊利埃斯库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提出了与齐奥塞斯库相反的意见，结果被贬到地方，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1974年罗实行总统制，齐奥塞斯库作为总统拥有了直接颁布法律、任免政府成员的大权。在此之后一直到他在1989年12月下台，齐奥塞斯库一人兼任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国防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等所有党政最高职务。齐奥塞斯库本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了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其他领导人对他必须俯首帖耳、恭敬从命。不听话，提出不同的意见的人，就被解除职务。在国内、国际重大问题上，齐奥塞斯库都是一人说了算。

个人迷信越搞越烈，齐奥塞斯库走到哪里，

都要组织群众的盛大、隆重的欢迎。群众必须提前几个小时到场，即使风吹雨淋、烈日暴晒也要参加。甚至当着齐的面还要高呼“万岁”。这种状况持续了近二十年时间。每次举行大会，罗官方都组织一批保安部队成员坐在会场的头七八排，即一种政治“拉拉队”。齐奥塞斯库讲话时，每隔二三分钟这些人都站起来鼓掌、叫好。这时出席大会的其他人也不得不站起来鼓掌。齐奥塞斯库每讲一次话，大家不得不站起几十次。

20世纪80年代，齐奥塞斯库的夫人埃列娜在政坛上上升到仅次于她丈夫的地位，成为党内最高决策机构的成员，并掌管罗党内人事大权。在政府里，名义上她是副总理，但实际上她是“超级总理”。罗马尼亚各级官员都习惯地称齐奥塞斯库为“一号”，其办公室为“一号办”，埃列娜为“二号”，“二号办”。齐奥塞斯库的3个弟弟也担当了罗共和军队的要职，他的小儿子尼库也当上了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即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罗马尼亚形成了齐奥塞斯库家族统治的局面。

经济决策的失误

在齐奥塞斯库执政的头十年头里，罗马尼亚经济是上升的，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后来他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经济发展计划，要在短期内在罗马尼亚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发展化工、机器制造和钢铁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罗政府从西方大量贷款购买较为先进的技术设备。高积累、高速度、高指标是齐奥塞斯库经济政策的核心。国民收入的积累率每年都达30%以上，有的年份竟达33%。齐奥塞斯库不顾本国国情，建设了一批耗能高、经济效益差的大工厂、大企业。本国缺乏铁矿和焦煤，却建设了两座年产量各为100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罗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本国原油年产量只有1000万吨，却建设了年加工能力在3500万吨以上石油加工企业。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猛涨，罗马尼亚不得不花更多的钱进口原油。而罗加工的石油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卖不出好价钱。在经互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组织）范围内，罗出口的本国部分原

油和石油产品换不回自己急需的现汇,只能换回低档次的工业品。在收入少,支出多的情况下,外债猛增。20世纪80年代是罗马尼亚的还债高峰期。齐奥塞斯库执意要在1990年以前还完全部外债,为此采取了最大限度限制进口和增加出口的方针。结果罗本国大量的食品、肉类、电力出口运到国外,以换回罗本国急需的外汇,结果造成本国市场上农副产品的严重短缺。

对经济问题不内行的齐奥塞斯库却在经济建设方面独断专行,结果是决策连连失误。现举以下几个事例。

万吨水压机: 罗马尼亚东北部的雅西市是著名文化名城,齐奥塞斯库决定要在这里建设一座重型机械厂,并下令安装一台万吨水压机。他不考虑这台万吨水压机的造价和大型钢锭的运输问题(每个钢锭重450吨),硬让工程上马。罗方决定从中国购买一台万吨水压机。水压机运到雅西后,请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负责安装。万吨水压机在安装期间,齐奥塞斯库就要前来参加工厂落成典礼。这急坏了当地的领导,他们要求中国专家设法救急。中国专家设法把水压机装上,但警告说只能按一次按钮,如按两次就会把机器搞坏。齐奥塞斯库进厂后,厂领导向他汇报说,按照他的指示工厂已全部投产,请他启动万吨水压机。结果,齐奥塞斯库在众人的欢呼声中高兴地站在水压机前用右手食指按动了电钮,水压机咔嚓一声轧了一下。齐奥塞斯库十分得意并发话再装一台万吨水压机。齐奥塞斯库走后,“巴投产”的万吨水压机被拆开,重新安装。

斯洛博齐亚化肥厂: 斯洛博齐亚市位于罗东南部多瑙河平原地区,是农业区。20世纪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夫人埃列娜到此访问时“灵感一动”,下令在此建立一座大型化肥厂。尽管这样的化肥厂在罗马尼亚已有不少,化肥产量能满足国内需求并有出口能力。斯洛博齐亚化肥厂第三期工程是1984年第二季度开工的,投产总额为23亿列伊(20世纪80年代罗马尼亚的外汇比价约为:1美元兑换12—14列伊)。花外汇买来的设备安装完毕也无法开工,因为缺少天然气。工厂领导只好请求上级调拨天然气。结果一等就是5年。机器设备闲置不动,就会损坏。厂方只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对设备进行维

修、保养,为此他们白白花费了10亿列伊。由于解决不了天然气供应问题,这座化肥厂就“自生自灭”了。

核电站: 建在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是罗马尼亚第一座核电站,这里计划安装5台发电能力各为70万千瓦的机组,设备从加拿大进口。在第一台机组从加拿大进口后,齐奥塞斯库擅自决定其余的机组由本国自行制造,而且每台的造价不得超过100亿列伊,即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所报价格的一半。罗工厂企业只得自己动手制造。但罗本国工业尚不具备生产核电设备的水平,投产期只得大大向后推迟。该核电站第一台机组是在齐奥塞斯库死后第七年,即1996年才投产的。

小型轧材厂: 齐奥塞斯库作出了让全国40个县每个县工业年产值达到100亿列伊的决定。罗经济界人士认为,这样做没有考虑每个县的自



1989年12月22日罗马尼亚群众冲进党中央大厦后,把齐奥塞斯库夫人像踩在脚下

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强行把各地的工业产值拉平。罗西南部的梅赫丁茨县虽已建成一座大型化工联合企业，但工业产值还上不去。县领导决定根据齐的指示建设一座年生产 25 万吨轧材的轧材厂，1979 年开建，1987 年建成。1988 年全年只轧了 17630 吨小型钢材。齐奥塞斯库得知后十分高兴，下令再建一套轧制 20 万吨钢材的生产线。第二年新生产线投入使用。1989 年全年该厂只生产了 48626 吨钢材，即实际生产能力的 10.8%。

错误的经济政策，使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在 20 世纪 80 年代，罗农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程度是这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未有的。群众日常所需的鲜肉、熟肉、奶制品、蛋类、食油供应极为紧张。人们需要排几个小时的队才能买到。许多妇女和老人凌晨就开始在副食店前排队希望能买上一些肉，但不少人排了数小时的长队，结果还是什么也买不到。咖啡是罗马尼亚人的必须饮料，但商店一直无货。走后门能搞到，但价格要翻几番。从 1987 年下半年起，市场上的药品供应也开始紧张起来。药店门口，人们也排起长队，许多药品长时间无货。

罗马尼亚冬季严寒，冬季民用煤气、暖气和电力供应不足也给百姓生活带来更大的麻烦和问题。老人、孩子受冻，生病。医院的病房、产房、手术室因得不到适当温度而无法进行正常的医疗手术。燃料的短缺也使公共交通受到影响。

弄虚作假成风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罗马尼亚党政机关自上至下浮夸、作假成风。

齐奥塞斯库宣布 1989 年罗全国粮食产量是 6000 多万吨，实际只有 1823 万吨。小麦每公顷的实际产量为 3170 公斤，虚报的产量是 8160 公斤；玉米 1913 公斤，虚报 16500 公斤；大豆 440 公斤，虚报 8100 公斤等等。弄虚作假竟成了时尚，如实反映情况会遭到批评和排斥，甚至会丢官，而说假话会受到表扬和重用。齐奥塞斯库每到一工厂参观，事先都要作充分的准备，全厂提前三天停工，打扫卫生，装点门面，张贴标语，还要挂出反映生产成绩如何“蒸蒸日上”的报表。布

加勒斯特 八月二十三日”工厂是齐奥塞斯库常去的地方。齐奥塞斯库指示该厂要实现发展生产的“高速度”，每年生产 1 万台电机。实际情况是当时的所有东欧国家加在一起，一年才能生产 1 万台这种电机。齐奥塞斯库在一些工厂还要参观职工的食堂。从电视上看，所参观的食堂饭菜花样比饭店还丰盛。实际情况是，由于市场副食供应极差，多数工厂的食堂已关了门。1987 年前苏联领导人葛罗米柯在访罗时曾参观布加勒斯特一家国营食品店，看到商品丰富，购物者装满了塑料袋。苏联人一走，这些购物者立即把自己手中的塑料袋交给站在一旁的罗内务部军官。原来，排队的人都是内务部指定的人，商店里丰盛的蔬菜和食品也是在苏联客人来之前临时摆上去的。

在罗马尼亚本国的经济困难、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齐奥塞斯库却大言不惭，谎话连篇。1989 年 4 月 19 日在为庆祝罗马尼亚还清全部外债的群众大会上，齐讲话说：“罗马尼亚是在确保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还了外债的。”还说，到 2000 年罗将成为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十分发达的国家”。他甚至说，在本世纪末（指 20 世纪末）罗马尼亚将开始实施共产主义的工作和生活原则。听了这些，罗马尼亚人真是哭笑不得。

1988 年齐奥塞斯库 70 大寿时，罗马尼亚报刊大肆宣传齐奥塞斯库著作在国外出版的盛况，罗报刊报道说在维也纳、纽约，以及在加拿大、土耳其等国都出版发行了齐的著作。知情人说，这是罗马尼亚派人出了重金买下了出版权。

1989 年 10 月 8 日他在未通知手下人的情况下到布加勒斯特几个大的副食商场视察，看到那里的货架上空空如也。他十分生气，批评了有关部门。两天后，他在打了招呼的情况下再到这几家商场视察，看到那里的鲜肉、熟肉、奶制品花样繁多，十分丰富。他认为他的“视察”使市场供应发生了变化。但他走后，农副食品又从货架全部撤掉。

（本文两位作者先后为新华社驻罗马尼亚首席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毛泽东在文革初就厌恶见江青吗

李锐：追溯中共初创的历史

亲历农村改革的几场风雨

毛泽东和林一山谈三峡水库

阎明复：安排境外机构救援要有预案

吴江：论孔子学说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5.80元